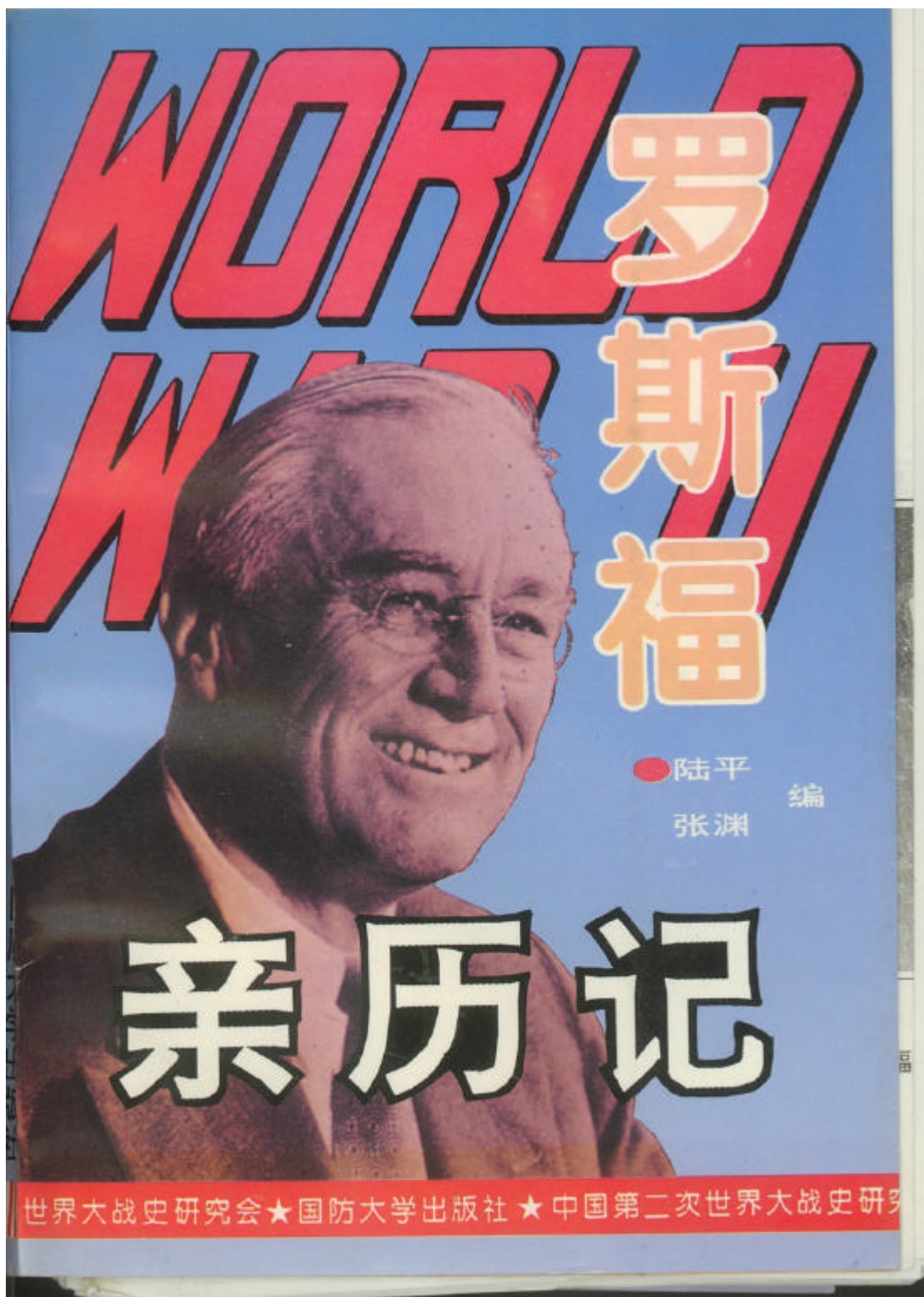




罗斯福

● 陆平 编
张渊

亲历记

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国防大学出版社★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罗斯福亲历记

第一章 “我们是在讨好日本……”美国总统如是说
战争在即，美国应给自己一个历史定位
我们还要保护战后的利益
每个美国人都必须为建设充实的军队而纳税
望着从军的儿子，罗斯福的眼中闪着泪光
罗斯福：我们需要时间

关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活动，他的儿子伊利奥曾写下许多回忆。

1938年9月，在慕尼黑，欧洲的危机总算以息事宁人的方式被“解决”了。在那个时候，各人对它都有不同的看法，那是依据每个人对世界与人类的观念而定的。至于我自己，说老实话，对那一周末的紧张是抱着绝对自私的考虑。我正准备开始一个新的事业，在德克萨斯建立一个小型无线电台网。因此，我所担忧的只是战争的传闻和纳粹法西斯的剑拔弩张是否会影响我个人的营利。

要查明一个事件的真相，莫过于直接向那消息的来源地打听。那一年9月我恰巧在华盛顿住了几天，因此我决定去看一下父亲，准备小心而机警地从他身上探出个究竟，看当时的政治情形是否对营业有什么影响。当我终于得到许可，走进他的书房和他作十分钟的单独会面的时候，他刚好发出致希特勒的第二封信，并且把信的内容给各报馆发表。我告诉他我预备收买无线电台管理权的计划，并且想试试是否可以使这个事业成为自己稳固的经济基础。

“当然罗，”我试探地说，“最近关于战争的许多传说……”我带着期待的神情瞧着他。他把他的椅子向后拉了一下，转过身子来正面对着我。沉默了一会，我有些气馁地接下去说：“看了许多报上的标题，好像战争明天就要爆发似的。这恐怕对新的事业计划不会有什么好处吧！”

他笑了一笑，回答说：“那么你要我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战争不会爆发？告诉你应该进行你的无线电台计划？告诉你不要担心？告诉你第一年准可以赚钱，第三年年底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富翁？”

“不，我的意思是……”

“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你。其实，这些东西只要经常睁开眼睛的人都知道。欧洲的局势迟早是要恶化的。英国和法国迟早会感到希特勒干得太过份了。当然，这决不致于在这个礼拜内就发生，可是谁也没办法能准确预料。苏联的角色……捷克的人民……”

“可是即使欧洲有什么变乱，不见得我们一定要被牵扯到里面去？”

“这就是我们最高的希望。我们一天到晚所考虑的就是怎样使我们不被牵扯在里面”。他停顿了一下，拿起书桌上的小摆设，在手中玩弄了一阵子，冷漠地皱着眉头。“我说”，他突然接下去，“我要是你的话，一定飞快神速地立刻把你那个无线电台计划实行起来。你毫无必要去听信某些报纸的标题而把你的全盘计划放弃了。抓住一个机会好好地干下去。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这就是我谈话的结局。在我回德克萨斯的途中，我极力思索他那突如其来的过份自信的保证，开始怀疑在他的字里行间是否隐藏着其他的意思。可是在1938年的9月和10月，我们大多数美国人还离开现实不知有多少光年呢。结果，我只是耸了耸肩膀，决定暂时忘记欧洲问题，开始我在德克萨斯

的工作。

假如我们大多数美国人，当然连我也包括在内，在那时候能够少耸些肩膀，多注意些满洲与捷克那些角落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今日一定有比较圆满一些的收获而毋须流那么多血。为了证实我这一点真理，我翻阅了一些当时以及更早期的公文与记录。里面有一段是1938年4月我父亲所主持的一个记者会议的记录。有一位怀疑主义的记者，要我父亲解释为什么要在太平洋建立军备。他认为我们是绝对无法保障菲律宾与其他的太平洋岛屿的，假如我们还得同时在西半球保障我们不受攻击的话。我父亲的回答是：

“当然，假如你只有一个敌人，你的话是很对的。可是假如你同时有两个敌人，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来攻击你呢？那么，你应该敏捷地先把其中的一个打倒，然后再把你的军队调回来打另外一个。这是你唯一的路。”

所以，远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当全国正热衷于添设军备的大争辩，父亲已在尽全力使我们不致于遭受诸如珍珠港事件之类的攻击。在国会中，缅因的布鲁斯脱，纽约的汉姆菲许，密西根的范登堡，堪萨斯的凯泼以及爱达荷的鲍拉都是反对派的领袖，坚决不赞成任何增加陆海军军费的提案；汉斯脱系的报纸以及麦克可密克——毕得生的党徒则热烈地攻击集体安全政策，并且鼓吹孤立主义。

1940年6月，我恰巧又到纽约去。在我回德克萨斯的途中经过华盛顿下车时，盘旋在我心目中的问题正是当时一切商人所关心的问题——营业税，尤其是超额利得税这一个问题。对于这一项税目，大商人或许可以对付，可是一个小规模的经营商，资本少而负债多，则未免有些难以负担。正好在我父亲吃完早饭还没有开始他白天的工作的时候，我得到一个机会跟他谈起这个问题。

“究竟是怎么回事，爸？难道政府真的不想给我们这些小商人们一些活路吗？”

他脸上泛起了一阵微笑，把桌上的一堆芝加哥、纽约和华盛顿的报纸推到地板上，抬起头来问我：“你喝完你的咖啡了吗？”

“别管我的咖啡。告诉我这个超额利得税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不见得以为你的公司是特殊的吧，是不是？”

“不，不过我……”

“而且总得承认政府必须筹一笔巨款？现在许多大企业已经开始接受国防契约而大规模地工作，它们日见增加的利益当然可以变成政府筹款的最好来源。我们非要弄到一笔钱不行，假如我们要建设一支充实的陆军、海军与空军。”

“这当然是对的。不过我们这些小商人们——”

他打断了我的话。“毫无问题，新的税法将要增加某一部分人的负担。不论这是怎么样一种税法。一般他说，关于小商人的福利，我是比谁都要关切，我总希望他们能有更好的机会与大商人竞争。可是营业与税务并不是我们目前的唯一问题，我们目前的问题要比这些重大得多，千百倍地重大。对于你个人的头痛甚为抱歉，我劝你还是吃几片阿司匹林吧。”

我笑了。

在我心目中，那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于是我接着问他：“关于征役问题呢？”

我问得如此突然，以致他最初还以为我是指财团利益的征收呢。想了一

下，他才明白。“喔，你是指征兵，怎么样？”

“我在想：假如征兵案通过，你觉得约翰、佛兰克林和我应该怎样。我看詹姆士的年龄似乎已经太大……”

“不论怎样，詹姆士已经是海军陆战队的预备军人了。”他提醒我。

“你能不能告诉我，政府所要通过的征兵案的性质？我是指服役年龄等等。”

“有一件事我非得跟你说明不可。假如征兵案已经成为法律，那么，这将是你们个人的事，你们必须凭你们各人的良心来决定自己的态度与行动，假如你们愿意等到兵役成为事实的时候，那么你们不妨等，不过，假如征兵案已经成为法律，你们各人都将受你们不同的兵役委员会管辖，而他们会采取适当行动的。”

“至于要我给你一些忠告，告诉你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行动，那么你应该首先认识我是怎样一个人。你们的事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从不干预。征集适合兵役公民的法令能否通过都不会变更这一点。我可以说，天下没有一件事能变更这一点的。”

这就是我们那一次谈话的结局。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那次谈话并不能说是圆满。事实上，我没和他谈话以前或许我还知道得多一点，而和他谈话之后，我所知道的似乎少了。他对于应付小商业的征税问题似乎并不乐观；对于我个人应该采取的贤明行动，也并未给我以任何暗示。我之所以说那次谈话并不圆满，那是因为我当时的感觉的确如此。现在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感觉到他始终设法叫我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实在是对的。

那一年夏天我回到德克萨斯工作地以后，很快就决定了我自己的出路。德克萨斯实在是一个好地方，当一个人决定去为他祖国的陆海军服务的时候。在德克萨斯，那正是一个应该做的。我承认，每天早晨清醒地读我的报纸，觉得我们国家的确有些迟早不得不参战的样子。谈到我个人的营业，它当时颇能自己支持。事实上，政府军事订货所引起的任何生产增加都可能招来更多的广告收入。那么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阻止我去从军呢？我觉得没有。而我从幸后又怎么样呢？只是一年的军事训练。（我那时候是这么想的）那么为什么不去投军呢？它既无害处，又可以使我多知道一些事态的究竟。

因此在8月中，我又回到华盛顿，走进了陆军部的大门。

好几年以前，我曾经是一个私人飞行员，曾经在航空工业方面做过事，曾经为汉斯脱系的报纸担任过航空编辑。因此在我心目中，我最好是参加陆军中的空军部队。在某一点上讲，这也可以说是罗斯福对海军之不忠（编者按：罗斯福一家与海军有悠久密切的关系），可是读者们应该记得，我是唯一没有进哈佛大学的罗斯福。

好多年以前，当安诺德将军还是一个中校，驻在加利福尼亚麦基机场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父亲对于他的能力与理想是一向很看重的。1940年安诺德已经晋升为少将并且是陆军航空部队的总司令了。因此我既然走进了陆军部，我当然应该去看他一下，跟他打个招呼，并且和他的部下谈谈我参军的事情，当时，我希望能做个飞行员。

可是作为一个飞行员，我是不够资格的。他们对我体格的要求实在太高：他们说我是绝对不适宜空中战斗，而即使想得到空军中的一个行政岗位上去工作，也必须签上一张放弃许多生活上的权利的弃权书。我赶忙抓住了第二

个机会，和我谈话的那位军官认为我的组织无线电台网的经验在空军的征用局中是很有用的。而我的年龄使我有资格当一名预备役的上尉，后者完全是公文上的规定。这一切我完全守秘密，对家庭中的任何人都没有谈起。9月19日，我接到政府的通知，得知我的委任状已经批下来了。这时我才准备去告诉我的父亲。

当我走进白宫，发现我父亲正忙得很，他依次召见他的各部首长们。我在他中间休息的时候，找了个机会闯进他的书房。

“瞧，爸！”

他看了看我手中的委任状，然后抬起头来看看我，我看见他的眼中闪烁着泪花。我是他儿子中第一个自愿去参军的，他有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然后他说：“我为你感到光荣。”

他冲动的情绪使我也觉得十分光荣。

那一个周末，我们差不多合家团聚在海特公园庆祝两个生日：我祖母的生日是21日，而我的生日恰好是23日，我们举行了一个合并的庆祝会，而在那一天吃晚饭的时候，父亲举起了他的酒杯，提议大家来一个干杯：

“这一杯酒是为伊利奥而干的，他是我们家中第一个人对美国所受的威胁加以严肃而清醒的考虑，毅然去从军的。我们都为他感到光荣，我是最觉得光荣的一个。”

他领头，接着我的母亲。我的祖母和我的兄弟们都为我干杯。

我时常感觉到我和我父亲的特殊亲密关系是从我走进白宫他的书房，给他看我的委任状那一刻开始的。当然，队前在我二十一岁的那年夏天，我也曾和他到欧洲去旅行。可是这一次却完全不同，从这一次起他和我谈话总是带着更亲密的态度，更大的信任和更密切的关系。好像是他偷偷地在内心——丝毫不曾对我明言——给了我一个试验，而我又非常圆满地完成了它。这在他看来，似乎十分重要。而我得承认，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那一天晚上，在他的卧室中，当我走进去看晚安的时候，他叫我坐下来谈谈。他问我心中感觉如何，我回答说“很好”；我们毫无目的地谈了些关于惠脱机场（我被派往工作的地方）的事情。后来他问我对于战争的感想怎样。我那时心中所盘念的一件事正是在那些日子中许多人心中所想到的：为什么我们还在不断地把废铁送到日本去？我们当然知道给日本一块废铁就等于帮助日本杀一堆中国人……

“我们是一个和平的国家，”他一边想，一边慢慢地回答我，“这并不单单是一个条件，事实上是我们的心理构造。那就是说我们并不探求战争，我们并不要战争，我们根本没有战争的准备。废铁——你别笑——废铁并没有归入战时资材的范围。因此，日本或是任何与我们有商约的国家都可以自由购买我们的废铁。”

“可是……”

“再进一步来说。假如我们突然停止卖废铁给日本，那么它将有权认为我们对它做了一件不友谊的事情，说我们想从商业方面使它饥渴。”

“再说，它可以用我们这个行为来作为它与我们断交的充分理由。”

“它完全是装样子吓人的。”

“这也难说，可是依我们目前的地位来说，能说它是吓人吗？”

我突然地想到了麦克可密克的芝加哥论坛，以及一小群上下院的议员们的演讲，说日本对我们毫无战争用意，说我们在远东方面的权益并没有受到

日本的威胁。我又想到许多说我父亲是战争制造家的批评与非难。“我们无论是在事实上，或实质上，”他接下去说，“都是在讨好日本。这是一个丑恶的字眼，你别以为我会喜欢这个字眼。可是事实上我们确是走这一条路。我们讨好日本为的是想争取时间来建设起一个头等的海军、头等的陆军……”

“和一个头等的空军。”我插了上去。

“和一个头等的空军，”他笑了，“一点也不错。今后我必须记住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该多谈些空军。”

几天以后，我就作为空军征用局中的一个上尉开始了新的、陌生的工作。说老实话，我当时丝毫没有想到我父亲的敌人会利用我完全出于至诚的行为（我从军与请求军官的委任）来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我的从军不是为了好玩，或是为了我以为军队的生活会比我在德克萨斯的业务工作要快乐得多。我要那么想，我才真是个大傻瓜呢。可是在我参军后不久的几个星期，反应就开始了。

在1940年总统选举运动的时期，我从全国各地一共收到了三万五千封来自全国的信和明信片。当然，大部分是没有署名的。

在那个时候，读者应该体会到，那些信和明信片是相当使我痛心的。父亲在10月间巡游西部到丹顿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些信件和明信片正潮水似地涌进我的信箱，差不多每一次邮包到时，这一类的信件总有一千封左右。我父亲那时预备利用他巡游丹顿的机会，由安诺德将军陪同视察一下惠脱基地，因此我决定到他的选举运动专车中去看一下他。

“不管你信不信我，爸，这对我倒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这一类的事对你的再当选恐怕会有很大的阻碍。”

他脸上的表情甚为严肃，人家攻击我们，说我企图以这种坐写字间的工作来逃避战斗，说他想用他的势力来保护我，不使我受到战争的直接威胁，这一类的诽谤毕竟不是普通人所能受得了的。他问我有什么办法，打算怎么样。

“我预备辞职，辞掉我的官职。我想在事先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的感觉……”

“你现在对我说话，是不是以一个下属对美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关系来说话？”他闪了一下他的眼。

“假如你以为应该如此，我当然不能反对。”

“那么你等一下。”于是他回过头来对斯蒂甫·欧莱说，“请你叫安诺德回来一下。”

当安诺德将军走向专车中的会客室的时候，我父亲告诉他我的请求。“这件事完全交给你办，”他说。“这是你的问题，你觉得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于是他回过头去，看着窗外。

安诺德将军用一只眼斜视着我。“你真吗，上尉？”

“当然是的，将军。”

“那么以后你打算怎么样呢？再加入空军，从一个下等兵做起？是不是？”

“报告将军，假如我不能再入伍做一个下等兵，我想加入加拿大的皇家空军。”

“很好。你照公事的程序正式把你的辞呈递上来，写明你辞职的理由。”

我们会马上采取适当行动的。”

于是我便按照公文的手续把我的辞呈一级级地递上去。一星期以后，上司的答复又照原有程序一级级地批了下来：“辞职难以照准。”我于是对我的上司开始了有计划的攻击，屡次以傲慢的态度向他们发脾气，想因此可以被撤换而派到海外去。不多久，我这计划便发生了效力。我终于被调到勃林机场，在一个苦干的、头脑清楚的“西点”出身的年轻人，劳利斯·诺斯达特之下，接受作为一个空军情报军官的训练。当我完成了我情报训练的全部课程以后，我被派到杰米·克莱布少校所指挥的第二十一侦察中队服务。第二十一中队的防地是在纽芬兰，它担任的工作是在大西洋北部巡逻，警戒纳粹潜艇对我们船舶的威胁。我虽没有正式被派向海外，但至少我已经在祖国和海外的中途了。

我找不出一个恰当的字眼来描写 1941 年 3 月我在纽芬兰的工作环境——当时的气候、生活情形、土地（倒不如说没有土地）的情形等等。或许我可以用“荒漠”这个字来形容，假如读者们可以从“荒漠”这两个字来领悟我所指的那种悲惨、泥泞、荒凉、与愁苦的混合情景。我当时感到没有一个环境比 1941 年 3 月的纽芬兰更糟，更不愉快了。因此我自动请求担任一件新的测量工作，新工作的目的是在北极圈内寻找适合于作空军站的地点，以便给由美国运往英国的战斗机作途中的降落接续站。这件任务中最微妙的地方是在怎样避免陆军与海军在工作中可能发生的摩擦。这件工作使我从拉布刺达出发，到巴芬群岛，经过格林兰，转冰岛，而终于到达英国，在那里我预备和英国的飞行员们以及航空部的官员互相交换各人的发现与收获。说老实话，我真希望能够再迟一点到达英国，因为我到的时候正赶上 1941 年 5、6 月间纳粹对英大轰炸的末尾。虽然那已是大轰炸的末尾，可是却也够受的了。我和当时的每个人一样，经受了目击许多大厦被炸成废墟时的那种惊愕的冲击，以及看炸弹雨点般地掉在四周，而自己无所作为的那种无望的心境。

在我那次战时访问英国的旅行中，我曾经被邀请到丘吉尔总理的乡村别墅中去度过一个周末。那是一个颇有家庭风味而十分愉快的周末，只不过有两个时刻我却感到十分窘迫：第一次是我刚到达那里的时候，从门口走出一个好像刚从米高梅的影片中跳下来的十足英国味的执事，跑到我跟前问我带了多少件行李，而我所能交给他的却只有一把木梳与一根牙刷；第二次是在星期日的早上，前一晚他们借了一套很漂亮的用中国丝所做的睡衣给我，看来似乎是主人的所有物，可是因为尺码太小，早上醒来的时候，那套漂亮的睡衣已经被我的身子所撑破，从头到底，整整地撕裂成两片。

1941 年仲夏，我的中队已经在北极圈内找到了五个可以做空军站的地点。我们替这些地点起了五个名字，这些名字恐怕只有那些在今后 4 年中时常在那里降落起飞的飞行员们才熟悉。拉布刺达的鹅湾，格林兰的蓝东，魁北克的水晶一与巴芬群岛的水晶二、水晶三，这是我们对当时的空运联络制的一点贡献，使大量的轰炸机与战斗机得以在 1942、43 年的夏天陆续经美国运到英国。

8 月初我又回到了巴芬群岛，生活在深及膝盖的泥泞的冻土带中，在肯巴伦桑测量一个可能改成飞机场的地点；突然我接到一个由无线电发来的命令，叫我立刻动身回到纽芬兰基地去。又是什么官样文章，当时我这么想。在甘特湖我的基地司令部他们分派给我一架 OA—10 葛鲁曼式的小型飞机以及一位飞行员。我们的任务是在 8 月 8 日，星期五到圣约翰去接纽芬兰的美

军总司令，然后同他一起到沃根基的海军基地去。当时我认为此行目的无非是有几位长官想和我商讨关于我所测量的飞行基地的问题而

当我们的飞机飞过连绵的山岭而能看到沃根基海港的时候，我们的总司令正沉默地坐在飞机后面的座位上，而我则坐在副飞行员的位子上。飞行员尖起嘴轻轻地吹了一下口哨。海湾旁布满了军舰，大部分还是很大很大的，我们对看了一眼，皱了下眉头，表示不解，我们的无线电随即发出信号，询问我们的飞机应该系留在哪一处的停泊标上，而在领港的小艇到来以前我们该等多久。在等待的时候我们还在苦苦地想弄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驱逐舰和巡洋舰停泊在港口。我们所能得到的唯一的合理的解答就是我们正巧赶上了又一次大西洋的海军大演习。

几分钟以后，他们派了条小艇来，把我们飞快地带到了巡洋舰奥古斯大号上，我们从舰边爬了上去，而在那巡洋舰舰长的背后，我看到了华生准将——我父亲的陆军武官，勃朗海军少将——父亲的海军武官。我万万没想到会在这儿碰到他们，因此我一下子呆住了，以致把从小自我父亲（他那时是海军次长）那儿学来的海军礼节全部给忘了。华生对我笑了笑，勃朗少将在向我挥手，而这时候我才醒过来，赶忙回转头对舰尾的美国国旗敬了个礼。华生赶上来跟我握手，口中喃喃地说：“总统很想马上看到你。”我急忙往前走，正碰上我的弟弟小佛兰克林，他那时是海军中尉。

“嗨，你也在这儿？”

“究竟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楚。上星期我们的军舰梅朗号和另一条驱逐舰接到命令退出护航的任务。说我们应该留在这儿参加另一个海军舰队担任巡逻的工作，保护海港的进口。今天早晨他们又叫我立刻到奥古斯大号上来见总统。”他把一只手指伸进他衬衫领子里抓了一下。“我真想不出我干了些什么玩意儿，我们的海军上将金氏会偏把我给调了出来。”

“爸在那儿？”

“前面，在舰长的房舱里。你觉得怎么样？”

“还不跟你一样，恐怕又是什么海军大演习吧。”

“这儿走，你带换洗的内衣了吗？”

“我没有带，为什么？”

“我们恐怕得在这儿住上两三天吧，反正不管它了。”

那天是星期五。我的衬衫只有我军服内所穿的一件，而我得在舰上住到下星期二才能走。幸亏我的父亲的领子尺码和我的差不多大，我可以借用他的内衣。否则，穿着件脏衬衫目击那历史性的《大西洋宪章》的签字，恐怕未免有失体统。这一点，我想读者们一定会同意的。

第二章 谁来穿世界领袖的外衣

芬狄湾，罗斯福钓到一条怪鱼

美国绝不帮助英国在战后继续统治它的殖民地

丘吉尔希望得到美国立即对德宣战的承诺

罗斯福递给丘吉尔 1950 包礼品

丘吉尔：在任何一次战争中，英国人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罗斯福：战后永久和平的先决条件是最大可能的贸易自由

丘吉尔是个十全十美的内阁总理，他一主只有一个崇高使命

夜幕渐沉中，领袖的外衣慢慢地从丘吉尔肩上滑落到罗斯福肩上小罗斯福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此行的目的将是陪伴父亲去参加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自从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斯大林在“七·三广播演说”中发表了具有很大大国际意义的声明，表明“这个反法西斯压迫者的全民卫国战争的目的，不仅要清除我国面临的危险，而且要帮助那些呻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的欧洲各国人民。”这一明确的表示和当时战争形势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英美政府也要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目的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时，出于各国自身的利益，英美最高首脑提出需要进行会晤，对战争形势做出正确的估计，并制定和协调本国的政策。

这一次，罗斯福和丘吉尔将进行战时第一次会晤，在纽芬兰海域的军舰上将诞生一个关于人类权利和战争目的的八点宣言。这个宣言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它成为英美两国政治联盟的一个标志，也成为后来联合国宪章的基础。

这个宣言，宣称美国 and 联合王国都不谋求任何类型的领土扩张；各国人民应该有权选择他们的政府和自由生活；贸易能自由进行，原料能自由取得；放弃用武力作为国防政治的工具。他们期待“在最后摧毁纳粹暴政之后”能得到知平，“确保全人类能安居乐业，过着无所恐惧和不虞匮乏的生活。”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宣言的发布，对于动员和鼓舞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一步加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罗斯福总统在美国还没有参战的情况下，挺身而出，与丘吉尔发表这个声明，充分显示了这位具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勇气和胆略。

在制定大西洋宪章的过程中，英美之间既有统一，也有斗争，会谈中，双方就各自的殖民利益，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美国方面极力把“机会均等”、“海上自由”等扩张主义原则塞进宪章里去，妄图打进和控制英国殖民地。会议期间，美国还谴责了英帝国关税限制制度和英德操纵世界贸易的状况。罗斯福认为；大战后，必须把英国殖民地问题拿出来进行讨论，而丘吉尔则当场勃然大怒，说“他当英王首相的目的，并不是来主持大英帝国解体的”。

在大西洋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还联名致函斯大林，建议召开苏、美、英三国会议，讨论共同对德作战和有关援苏问题。这为三巨头会晤奠定了基础。

小罗斯福以罗斯福私人随从的身份经历了大西洋会议的整个过程，对会议及会议以外的事情作了详细的描述。使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所以让我们随着小罗斯福的笔峰专寻找那秘密的会晤吧！

星期五快吃午饭的时候，我和佛兰克林见到了父亲。我们还来不及对他

说一声“哈罗”，并向我们的母亲以及其他的家属问好，他先开口了：

“瞧这个，我叫华生把这个给你们准备好了。”他交给我一条总统陆军侍从的饰带。“这不过是给你们临时带几天的，”他笑了一笑，又给弗兰克林一条海军侍从的饰带。

“你的精神还是那么好，爸。不过，你是不是趁例假来钓鱼的？”

父亲很得意地大声笑了起来。“新闻记者们都是这么想。他们以为我是到芬狄湾附近来钓鱼的。”他像孩子那样的高兴，他夸耀他的高明手腕，怎么样骗过了许多新闻记者，坐他的帆艇波特玛克号先航行到缅因的奥古斯大。接着他告诉我们这一次旅行的真相。

“我在这里和丘吉尔会面，他明天坐威尔斯王子号到达这里，哈莱·霍浦金斯陪他一起来。”说到这里他停住了，往椅背上一靠，想看我们对这个消息的反应。我虽然没有镜子在身边，可是猜得到我当时脸上的兴奋与惊愕的表情。

在继续叙述这一段故事之前，我想先提一提被我父亲遗留在后面的白宫记者们。我父亲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他事先与丘吉尔有一个约定，讲明双方都不准带记者与摄影师，报上也不准有关于这一次会面的披露。为着履行这一约定，我父亲在他出发前很巧妙地骗过了包围着他的记者们，对于这一点，他觉得非常得意，好像一个玩捉迷藏的孩子巧妙地躲过了他狡猾的对手似的。可是，第二天丘吉尔到达的时候却带了全班新闻随员，很拙劣地假装是情报部的官员。这是第一次丘吉尔以不守诺言而使父亲感到惊讶。可是这决不是最后一次。

谈到钓鱼，我父亲在这次旅行中的确钓了鱼，不过只钓了一次。那是我到达的前一天的事。他钓了一条怪鱼，船上没有一个人叫得出它的名字。“把它送到 SMITHSONIAN 那儿去吧。”我父亲建议。后来在这次旅途中他不再从事于钓鱼这一门消遣了。我父亲和丘吉尔第一次会面之所以选定这个独特的地方是有很多理由的。为着安全与机密起见，这一次会面不得不在华盛顿以外的地方；假如他们选择华盛顿做他们会面的地方，那么过分夸张的闲话与谣言一定会抹杀不少这会议可能产生的最好效果。我父亲与丘吉尔都是海军出身的人物；1919 年他们就是以这种身份作最初一次会面的；在海上会面这一个念头是可以挑起他们的幻想与兴趣的。可是他们无法在海上会面，纳粹潜水艇活动的威胁使这一种想法绝对不可能成为事实。那么在什么地方呢？最理想的该是人口稀少的海岸线上的保护严密的港口或是大西洋中的岛屿上。亚速尔群岛？这是葡萄牙的属地，根本在问题之外。从我个人的出发点来看，我觉得应该选择百尔慕他群岛或是西印度群岛中的任何一个小岛的；纽芬兰在 8 月中已经是十分荒凉而寒冷了；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迷蒙的雾；太阳是很少见的一位稀客。可是纽芬兰也有它明显的优点：人口不太密，附近驻有很多英美和加拿大的部队，尤其是在沃根基港口，任何大规模的舰队的集中都不致于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与猜想，谁都知道我们的海军早在这儿建筑了基地。

所以我便到了沃根基，期待着过几天与我日常工作不同的新奇的生活。

那天吃午饭的时候，以及饭后那个寒冷而灰色的下午，我始终和父亲在一起，谈说着家庭的新闻。弗兰克林也和我们待了一个时候，他告诉我们他的驱逐舰护航到冰岛去的情形。父亲的精神非常好，显然他因暂时摆脱一下他日常的工作而感到高兴。他问起我在北极圈内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我那次

到英国去时的所见所闻，英国现在究竟是怎么一个模样，我所碰到的那些英国人的士气如何，大轰炸与大火景象如何（我在英国只经历了几天的轰炸，因此我实在不够资格来说明这一点），我对他多年不见的丘吉尔的印象如何，等等。我则询问他这一次会晤的目的是什么“你自己到过英国，”他回答。

“你亲眼看到英国的人民。你甚至还告诉我他们的样子——灰色、消瘦而艰苦。这样一个会晤对英国的士气当然是会有天大的好处的。是不是？”

我点了点头。

“这些日子是纳粹趾高气扬的时候。他们像是欧洲的主人，我们至少得给英国一些精神上的援助，否则我们自己就要面临大炮与炸弹。我相信今天有很多美国人同意这个见解的。”

“那么只是精神上的援助了。”我提醒他。

“不仅如此，还有我们的租借法案呢。英国人知道他们已经走近了他们生产力的局限——而在这个局限之内，他们是不足以支持一个攻势战争的。这一次会晤是想法草定一个生产计划——尤其对英国人重要的是交货的方式与计划。他们对我们把多少生产量转给苏联，感到重大不安。”

“还有呢？”

“我已经知道丘吉尔对苏联继续作战能力的估价。”他圈起手指表示一个零。

“我想你的估价总比这个高一点吧。”

“霍浦金斯对苏联有很高的评价。而他也有办法使我信服。”

当然，在我们谈话那个时候，美国的生产量还小得可怜，和现在相比，恐怕只是很小很小的一点。英国所担忧的是怕苏联从我们这儿得到的是这一小点的一半。

“丘吉尔明天将到这儿来，因为他——我想他不会这样表示的，明知道没有美国英国是没法继续抗战的。”我吹了一声口哨。我曾经亲眼见到5月大轰炸的尾梢，大火燃烧掉英国大部分的工业中心区，可是我还没有想到他们的困难有这么严重，再加上苏联人正一步步地通过草原地带往后退却……

“当然罗，”我的父亲又继续说，“丘吉尔最关心的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参战。他知道得很详细，假如美国的力量只是集中在生产上，那么其最大的作用也无非是使英国能够借以支持战局罢了。他知道假如英国要采取攻势的话，没有美国的军队是办不到的。”突然问他反问我：“你在伦敦的时候看不看英国的报纸？”

我告诉他有些报纸严厉地非难美国，说我们只是想看英国被打得惨无人色，毫无招架的时候，才会利用最后的一秒钟来挽回大局。父亲很得意地点点头，表示他猜测的胜利。

“等着瞧吧，”他说，“丘吉尔一来就会要求我们立刻对纳粹宣战。”

我不大明白我们可以从这次会晤中得到什么好处。“从精神方面讲，我们当然是早就站在英国一边了。”

“是呀，”我父亲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不应忘记我的海陆空军参谋长们都在这里。他们可以知道很多的新东西。英国战争潜力的确实情形如何？从人力这一方面来看，英国是不是已经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

“你说还有谁在这儿？”我问。我在这儿看到的只是我父亲和他的侍从武官们。

“还有金氏、史塔克、马歇尔、安诺德……很多大人物全在。你就可以

看到他们的。”

一个送信的带了一大包公函走了进来，暂时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走了以后，父亲又把话题转回到那行将举行的会议上。事实上我想他是在练习他明天所要开始的谈话，一点一点地指出他之所以出席这次会谈的许多内在的原因，准备对付丘吉尔可能提出的请求。

“还有一件事，”他说，“大英帝国已经走进了一个危急阶段。这是一般人不大知道的问题，英国的银行家和德国的银行家事实上很久以来就把把持世界贸易，作为他们的重要目标，现在德国在第一次大战中失败了。这对美国的贸易是有好处的，是不是？”他对我耸了一下他的眉毛。“假如在以往，德国和英国的银行家会合作把我们从世界贸易中排挤出去，对我们封锁这个和那个市场，而现在德国却与英国作战了，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有一点我们马上可以知道。我们不应该太贪婪，看哪一边给我们的利益多而决定和哪一边合作：暂时我们可以避开目前的事实，就是说纳粹主义是可憎的，而我们的天然的利害关系，以及我们的私心是与英国合流的。可是事件却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应该从最初就跟英国讲得明明白白，我们不愿意做一个老好人，在大英帝国危急的时候帮它脱出危机，而在事后又让他永远把我们忘了。”

“我不懂你最终的意思是什么？”我插嘴问他。

“丘吉尔告诉我他做英国首相的目的并不是来主持大英帝国分解的。（丘吉尔后来在一次无线电广播中重复此说——作者）。我想我可以以美国总统的资格说：美国决不愿在这次战争中帮助英国，使它能够在战后再继续统治它殖民地的人民。”他停顿了一下。

“我想，”我小心他说，“今后几天中恐怕免不了会生出些纠葛本。”

“我们等着瞧吧。”父亲说。

那天下午，差不多四点三十分的时候，威尔士和哈立曼到我们这艘巡洋舰上来，他们有好多文件要与我父亲一起校阅，因此我便起身退出，直到快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去，晚饭时的谈话都是无关紧要的闲谈。那天我们都睡得很早。

星期六早上九点以前我们全体走到甲板上，看威尔斯王子号进港。我扶着父亲，站在舰桥上，极目遥望弯向海湾出口处的岬尖，英国舰船仍然没有进入视野。父亲转过身来和背后的随员闲谈。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是唯一不穿军服的人。斯塔克海军上将和大西洋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也在场。阿诺德空军上将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正在跟总统军事助理沃森将军亲切交谈。我穿着簇新的空军上尉制服，充当爸爸的随从军官。

“阿，船！”，船头上一位年轻的海军战士高喊起来。

我们看到一艘驱逐舰的黑色尖形船头经过岬尖，后面跟着另外五艘驱逐舰，有的挂着星条旗，有的则是加拿大军旗。然后出现了一个更笨重的庞然大物，那是一艘涂着锯齿形杂色伪装的巨型军舰，船尾上飘扬着一面炫目的军旗——英国皇家海军旗。

“把双筒望远镜递给我，埃利奥特。”父亲说。然后，他把望远镜对准英国军舰“威尔士亲王”号的舰桥，几乎就立刻认出那熟悉的笨大体形，除了丘吉尔之外不可能是别人。站在他旁边的是身材瘦弱的哈里·霍普金斯。

英国军舰缓慢地从美国舰只列队中穿过。“奥古斯塔”号的后甲板上，军乐队指挥举起了指挥棒。

“扶我起来！”父亲命令说。

我扶他站起身来。麦金太尔医生俯身为他扣紧支架。当“威尔士亲王”号驶来时，父亲脱下帽子，立正致敬，他清楚地看到丘吉尔在英国军舰的舰桥上行礼。“奥古斯塔”号驶来时奏着《上帝保佑吾王》，随风飘过来的是《星条旗》乐声，接着英国船行驶过去，转向一个没有旗子标志的浮标。它到达那里后，寂静的海面上响起了下锚时链条的隆隆响声。

11时整，海军上将的汽船驶离“威尔士亲王”号，父亲站在“奥古斯塔”号的舷梯上等候着。汽艇到达船边。在汽笛的尖鸣声和海军仪仗队举枪致敬的碰击声中，穿着褐色海军制服的丘吉尔走上船梯。

首相显得古板、粗率而有力。他停下脚步，礼貌地朝后甲板致敬。然后像一个逗人喜爱的“如来佛”一样，笑咪咪地伸出双手走上前去。

“终于见到您了，总统先生！”

“在船上和您相会，我很高兴，丘吉尔先生。”父亲回答。

他们的手紧紧握到了一起。激情犹如强大电流传遍他们的身体。对他们两人来说，这次会晤象征着他们梦寐以求、努力争取并最终实现的目标。他们的相见，体现着英国和美国携起手来了。

这是他们1919年以来的第一次晤面，可是他们即刻谈到他们的通讯，他们横隔大西洋的通话，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工作与他们的烦恼，很快地他们便直呼其名，用起“弗兰克林”与“温斯顿”的亲呢称呼。这称呼当然是私下用的。在有其他官员在场的时候，他们还是用“总统先生”与“首相先生”的称呼。可是日子处久了，我父亲在正式的场合也放弃了这种礼貌上的装模作样，虽然丘吉尔始终拘谨地墨守着这种称呼的礼节。

第一次的拜访完全是礼节性的，丘吉尔带了一封英国女皇给我父亲的信。比较醒目的却是丘吉尔随身带的一批顾问们。和我父亲带来的一小群随员相比，丘吉尔显赫得多了，他虽然还没有把百家姓上的全部姓氏都带来，可是却也够瞧的了，从贝弗勃洛克到那尔他全带来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还有一批英国情报部的官员也在场，随身带着笔记本和摄影机。安诺德将军一下子溜到我的背后，偷偷地在我耳边说我们最好赶快设法弄几个摄影师和一批胶片来，并且问我在甘特湖附近有没有航空摄影技术人员可以找到。那一天早晨我立刻派了飞行员驾驶我那架葛鲁曼式的小飞机回去，载些照相材料和两个陆军摄影师来，使我们的报纸将来也可以得到一些关于这次会议的资料。

事实上，英国方面顾问、随员、侍从、跟班之多在另一方面也使安诺德感到十分困惑。在后来举行的参谋会议中他发现他处于一个极不利的地位，因为他根本没有带助手来，而与他地位相等的英国代表既有秘书，又有侍从，还有大批助理员，因此在几次会议席上，我便被临时抓差，去当陆军航空部队的记录员。

在他们会晤的第一天，父亲和丘吉尔，还有霍浦金斯一起进午餐。霍浦金斯是陪丘吉尔一同上船来的。这次又能看到他我觉得很高兴，尤其是看到他的精神比以前好了一点。对于他的健康的改进我是有些小小的功劳的。在上个月赴伦敦以前，他曾经在甘特湖停留了一下，我们带他去钓了一天鱼，我们这次钓鱼是十分地道的。在一天之中，他似乎年青了十岁。现在他又回归到他的工作岗位上，忠实地苦干。

其余的人都是海军上将金氏的客人，另外在一起站着吃午饭。吃完午饭

后我回到舰长的房舱内，父亲正和丘吉尔面对面地坐着，很有礼貌地在争辩。

“根据我的情报，佛兰克林，你们美国人民的人心已经倾向于我们。可以说他们已经准备参加这一伟大的战争了。”

“你同时也可以看到许多和你的情报相反的情况。”我父亲冷冷地回答。

“可是关于租借法案的那次大争辩……”

“假如你真的关心美国舆论，温斯顿，我劝你还是每天多读些我们的国会记录。”

两个观念现在是正面冲突了：丘吉尔很明显是被一个思想推动着，就是，我们应该立刻和纳粹德国宣战；而我们的总统则处处都在顾虑到人民的舆论，美国的政治，以及许多反复无常的无形的条件与因素。最后，喝完了他杯中的剩酒，丘吉尔站了起来。已经是快两点半了。父亲说他代表我们的海军送了些礼物给威尔斯王子号以及保护它的三条驱逐舰上的全体官兵。丘吉尔点了点头，短短地道了声谢就走了。

那天下午，一千九百五十包礼物盒，里面有香烟、鲜果等，便送到英国方面分发给他们的官兵们。而那天下午，两方面的参谋长们按照议事日程开始工作：生产量、优先权、船舶、战争资源——物资、人力、财力——所谓现代战争中的三大要素。这次会议中我也帮安诺德将军处理了一些事务。后来，会议完毕以后，我给一位美国的海军军官点了支纸烟，一起走出会议室。“爱我们？”当我们走向正中甲板的时候，他喃喃地说，“他们要的是咱们的命呀！”

他所讲的一点也不错。可是像我这样一个人，亲眼看到了英国的战争性质以及他们眼前所碰到的种种阻碍与困窘，是很难能够在同时完全保守客观态度的。

星期六晚上，在奥古斯大号上舰长的沙龙里举行了一次正式的公宴。我父亲是主人。丘吉尔当然是主客，坐在他的右边。其他的宾客有英国外交部常务次长贾德干，丘吉尔的侍从乞威尔爵士，威尔士，霍浦金斯，哈立曼和英美双方的各部参谋长们。晚餐的时候，以及晚餐后直到午夜的时刻，我看到我父亲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在他所参加的任何一次集会中，他总是主宰一切的。这并不是因为他坚持他的领导权，事实上这是他的天赋和自然倾向。但是今天晚上他却完全相反。这天晚上他只是静静地听。另外有一个人在支配着听众，使用着他华丽的、滚熟的、周期性的演词，不太花巧，可是却永远那么像果子似的圆熟而恰到好处，使听众们感到他的句子好像是可以抓到手中而挤出淋漓的汁来似的。那天晚上，是丘吉尔在支配着我们全体，而每一秒钟他都意识到他在支配着把握着我们。父亲那天晚上只是偶尔地投一两句问话使他继续他讲，使他把他肚子的东西都讲出来。霍浦金斯也偶尔说几句话，不过只是在丘吉尔停住换气的时候。大致说来，我们穿军服的人都保持着沉默，只不过偶尔跟坐在一旁的人低低他说一声：“有火吗？”“谢谢你。”“请把水瓶传给我。”“嘘”“他肚子里好像醋挺多似的？”“是呀，还没完呢。”

丘吉尔很少往后靠在他的椅背上，老是把嘴上的雪前一下子从左边换到右边，一下于又从右边换到左边，形成一个很得意的角度，两个肩膀往前耸着，活像一只壮而大的水牛，他的手时常在空气中挥动着，帮助他的表情，他的眼睛闪着光，那一天晚上是他发言的天下，他滔滔不绝地谈着。我们之所以保持沉默并非是因为我们觉得厌倦了。即使在我们和他意见不合的时

候，他都有那种魔力把我们慑服住。

他谈到战争的经过。他谈到每一次的战役，失败了的战役：“可是在任何一次战争中英国都能获得最后的胜利的！”他以相当的坦白告诉我们，他的同胞怎么样曾经事实上一度接近溃败的地步：“可是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太笨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他们不敢。”有的时候他的谈话中又带着一种坚决的恳求的色彩：“这是你们唯一的机会！你们非得参加到我们这一边来不行！假如你们一定要等他们先给你们一个打击才参战，那么他们就会在我们被打垮以后再来打你们，而他们的第一个打击也就是他们最后一次的打击！”但是即使他的听众能够觉察出他语调中所包含的恳求，他的整个风度与架子还是给人以一种不屈不挠的印象。表示即使你们不接受我的警告，我们自己还是有办法想的。

但是一有机会，我父亲总设法问他一声：“那么苏联呢？”

“哦，苏联！”他的声调中含着很明显的轻蔑，可是他很快就发现他的疏忽，赶忙补上一句：“当然罗，他们是比我们所敢期望的程度要强得多。可是谁知道他能持续多久，……”

“那么你认为他们是不能持久的？”

“在莫斯科陷落以后……只要德国人越过了高加索……当苏联人最后停止了他们的抵抗……”

他的答复永远是肯定的、无条件的。他连“假如”这个假定词都不用，对于苏联的抵抗他可以说没有什么信心。在那一个8月的晚上，他的手里握着一颗骰子，而他是预备孤注一掷的。他急切地要我们明白租借法案中最大的部分应该归之于英国，给苏联的任何援助都只是迁延时间，而最后终归无效的。这种见解更使他得到一个最后的结论：

“美国必须参加到我们这一边来！你们必须参加，假如你们想生存！”

父亲坐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有的时候擦擦他的眼睛，玩弄一下他的夹鼻眼镜，或用燃熄了的火柴在桌布上随便划着。围坐在那一间充满卷烟味的沙龙中的美国人都保守着缄默，不置可否。

那一晚好像是两个友好对手的第二场拳斗。没有什么决定性的结果，可是群众里也没有一个人想大声地喊他们加些油，好好地再干几手。我们希望双方都胜利。

星期天的早晨，在我们离开奥古斯大号到威尔斯王子号的甲板上去做礼拜以前，我得到一张条子，说那一架小飞机已经回来了，带了两个陆军航空队的摄影师和大批的胶片。我把这消息转告安诺德，他叫我请他们一块儿来。

我们的小艇被吊上那条英国军舰的时候，已经过了十一点。一星期来像铅似地郁结在我们上空的润湿的云块在开始分散，好像是得到了什么信号似的。

阳光从云隙中射下来。

排列在甲板旁的是英国船上的全班人员；站在他们一旁的是二百五十名我们的水手与陆战队的兵士。船上的祈祷坛前垂挂着英美两国的国旗。

“啊，上帝，愿你在战争的日子里坚定我们的意志，”牧师祈祷说，“增强我们的决心：我们不是和人们为敌，而是反对奴人们灵魂的黑暗势力，我们将战斗不息，直到一切敌对行为和压迫都被消灭干净，世界各国人民从恐惧中获得解放，作为上帝的孩子互相服务。”

祈祷首先为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其次为他们的大臣们、海军将领们、

陆军将领们，然后为被侵略各国、伤病员们、俘虏们、被迫离乡背井与无家可归的人们、焦虑悬盼和丧失亲人的人们。而且还祷告：“但愿我们能从仇恨、痛苦和各种复仇精神中保存下来！”

祈祷之后，接着响起了千百个青年人的歌声，我们百感交集地唱着父亲亲自为这一天选定的一首水兵赞美诗：

“永恒的上帝，万能的救世主，
汹涌的波涛已被你制服。
你挥动巨臂，力挽狂澜，
深邃的大海被迫就范。
啊，人们在海上遇难，
请倾听我们的呼唤。”

父亲心潮起伏，竭力抑制住刺眼的泪水。他情不自禁地向丘吉尔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这位坚强的英国捍卫者正在偷偷地擦眼泪。

我们还齐唱“主呀，你是我们古代的恩人！”“前进，十字军的士兵”，以及“不朽的主”，我们高扬的歌声有力而温暖地散布到海面上。我们一起齐心祈祷。

我不晓得旁人在想些什么，可是我自己则在想：这儿，在这个甲板上，头上蒙着不时从云雾中透射出来的阳光，是一对领导着两个强大国家的重要人物。想到这里，我就想到在英国有千百万人辛苦地工作着，白天制造着炸弹，夜晚则不眠地躺在炸弹下面。我想到英国的陆军，被打退了回来还保持着森严的气魄；穿着长裤，短裤的英国士兵们；肩上缀着“COMMANDO”字样的义勇兵团；穿着蓝军服的英国皇家空军。这一条船上的军官和士兵们，他们已经战斗了那么久，又那么疲乏，他们都认为这一次航行是天赐的休息，而这些可怜的人们，又有谁知道在几个月以后这条船会被日本的鱼雷所打沉呢？

我又想到在我的家乡，美国，工厂里开始有了新的生命，千百万走出厨房的女人和走出农场的青年们都开始在学习新的、刺激的、重要的手艺，每个人都多少受到了战争的波动。假如他们既不在军队里又不在战时工厂中工作，那么深夜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大街上巡行，头上戴着防护团的钢盔，他们或许觉得这种行为有些傻，可是他们却感觉到他们毕竟是他们国家的一分子；每个人都是一个伟大的努力。

假如说英国目前有些透不过气来，在一连串豹拳击下有些步伐不稳，那么美国已经开始鼓起他坚韧的肌肉，在摩拳擦掌了。

而这儿站着他们的两个领袖。他们在祈祷：我们的主，你在天国，你神圣的名字……

祈祷以后我们就留下吃午饭，丘吉尔做主人。在吃饭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叫大家静下来，高声喊道：“诸位，英国女皇万岁！”接着是一阵子椅子移动声，脚步摆动声，于是一片沉静，大家把杯子高高地举起来，干了杯中的酒。这未免有些宫廷味的炫耀，也容易引起人们的冷嘲，但这也是一个不可否认地感人而且不能忘怀的场面。至少对于没有经历过这样场面的我，是有这样的感觉与反应的。

当天下午要开军事会议，在我们回去的时候，我告诉父亲早晨做礼拜时我所想到的一切。

“那是我们的主调，”他说，“假如我们在这儿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故发

生，我们今后将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前进，十字军的士兵！’我们是十字军，我们要前进，靠着上帝的援助。”

下午会议中，两方面的军事代表都抱着不同的意见，因此会场的空气便和早晨的那种理想的团结迥然不同。英国代表坚持他们的主张，用种种理由来说服我们，想要我们把更多的租借物资交给英国，尽量减少给苏联的物资。我不相信他们的动机完全是政治方面的，虽然我们得承认，拆穿了来说，他们对苏联持久性的缺乏信心就是由政治原因促成的。在谈论中，马歇尔、金氏和安诺德继续坚持必须给苏联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因为这是合乎逻辑的。再说，我们的理由是建筑在德军已经进入苏联领土的这一事实上；多给苏联一些坦克、飞机、大炮就等于多杀死些纳粹士兵；给英国的租借物资，在目前，是没有什么效用的，最多也不过是增加其囤积的数量而已。我们在另一方面当然不能忘记我们自己国防上的需要，建设我们自己的海军与陆军还是需要很多物资的。

英方的庞德海军上将、狄尔陆军上将、费利曼空军上将，他们三个人在辩论中屡次声明囤积在英国的物资和军火在结局的时候对盟国的总的战斗力将有更大的价值。他们反复地鼓吹他们的观念，说给苏联的一切战争资材结果一定会被纳粹们俘获过去；而为美国本身的利益着想，美国非把大部分的物资送给英国不行。幸运地，美国的发言人是在一个不同的光度下来看美国本身的利益以及整个战争的广泛利益。从我个人来讲，我那时怀疑英国的目的是否想使纳粹与苏联两败俱伤，而英国趁此机会强大起来。

会议进行的时候，我父亲在和威尔士校阅一部分草稿。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草稿的内容，后来我们才明白他们那时校阅的正是大西洋宪章，以及给斯大林的一封短信，阐明我们打倒希特勒的一致决心。

那天晚上，丘吉尔回到我们奥古斯大号船上用晚餐。这一种场合大家感觉到随便多了；挂满金章饰带的几位雄纠纠的军人都走了。参加这个晚餐会只有父亲、丘吉尔，以及他的几位贴身的侍从，还有小佛兰克林和我。因此这是认识丘吉尔的一个好机会。

晚饭后，丘吉尔又像昨晚一样精神抖擞了。雪前一支接着一支燃成烟灰，杯中的白兰地酒很快被喝干。可是他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假如说有，那就是他的头脑与心计运用得更清明，而他的辩舌也更灵活了。

可是和昨晚的谈话对比一下，今晚的空气的确有些不同。昨晚，除偶尔的一些发问外，丘吉尔是毫无阻碍地一个人滔滔不绝地在发言。今天晚上，还有旁人的思想与意见被掷进这一锅热水中，而这锅热水因之沸腾起来，有一两次几乎泼了出来。旁观者似乎意识到这两个一向居于领导地位的人物已经在冲突起来，已经试探了对方的能力，而准备正面挑战了。我们应该记得在这个时候丘吉尔是战争的领导者，而父亲不过是通过有形的方式来表示同情的某一个国家的总统而已。因此，丘吉尔便依旧掌握着谈话的线索，依旧支配着整个饭后的时间。可是我们已经能感觉到空气中有些异样的味儿了。

关于帝国问题的讨论第一次明显地证实了我们这一种感觉。

是我父亲先开始的。

“当然罗，”他似乎很确定他说。“战后维持永久和平的先决条件是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实行贸易自由。”

他停顿了一下。丘吉尔的头低了下去，他透过他的眉毛，稳定而警戒地瞧着我父亲。

“不准有人为的障碍物，”父亲继续说，“特惠经济协定愈少愈好，大家都有经济发展的机会。市场必须开放，给各国作健康的竞争。”他的眼光很天真地在室内扫视了一周。

丘吉尔在椅子上不安地移动下身子。“大英帝国的贸易协定，”他深重地开始，“是……”

父亲赶忙插进来说：“是的。这些帝国的贸易协定就是一个例子。就因为有了这些协定，印度、非洲、以及殖民地化的中东和远东到现在还那么落后。”

丘吉尔的脖子红了，他把身子凑向前来。“总统先生，英国从未提议过在大英帝国的属领中放弃特惠的地位。使英国伟大的那些贸易必须继续，而且要在英国大臣们定的条件下继续。”

“你瞧，”我父亲说，“我早就知道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意见是不会一致的。”

“我坚决相信假如我们要建立一个巩固的和平，我们必须开发一切落后的国家、落后的人民。怎么样才办得到呢？很显然，假如我们仍然采用十八世纪的方法，这是永远办不到的。现在——”

“谁说十八世纪的方法？”

“我不知道是你的大臣中的哪一位曾经介绍过一种政策，主张把殖民地国家中的原料财富都搬走，却丝毫不给这个国家以任何报酬或是代价。二十世纪的方法是把工业介绍到这些殖民地中。二十世纪的方法是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给他们新的教育，给他们卫生的设施，以增加这个国家人民的财富，使他们明白他们的原料虽被搬走，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是得到相等的报酬的。”

屋子里的人全都凑过身子去，很注意地听着，霍浦金斯脸上带着微笑。丘吉尔的侍从汤姆生海军中校脸色变得很难看，有些吃惊的样子。丘吉尔自己也开始有些手足无措了。

“你是在指印度。”他带着吼声说。

“是的。这仗是没法打的，假如一方面说我们是在对抗奴役人民的法西斯，而另一方面却不想法帮助全世界的人民从落后的殖民地政策中解放出来。”

“那么你们自己的菲律宾呢？”

“我很高兴你居然提到了菲律宾。菲律宾的人民将于1946年得到完全独立。而他们已经得到了近代化的卫生设施，近代化的教育，他们的文盲一天天在减少……”

“要想改动大英帝国的经济基础是绝对办不到的。”

“可是它们是人为的……”

“它们是使我们伟大的基础。”

“和平，”父亲坚决他说，“与任何延续的横暴主义决不两立。和平的机构必须有，并且一定可以获得民族间的平等。民族间的平等就必然地包含着贸易竞争的最大自由。谁能说德国想在中欧独霸贸易的企图不是造成这一次大战的最主要的因素？”

这一类的争辩很难在这两人之间得到解答。话一路他说下去，可是丘吉尔却慢慢地能够把握住谈话的中心了。他不再一句一句他说了，而是一段一

段滔滔不绝地发言了；海军中校汤姆生的焦急，难堪的脸色也开始明朗起来了。当丘吉尔的声浪又在全室中震荡起来的时候，他似乎恢复了他的自信，可是却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答，而这个问题在他们所参加的下一次会议中，以及再下一次的会议中都始终没有获得解答。印度与缅甸，这些是被责难的主题。我父亲，既然已经一度大声地提到这个问题，以后就经常在他的英国宾客面前用这个来提醒他们，他的坚硬的手指正点住他们隐痛的太阳穴，不断地戳，不断地刺。我父亲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恶意的，实在是由于他坚决的信仰。丘吉尔是很明白这一点的，因此使他更觉得忧虑。

他很圆滑地改换了谈话的主题，他很圆滑地谈到霍浦金斯，我的弟弟，我以及任何人来避开谈话的主题，使我父亲不再有机会提到殖民地的问题，以及他所坚决反对的不平等的大英帝国的特惠贸易协定。

直到深夜两点钟的时候，英国的客人们才起身告辞。我扶我父亲走进他的卧舱，坐下来陪他吸最后的一支烟。

父亲咕哝地说：“一个地道的耆式保皇党，是不是？一个十足的保守的保皇党。”

“我看他最初好像要爆炸，爸。”

“喔，”他微笑了一下，“我有办法跟他在一起干的。关于这一点你不必担心。我们会在一起很有名地干下去的。”

“只要你别提到印度这个问题。”

“姆，这我很难讲。我想在我们完结以前，我要多多地谈到印度。不仅印度，我还要谈缅甸，谈爪哇，谈越南，谈印度尼西亚，谈一切非洲的殖民地，谈埃及与巴基斯坦。我们这一切都要谈到。有一件事你可别忘记。老丘这一生中有一个最崇高的使命，可是只有一个。他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战时内阁总理。他最大的任务是使英国安全地度过这次战争。”

“我得说他自己似乎也的确表示他只想做到这一点。”“是的。可是你是否注意到只要我们一谈到战后的问题，他总设法把话题支开了？”

“你所谈到的许多问题是相当难于应付的。尤其是从他着想。”“除此以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他只有一副做战争领导者的十足的头脑。可是要丘吉尔在战后领导英国？那是完全没用的。”现在事实证明，英国人关于这一点是和我父亲有同样见解的。第二天早上十一点钟左右，丘吉尔又亲自跑到奥古斯大号的舰长房舱里来。他跟我父亲一起工作了两小时，他工作的对象就是大西洋宪章。他和贾德干、威尔士、霍浦金斯和我父亲一起围着那张草案，聚精会神地研究着，直到午饭的时光才休息。在这两小时之内，我在这房间里走进走出好几次，只听到他们谈话的片段，可是我却始终奇怪丘吉尔究竟以怎样大的神通使他昨天晚上所说的那些话居然和这部大宪章的精神一致起来。我相信他自己也一定在同样地诧异着。

写到这里，我必须顺便提一下，威尔士是为这部宪章操劳最多、对它贡献最大的一个人。自从他们在华盛顿开始考虑要草拟这部大宪章的日子起，他便始终为它而忙碌；这部宪章实在可以说是他的产物。当他从华盛顿飞来的时候，他的公文包中便放着这部宪章的最后稿本；在当时，在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部文件，多么重大的一个声明。我们今日之不能履行这重大的声明，这绝不是威尔士的错，也不能说是我父亲的错。

那一天，他们辛辛苦苦研究这文稿的措辞与用语，一直到快吃午饭的时

候才停止工作，丘吉尔和他的随从们向我们告辞，回到他们自己的船上去。饭后，父亲忙着批阅国会送来的许多重要信件与案卷。那天下午有一架专机等着要把这些批示带回华盛顿去。

星期一那天下午，丘吉尔总算有了一些空闲和休息的时间。从奥古斯大号的甲板上，我们几个人看他从威尔斯王子号出发到沙滩上去散步，攀登那儿岸边的一座岩壁。最初我们看到大船上放下一支捕鲸的小艇，上面坐着一些英国水手，他们把小艇划到大船的升降部旁边。于是我们看到丘吉尔穿着一件羊毛套衫和一条齐膝的短裤，从升降梯上一步步走下去。从我们所站的地方看过去，他活像是一个发育过分的大胖孩子，所欠缺的只是一副孩子当玩具用的小铲子和小吊桶而已。一走上那条鲸船，他立刻走到舵旁，便发号施令起来。当那支小船飘过海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得到他大声的吼叫——水手们则齐心协力地划着桨。不久，我们就看不到他们了，可是从旁人那儿，我们知道他们后来干了些什么。据说丘吉尔一个人爬上了那座高约三四百英尺的岩壁。爬上去以后，他从岩壁的隙缝里看到他的几位伙伴正舒服地躺在沙滩上，希望享受一些难得的阳光。丘吉尔先生马上拾起了一堆石子，居高临下，很得意地向他们身上掷过去，把他的那些沮丧的侍从们打得七零八散，四处逃奔。

晚上七点钟的时候，丘吉尔赶回来和我们一起晚餐。这一晚我们真是随便极了。一起吃饭的只有霍浦金斯、小佛兰克林、我和这两位领袖，那是给我们松弛一下的机会。不管前一晚的辩论多么热烈，我们又是一家人了，很迟缓很随便地聊天。可是那个英国人还念念不忘想说服我们，要美国立刻对德宣战，可是他明知道在这一方面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这几天里面，我们接二连三地收到关于双方军事会议的报告：双方都已经感到英国如果要得到最后胜利，是非依赖美国的生产与军事行动不行的。诸如此类的感觉与认识是一定会影响到两位领袖关系的。于是在不知不觉间，领袖的外衣慢慢地从英国的肩上滑落到美国的肩上了。我们亲眼看到这一种转移，那是快近深夜的时候，话题突然又触及到昨夜使我们全体沉默的那场辩论了。在我父亲看来，那将是丘吉尔对他明言的保守主义的告别词。这时候，丘吉尔已经站起来，在房内来回地踱着，一边说话，一边做手势，最后走到我父亲跟前，突然站住了，有半晌不说话，对我父亲瞧着，忽然间他伸出他粗胖的食指，在我父亲的鼻尖下挥动着。

“总统先生，”他大声地叫道，“我相信你是想毁灭我们的大英帝国。关于战后世界组织，你所抱的每一个观念都显示出你这一种企图。可是虽然如此，”他伸出的手指挥动了一下，“虽然如此，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并且，”他的声音戏剧性地沉了下去，“你已经知道了我们晓得这一点。你已经知道了我们晓得没有美国，大英帝国是站不住脚的。”

丘吉尔承认只有按照美国所定下的方式与教条和平才能获得。而在他说上面那些话的时候，他承认英国的殖民地政策是走不通的，英国想支配世界贸易也是走不通的，而英国想在美国面前离间苏联的野心也是没法实现的。

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假如我父亲还活着的话。

在大西洋会议期间，父亲和丘吉尔就这样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讨论，其中有一次特别机密。

“你们的人在核裂变方面，干了些什么没有？”父亲见只有丘吉尔和霍普金斯两人在场，便问道。

“干了不少，”丘吉尔回答。“把彻韦尔教授请来！”

彻韦尔教授叙述了英国科学家们在约翰·安德森爵士领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研究成果和美国科学家所获得的结果极为相似。在某些方面，英国人已走在美国的前头。

“这东西可能厉害得不得了。”父亲指出，“我们最好联合起来干，抢在纳粹分子的前面。”

“非常正确。”丘吉尔说。于是立即达成一项互通一切情报的协议。

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英国的财政大臣贝弗勃洛克爵士也参加了会议。同时，双方的“军事对头”们也在海军上将金氏的房舱内举行会议。两点半的时候，大家对行将发表的联合声明已经获得了最后的同意。这个周末主要的外交方面的工作已经全部达成，我知道父亲和威尔士二人的心中充满了欢喜与得意。当每个人走出舱房来到奥古斯大号甲板上的时候，全体人员的印象好像是一个伟大的微笑。警卫队和舰上的乐队整齐地排在一旁，当丘吉尔跟着英国各部的参谋长们走下我们巡洋舰的时候，乐队奏起“上帝保佑吾王”的英国国歌。会议的工作就此全部结束。第二天用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大臣二人的名义代表美国和英国发表了这部历史性的《大西洋宪章》，声明下列八点：

- （一）英美两国没有扩张领土或其他野心；
- （二）英美两国绝不容许有违反当地人民自由意志的领土变更；
- （三）英美两国绝对尊重各国人民选择其政府方式的权利；并且愿意使一切在武力下丧失宗主权与自治权之民族恢复其应享有的权利；
- （四）英美两国努力使一切国家，不论大小，战胜国或是战败国，均能享受平等权利以经营世界贸易并获得本国经济繁荣所必需的世界资源；
- （五）英美两国将促成世界各国间在经济领域内的密切合作，保障各国的劳动生活改善，经济调整与社会安全；
- （六）在专制的纳粹主义彻底消灭以后，英美两国希望能建设理想的和平，使一切民族都能安全地居住在国境之内，并且保障居住在任何土地上的任何居民都能自由生活，不受恐惧与贫困的威胁；
- （七）这和平将使一切人民都能毫无阻碍地横渡公海；
- （八）英美两国深信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为现实以及精神上的理由，最终将放弃武力。威胁或可能威胁邻国国境之国家，如果继续运用其海陆空军备，将来的和平就难以维持。因此，英美两国认为唯有解除这些国家的武装，才能建立广泛性与永久性的安全制度。英美两国同时将协助并鼓励其他有实际意义之方案实现，使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减轻其军备负担。

在我看来，这个声明有着特殊而辛酸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当我后来看到了这个声明的文字与精神同时被人背弃。

前两点我们先不去理它（可是我们还是不得不跟比基尼群岛的居民打个招呼，要知道他们是为了要让我们实验最新颖、最迷人的玩意而被迫撤离家园的），我们拿第三点来看，我们应该反省一下我们对爪哇与印度尼西亚的人民究竟干了什么。第四点我们不妨匆匆地放过，它的神秘实在太深奥了。第五点曾经一度是我们的最高希望。第六点，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还须明日的事实来证明。第七点似乎很安全，至少在目前并没有多大问题（虽然二十世纪的人民不仅希望这一条适用于海洋，并且能早日适用于世界的领空）。最后一点中三句特殊的文句在今天尤其有强烈而尖锐的作用；特别是像格罗

夫斯少将之类的人物是应该把这些句子多读几遍，多听几遍的，他们坚持增加原子弹数量的主张今天已经在逐步代替我们成熟而周密的美国外交政策。

8月12日，英美两国领导人分手时，在“奥古斯塔”号的甲板上，丘吉尔热烈地握着父亲的手，然后匆忙走下舷梯，上了汽艇。在他兴高采烈的情绪中，夹杂着一阵惜别的隐痛。当丘吉尔乘“威尔士亲王”号离开阿金夏的时候，美国驱逐舰把他的一艘舰只一直护送到冰岛。他在冰岛稍事逗留，进行了视察。驱逐舰中，有一艘是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正在服役的舰只，他是海军少尉。后来丘吉尔在一次广播中谈到：“就这样，我们乘风破浪，越洋返航，精神为之振奋，决心为之增强。正在给冰岛美国海军陆战队送文件的几艘美国驱逐舰，恰好与我们走的是同一航线，因此我们在海上成为旅行良伴。”丘吉尔意味深长地提到美国驱逐舰“恰好与我们走的是同一航线”这句话，是包含着更深的一层意思的。

我站在父亲的旁边，扶着他的手臂，看那条英国的战舰驶出港口后。我们自己也匆匆道别，因为奥古斯塔号按照预定的计划接着就要出发。天气十分阴沉，有雨意；坐飞机回甘特湖是不可能的了。最后，我和贝弗勃洛克爵士两人不得不上岸坐火车回到我的基地去，在那儿我预备替他订一个飞机座位到华盛顿去，他要跟我们租借法案的代表们继续开会。

“贝弗”和我到甘特湖去所坐的火车是一件真正的古董：木头的座位，每节车厢中都有个小火炉，每走十哩路要在站上停上二十分钟。不舒服的旅行不合我那位贵客的胃口。当一位挺和顺的车上侍役不小心领错了我们座位的时候，这位“贝弗”爵士大发雷霆，用他神异的尖锐的声音足足训了他三分钟，用语中还夹杂着不少毒辣粗俗的英国字眼。这位侍役居然能受得住他这顿训骂，相当出乎我的意料。我相信他不是个哲学家，便是个聋子。

当我终于安静下来的时候，便在脑子里分析前几天的重要性。英国人已经亲自上门来求援了，可是却带着高傲的态度，有的时候简直可以说是有些狂妄的。我们的领导者虽然意识到英国人已经陷入战争中，而这个战争也可以说是代我们打的，代我们一切美国人打的，可是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却还没有能够清楚地觉察到他们的危险。美国还在从和平到战争的途中。我们的参谋长们的任务是非常微妙的，他们得把英国的要求和苏联的要求在天平上小心地均衡一番，使这两个作战中的国家都能从我们这里得到足够的援助去打击纳粹们。

那些日子的记录曾经深深地感动了我，今天我还有同样的感觉。在那些日子中，美国的命运被操在稳固的掌握中，掌握美国命运的那些人们一方面不借以任何方式维持我们国家的和平，另一方面又在保护着遥远而悠久的国家利益。

那一个8月，在沃根基的海港内，总统和他的参谋长们所安排的赌博中，时间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可是我们今天回顾一下，这个时间是很短暂的，战争正匆匆而来。

第三章 CHINA 不能倒下

美国还没有准备好
英国是第一梯队，让美国来结束战争
丘吉尔会客一丝不挂
罗斯福：我要会见斯大林

在北极地带的侦察工作是不十分活跃的，尤其是我从沃根基参加了军事会议回来以后，我更觉得这工作沉闷乏味。幸而我的中队在九月初就接到命令调回美国，那是会议结束后还不到两个星期的事。一回到国内，我立刻申请进航空学校受训。我想即使没资格做一个正式的驾驶员，至少可以做一个航空员，这样，我就会有更多的机会被派往海外。我暗暗地祈祷申请能被接受，而这心愿竟然有了效应。9月底接到通知，申请书已被批准，令我即刻到德克萨斯圣安东尼奥市凯莱机场报到。我曾经做过地勤，干过情报工作，而现在又要担任空勤任务了。

我翻阅了我刚回到美国和初到凯莱机场时的日记，几乎在每一页上都记录有当时美国的那种升平安怡、一片和平的景象。对于刚从国外服役归来的我，这种气氛当然是十分刺激的；我相信那时候每一个从英国回来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因此关于这一点我似乎不应该有过大的惊异。可是当我亲耳听到朋友们苦苦地劝我（事实上有三个朋友曾经这样劝过我），说我现在应该脱下制服，因为目前营业情形好转，并说我已经放过了好几个发大财的机会等等。我实在忍不住了，开始是跟他们辩论，后来看他们对于世界大势的真相已经是麻木不仁了，索性保守沉默，对他们置之不理。在1941年9月，要想和他们争辩，说服他们，是毫无效用的。关于当时人民心中那种自得其乐、歌舞升平气氛的由来，主要是因为一些美国最重要的报纸造成的。这些报纸是《芝加哥论坛报》、《汉斯脱》一系列报纸、《纽约日报》、《华盛顿邮报》、以及《斯克利浦斯——霍华特》一系列报纸。它们音调一致地唱着安乐柔顺的迷人曲调。如果说这美妙的调子是当时全国民气的反映，那么我们的报纸便没有尽到它们的责任：给人民以正确的报导与认识，假如报纸的发行人认为他们当时已经尽了这个责任，那么我们便可以毫不客气地给他们所谓的正确报导、正确认识定一个不好听的名称。

12月的第一个周末，我获准探亲休假，回到华斯堡外我的农场。假如一切都顺利，再过几天我便可以毕业了。当然还不知道毕业后我会被派到什么地方去，因此毕业之前希望能回家住一两天，跟我的孩子们在一起。

星期天早晨我起床很迟，一吃完早饭我便出去骑马。到下午三点钟我才回家，妻子告诉我哈金生和卡格尔从电台上打电话给我。我想他们大概是要在我回圣安东尼奥之前跟我谈些业务上的事情。当时我并不想谈生意，因此也就没去理他们。孩子们想听音乐，插上了无线电，几分钟后我便明白为什么方才哈金生和卡格尔打电话给我了。音乐刚开始，我就听到了紧急广播，命令一切在外休假的官兵立刻回到驻防地报到。这命令叫我们一刻都不准迟缓。

在大家七嘴八舌地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赶忙脱掉我的农场服装，穿起军服，打了个电话给凯莱机场的副官，副官命令我当天下午立刻坐汽车返回营房驻地。在等候我的汽车开出车库的时候，孩子们争着问我：什么是珍珠港？它在什么地方？片刻之后汽车已经调到大门白，我匆忙地跟家属说了声

再会，便向南出发。

在去圣安东尼奥的路上，我越过了千百个步行回驻防地的军人。我的车可坐四个人，因此在马萨诸塞我搭了一个人，在东西德克萨斯各搭了一人，最后在北卡罗来纳我又搭了一个年青军人上来。

在凯莱机场，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地兴奋而茫无头绪，每一小时，都有更多，更吓人的谣言传来。我向副官与值日军官报到以后，便回到在机场附近租来的公寓中，立刻打了个长途电话给我父亲。长途电话足足打了两个钟头才打通，在接通电话之前，我真有些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电话铃声响了，我抓起话机。在那一头说话的是海克梅丝脱小姐，她是白宫的主任接线员。

“你好？”

“是伊利奥上尉吗？”

“你好，海克……父亲忙吗？”

“我马上给你接通。我不过是想先问一问究竟是不是你。”

电话里沉默了一下子，我就听到父亲的声音。

“是伊利奥吗？”

“你好，爸！”我差不多是在大声喊叫了。

“你好吗，孩子？”

“我？我很好，你呢？”

“很好……当然罗，忙得很……”

“有什么消息没有，爸？”

“消息？当然，事情看来是相当严重。你那儿有什么消息没有？”

“我这儿？”

“是呀，你听到些什么？”

“谣言多得很，他们说我们全体明天就要坐船出发……所有的中队都要开往菲律宾去……”

“真的吗？”

“方才我又听说日本人在墨西哥有一批登陆部队，而德克萨斯随时都可能受到敌人的空袭。”

“喔。”

“又有一个谣言说日本人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有力的地面机动部队，都是步兵，从墨西哥越过国界来攻打德克萨斯或是卡罗来纳……”

我听到父亲嘴里咕哝了一声，显得很感兴趣，然后我听到他说：“很好，假如你再听到些什么新的消息，一定马上告诉我，好不好？”

“当然，当然，爸！只要我……”

我可以听到他把受话机放回到机座上的响声。于是我只好把电话扣上，而开始……

嘿！

这到底究竟是怎么回事呀？我打电话本想从他那儿打听些消息出来，而结果是我告诉了他……

而他还想要我听到什么新的消息再报告给他。真是总司令与上尉之别！

我叹了口气，倒头便睡了。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我的航空课程还是照常继续，直到毕业的那一天才结束。命令指派我参加第六侦察中队，那时候，这个中队驻防在西部海岸，司令部则设在靠近加利福尼亚兰卡斯特沙漠穆洛克于湖。我们的工作是在太

平洋上巡逻。一直到次年的1月为止，我先在第六侦察中队，后来又转到第二侦察中队。最后，出我意料之外，接到一道秘密命令，叫我立刻出发到华盛顿勃林机场向第一测图联队的司令官报到。

关于这一命令，以及我将来工作的性质，似乎是很机密似地，因此我的希望突然一下子窜入云空。我想一定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多半是要派我到海外去……

结果，的确是派我到海外去，不过当我知道新的工作性质，不免有些沮丧了。这新的工作有一个暗号名称，叫做“铁锈的计划”，这工作是如此地乏味，因此我觉得它不仅是“铁锈”简直是“破碎”。我和另一个航空员被派到海外去担任空中情报和测图摄影工作，工作对象是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天呀，非洲！

在我出发前，有机会和我父亲谈了一次话，那是在他早餐后，开始工作之前的一段时间。在谈话中我带些失望的情绪告诉他我最初以为是相当重要的新工作。说老实话，这工作保密性很强，可是我认为他作为全国海陆空军总司令，一定是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他事先早就知道我的工作情况。听完了我的话，他马上给我解释，为什么在事实上我的这一新工作是比我所想像的更为重要。像他每一次的解释一样，他的话总给我不少新的启示，尤其是关于这次世界战争中的许多问题与战术。当我告诉他我的新工作情况的时候，他的脸上泛起了欢喜的神情。我接着就开始埋怨起来，告诉他为什么我认为这一类工作是不值得小题大做，他一边听着，一边自己又煮了一壶咖啡（爸总是爱自己煮咖啡，他认为厨房中的那些家伙是永远不懂得怎样来煮一杯地道的好咖啡）。

最后，当我讲完了为什么我认为这工作是不重要的以后，他开口了：

“你完全错了。你以为你不过是被派了去照一大堆沙漠的相片，而那是既浪费时间，又浪费胶片，可是事实决不是如此。你应该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先问你，我们是不是应该极力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

“当然……我以为是应该的。”

“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

“日本？”我怀疑地问。

“为什么不会呢？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侵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路。”

“那么这和非洲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知道在目前我们是怎样把军事给养运到中国去的？”

“通过缅甸路。”

“假如缅甸陷落了呢？”

“从印度空运过去？”

“对了。那将是唯一最迅速的办法。现在，我们要把物资运到印度去……”

“我懂了，地中海。”

“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知道保障船舶运货到苏联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摩尔曼斯克那一次的攻击……”

“简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所以现在我们要打算利用波斯湾。我们还必须不断地考虑到怎样使我们的物资能一路安全地运过非洲的南端。你还必须记住即使是在马达加斯加岛上，都有人甘心愿意给日本和纳粹的潜水艇做掩护。我们必须掌握住地中海的航线，因此……”

“非洲，我懂了。最初使我始终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兜圈子，浪费时间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一次总准备，直接从英国方面狠狠地给纳粹正面进行一次沉重的打击？”

“事情没那么简单。别以为我们已经达到了全速度生产的地步。”父亲很苦涩地笑了一下，“别一下子把希望提得太高。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两点：中国人是在抗击日本人而苏联人在抗击德国人。在我们的海陆军还没有充分配备，还没有能力来帮助他们以前，我们必须使他们能够继续目前的这种抵抗。所以我们必须设法送给他们千百倍于他们以往从我们这所得到的物资。非洲就是使他们能够获得我们物资的保障。”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非洲。纳粹们停留在撒哈拉大沙漠并非是想洗一个大大的日光浴。为什么他们想要埃及？为什么他们想取得中非？要知道从那儿到巴西并不很远。贝夕法尼亚街很可能会改名为希特勒街，别以为我是在开玩笑，这是十分可能的。”

“你应该在沙漠上多照几张有价值的照片，千万别想到你的工作是在浪费胶片！”

欧莱从门口探进他的头来，很有意义并夸张地看看他的表。父亲大声地笑了。

“两分钟就好了，欧莱。”他说。我相信当时我的脸色一定是颇为沮丧，因此父亲耸起了眉头，带着询问的目光看着我。

“这战争是那么伟大艰巨的一项工作，”我说，“而我们离完全准备就绪这一阶段却还是那么遥远。”

“你可以把这场战争比做一场英国式的足球赛，”父亲回答我。“我们就好像是预备队，先坐在一旁的长凳上看人家比赛。俄国和中国形成先上场的第一队，在某一种程度上，英国也可以说是第一队的队员。我们是预定了要做那……那俗语中叫做什么的？是不是叫结束全局的生力军？”

“我懂得你的意思。”

“在球赛进行到我们的先锋队员快要疲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参加进去作最后的拼搏，以决定全局的胜利。我们应该精神抖擞、元气旺盛地上场。假如我们对时间估计得准确的话，我们的先锋队员那时还不致于完全疲乏。而……”他停顿了。

“而怎么办呢？”

“我相信我们对时间估计一定会很准确。第一，虽然我们国内还有一部分口头高唱失败主义的人物，但是美国全体人民毕竟还是有魄力，有勇气来完成这艰辛的工作的。”

“第二，上帝决不希望这个美丽的世界被少数人统治。他将给我们和我们的盟国以支持战争和获得最后胜利的力量。”

门又开了。“已经两分钟了，”欧莱探进头来说。“好了，那么祝你一路顺风。”父亲对我说。我匆匆地辞退了出来。

所谓“铁锈的计划”所包括的工作地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地区：阿克

拉，在黄金海岸附近；巴得斯特，在英属冈比亚；卡诺，在英属非洲赤道区；拉密寨，在法属非洲赤道区，这“计划”耗费了我整整几个月时间，日夜辛劳地工作着，从空中用摄影来测画出整个西北非洲，有时候遭遇到法西斯的巡逻机，有时候受到炮火的射击，不过大体上讲来，我们是以尽量迅速的手段完成了这一件炎热而枯燥的工作。几个月以后我又回到美国，度过7、8两月，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大部分时光是消磨在医院内的，设法根除我在非洲染上的赤痢与疟疾。当我能够起床，得到军医的恢复健康证明书的时候，我接到新的命令，派我到英国去担任第三摄影侦察联队司令的职务。（我在非洲的时候已经升任少校；这新的职务又使我升了一级，成为中校。）

在回美养病的两个月中我并没有很多的机会跟我父亲谈话。一方面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医院内，而另一方面则是他实在忙得不可开交。我设法去看了他三四次，每次我停留几分钟就退出来了，而每次我都看到父亲一脸疲乏与极力压制住的紧张神情。那些日子可以算是我们盟国战事最不利的日子。英国，中国和苏联大声要求我们供给更多的物资和给养。而我们无法使他们完全满足。在这一特殊时期每一个统帅，每一个领袖都免不了错误百出，这些人苦苦地学习怎么样执行战时的任务，他们以往既不曾做过这种工作，而我相信他们将来也永不希望再做这样的工作。从我父亲的苍白的脸颊中可以看出许多累积起来的辛劳与忧虑，因此每逢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和他什么都谈，可是就不想触及战争这一个话题。

在英国，我的部队驻防在斯蒂泼尔·莫登，离剑桥不远。当时，英美两国的战术家之间发生了一种争论，结果使我们那一年没有对法国海峡边岸实行攻击，而主张等到我们有充分的人力物力而后行动的一派人士得胜了；我的联队的工作是以诺曼底和布列塔尼为对象，担任摄影侦察任务，但这工作只能说是一种训练与经验，为将来在非洲战场上做准备运用的。在9月末，我到丘吉尔的别墅中去过了一个周末。这一次我特别小心，多带了一些行装，因此派头似乎比上次要好一些。晚饭以后，丘吉尔告诉我他预备和我父亲通一次横隔大西洋的长途电话，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和我父亲说几句话。我相信他那种满不在乎的闲话神气完全是假装的；英国的总理大臣打给美国总统的电话费了两个多钟头才接通，我接上话机，先听到政府的检查官提醒双方说话要千万小心，不得走漏机密，接着我就听到父亲的声音，祝我有一个快乐的诞辰。在我们挂断电话以前，我父亲很隐蔽地暗示我，说最近我可能见到家中的一个人，并叫我不必惊讶。

第二天早上，我得赶回我的部队去。丘吉尔派人叫我到他房间去道别。我发现他一个人在房里踱来踱去，除了嘴里含的那一根雪茄而外，全身一丝不挂。天呀！我想，这倒是将来告诉儿孙们的一次难忘的经历。

这所谓“家族中的一个亲人”原来是我母亲。在她到达的前一天，我接到伦敦大使馆的一个电话，说她要到英国来，已经上路了。我赶到伦敦去见她，她一到伦敦就立即到白金汉宫去，我是在那里见到她的。

她在英国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坏天气包围着。就在那一晚我和她一起在白金汉宫参加英王与王后的晚餐会，她已受不住那寒冷了，宫殿中的房间都像马房那样大，因此也就显得特别阴凉。可是我们却没听到什么人诉苦或是不满，这显然表明英国的形势相当严峻，而英国的皇族也得像其他的没有足够燃料的平民一样忍受这种战时的不便。可是这皇宫的房间也实在太大了，即使在平时燃料足够的时候，要想使整个皇宫温暖起来，这笔燃料的开支也一

定会大得使常人难以支付的。

那夜的晚餐会中，除了我们和蔼的主人夫妇，还有史沫兹将军（在晚餐桌上我就坐在他旁边，和他谈说我在非洲摄影的经历，当时我脑中有一个错觉，认为只要在非洲，我当然是他管辖下的居民之一，可他却忘掉了他所管辖的那部分非洲离我从前的非洲工作地还不知有几百英里呢），以及蒙巴顿爵士。蒙巴顿处处都想表现出符合他身份的风流倜傥，勇敢迷人的风度。晚饭以后，我们都退到防空室里，看诺尔·柯特的“精忠报国”，那是一部刚完成不久的新片。蒙巴顿当然是那部片中主要人物的原型。在片子放映中，他不断地对这张片子中用来作故事情节基础的事实与经历加上了许多评语与解释。

那一天晚上，我陪我母亲在她的卧室里坐着，通宵没睡，天气十分寒冷，我们的牙齿直打着颤。

在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我们在准备进攻非洲。后来她告诉我，她那时也已知道那个消息了。可是在那一天晚上，我们的谈话虽然围绕着那个问题在打转，但我们说话都异常小心，生怕泄漏出这事实上我们二人同时都已知晓的秘密。可是最后她却告诉

了我一件我不知道的新闻，那就是我父亲很想到大陆的这一边来，和丘吉尔会面，并且他们都希望跟斯大林也见一下面。这一次飞行使我母亲感到十分疲乏，但是她很高兴地接受了我请她到我驻地来检阅我的部队的请求。

她到斯蒂泼尔·莫登来的那一天，好像英国的天公故意做对，正赶上英国的坏天气中最坏的天气。既寒冷，又刮风，既沉闷，又潮湿。一会儿是毛毛细雨，一会儿又是倾盆大雨。母亲由一群英国的向导陪同着，迟到了一小时，害得我可怜的部属们排着队，冒着寒冷的风雨在行政大厦前的柏油广场上等了好久。她终于到了，大家都兴奋起来，我陪着她一路检阅过去，她那次跟差不多两千人握手，尽可能地和大部分人谈几句话。检阅完了以后，我们赶忙请她进去喝茶（她的向导们要威士忌酒，我们为了不使母亲知道，把酒倒在茶杯里给他们喝）。

第二天，我们参加攻入非洲战役的人们都接到命令不准离开各自的基地。

我的地勤人员于10月末出发到乘船地点。

空勤人员则于11月5日乘飞机向作战地区进发

9日那一天，我们开始攻打非洲，我的联队第二天就在被我们争夺过来的一座飞机场开始工作，我们是在战斗进行中飞入并降落在那里的。

以后的两个月中我不断地工作，那可以说是最忙碌的日子了，每天都有许多必须立刻解决、紧急处理的问题，因此我没有时间去留意或关心战争的其它方面的情况，我所知道的只是以在阿尔及尔的外郊迈逊·布朗基机场为中心的战役。

最后，在1943年1月11日的那一天，我突然接到一道命令，叫我立刻到阿尔及尔的总司令部向同盟国远征军总参谋长比台尔·史密斯少将报到。这一次，多亏我母亲的暗示，在我出发前，我已经多少猜到了些比台尔要我去的用意。

可是去了以后，他什么也没说。他只叫我驾飞机把海军大将殷格沙尔带到卡萨布兰卡去，到达以后即刻向当地野战司令官报到。统辖卡萨布兰卡野战区的那位上校立刻证实了我的猜想与希望。那位上校在偷偷地告诉我那个

秘密的时候，那股兴奋与紧张的劲儿，恐怕他一辈子都不曾有过。你的父亲，他说，“还有丘吉尔，说不定还有斯大林。他叫我在一天半之内不要在外边乱跑，在父亲到达后才准出外，恐怕碰到认识我的人会猜到我是到那儿去接我父亲的。

第四章斯大林老伯伯不来卡萨布兰卡

罗斯福开心得像个孩子
丘吉尔和戴高乐都不愿看到一个殖民帝国的消失
殖民地制度就是制造战争
罗斯福：大战之后，美英中苏应当负责建立世界和平
撒哈拉不应是一堆黄沙
小丘吉尔是个夸夸其谈的年轻人
巴顿：步兵能干什么？飞机能干什么？只有坦克
罗斯福：巴顿是一位非常愉快使人喜欢的人物
丘吉尔喜欢作战地图
无条件投降——罗斯福创造的新词汇
在戴高乐问题上，丘吉尔是个失败者

北非登陆作战取得胜利后，代号为“象征”的会议于1943年1月12—23日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这就是又一次有名的卡萨布兰卡会议。斯大林因忙于对德作战没有参加。会上罗斯福和丘吉尔一致同意：下一个进攻目标是西西里而不是法国，两国在地中海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平均分配人力和物力资源；并决定恢复两国已于1942年6月开始的、关于研制原子弹的绝密会议。他们还设法调解吉罗将军戴高乐将军的分歧。在会议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准则。卡萨布兰卡会议的一个主要战略问题是：英美法军队已从东西两面对突尼斯的德意法西斯军队形成包围之势，胜利在望了。而在击溃这股敌军之后，下一步干什么？

在会议讨论期间，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们极力主张在1943年扩大地中海战场，对西西里、科西嘉、撒丁、多德卡尼斯群岛以及意大利、希腊沿海进行一系列牵制性进攻，打击意大利，使其退出战争，争取土耳其参战，迫使德军分散兵力。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则主张横渡英吉利海峡进入法国作战，但罗斯福本人也倾向于扩大地中海战事，完全控制这一地区。

经过反复讨论，1月23日，罗斯福和丘吉尔以及两国参谋长们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上，参谋长们向他俩递交了关于“1943年作战方针”的最后报告，其主要内容如下：

“同盟国的物资仍必须首先用于击败德国潜艇。必须尽量向俄国运输供应品，以便支援苏联军队。

在欧洲战场的军事行动将按照下列目标进行，即在1943年内，使用同盟国可能用于对德作战的一切兵力，击败德国。

采取攻势的主要作战方针如下：

地中海方面：

1. 攻占西西里岛，目的是——

- (1) 使地中海的交通线更为安全。
- (2) 减轻德军对俄国前线的压力。
- (3) 加强对意大利的压力。

联合王国方面：

2. 对德国进行最猛烈的空中攻势，以打击德国的作战努力。

在太平洋及远东方面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其目的为维持对日本的压

力，并能在一旦德国战败时，立即对日本发动全面攻势。……”

卡萨布兰卡会议还决定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盟军总司令，而在追击隆美尔的英国第八集团军从东面打进突尼斯之后，英国亚力山大将军将担任副总司令，负责指挥突尼斯战线的盟军。在突尼斯战役完成之后，亚力山大将军就负责指挥夺取西西里岛的战事。坎宁安海军上将继续担任艾森豪威尔的海军总司令，阿瑟·泰德空军上将被任命为空军总司令。这个建制将于2月初生效。盟军司令部当前的军事任务就是占领整个北非沿海地带，取得完全胜利，同时做好准备工作，占领西西里岛。而美英两国在北非所面临的政治任务是如何对待法国各派政治力量和法兰西帝国问题。

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英美还调整解决了吉罗将军和戴高乐将军的分歧。对于法国的各派政治力量，英美两国持不同的态度。戴高乐将军及其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一直受到英国的支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也是承认它的），而美国对他长期抱有成见，敬而远之。据戴高乐将军回忆：“美国官员一直和维希政府保持联系，……他们远远避开自由法国……。真正的原因是美国决策者认为法国的灭亡已经肯定了，所以他们才跟维希打交道。”

美国决策人的这种立场是抱有明显的帝国主义目的，他们想趁法兰西帝国之危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取而代之。到卡萨布兰卡会议开幕时，虽然法国本土和法属北非的政治形势已发生巨大的变化，而美国政府已决定同戴高乐打交道，并准备以军事援助作为手段来迫使戴高乐服从美国的意志。关于这一点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了有力的证明。

在罗斯福和丘吉尔到达卡萨布兰卡之后，美英两国在北非前线的主要指挥官都应召前去参加会议，艾森豪威尔也去参加了一天的会议。傍晚，罗斯福单独接见了这员大将，进行了亲密无间的私下交谈。这位将军回忆说：“虽然他（罗斯福——引者注）认识到盟国仍面临着严重的战争问题，但他所议论的许多事情，都是如何处理遥远的未来和战后的任务，包括处理殖民地和领土问题。他详细地推测了法国恢复它在欧洲昔日的威望和地位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他很悲观。因此，他就在这些问题上反复思量，仔细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控制他认为法兰西帝国也许再也不可能掌握的那些战略要地。”

这位将军还回忆说，虽然罗斯福总统曾亲自参与和研究过美英军队在非洲的政策是争取和利用一个同盟军，而决不是去统治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但他仍然是——也许是下意识地——从一个征服者的角度讨论当地的问题。……他还机智地指出，既然法国人想迫切地取得大量的军事装备，那我们就可以此为条件，采取要他们服从美国在欧洲方面的战略观点，使用他们的基地，并逐步撤换反对美国政府的法国官员，这是完全适当的。如果他们在这些重要问题上不全面地支持我们，那么武装他们显然是无用的。”

罗斯福到达卡萨布兰卡之后，和吉罗将军达成秘密协议。“根据罗斯福和吉罗在卡萨布兰卡达成的秘密协定（所谓安法协议，经过修改以后英国也同意了），美国当局支持吉罗将军为北非军政长官。美国当局断然拒绝和阻止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要控制地中海地区的法国武装力量和行政机构的一切努力，美国政府虽然供给曾在北非心脏作战过的自由法国战斗团体以武器，但顽固地反对它们升格为最高权力机关。戴高乐的抱负被认为是荒谬的，他对战争的贡献是很小的，而他的野心是危险的。”

但在美英军队于北非登陆之后，希特勒占领了整个法国，维希政府已不复存在，投靠盟军的达尔朗海军上将已被刺死，吉罗将军不懂政治，确无能

力管理北非事务，实现美国的意图。戴高乐“曾嘲笑吉罗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他说，‘有哪一个国家只进行战争而不追求政治目的呢？’”这时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已发展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迫于这种形势，罗斯福才和丘吉尔商定，请戴高乐来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使他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由他和吉罗来共同领导法属北非的事务。

关于戴高乐将军，丘吉尔写道：“在他身上，我却一直看到贯串在史册中的‘法兰西’一词常常表达出来的精神和信念。他那种傲慢不逊的态度虽然使我不快，但是这种态度却是我可以理解，并且感到钦佩的。他是一个逃亡者，一个在本国被判处死刑而亡命国外的人。他之所以有今日，完全仰仗着英国政府，现在还加上美国政府的好意。德国人征服了他的祖国。他实际上已是无处可以立足了。尽管如此，他却毫不在乎，做视一切。甚至在他表现得最为傲慢的时候，在他身上似乎也体现了法兰西——一个有着高度自豪感、权能和雄心壮志的伟大民族的性格。”

戴高乐这时住在伦敦，他事先曾建议同吉罗将军举行会谈，但不愿在外界压力下进行。经丘吉尔建议，罗斯福再三电请戴高乐赴会，但这位将军几次拒绝了美国总统的邀请。于是，丘吉尔就叫艾登对他施加最大的压力，甚至威胁说，如果他不赴卡萨布兰卡赴会，英国将极力主张“由别人来接替他那设在伦敦的法国解放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在1943年1月18日丘吉尔发给艾登转交戴高乐的电报中，他软硬兼施，迫使戴高乐非去不可。根据丘吉尔的意图，艾登多方说服，最后罗斯福又给艾登去电急催：“新郎已到，新娘何在？”

在这样三请四催之下，戴高乐才飞到卡萨布兰卡，住进吉罗别墅旁边的一座别墅里。戴高乐拒绝去拜访吉罗。丘吉尔等费尽了唇舌，最后他终于被迫去同吉罗会谈了两三个小时。当天下午，戴高乐会见了罗斯福。他们直接用法语交谈，气氛祥和。据丘吉尔说：“他们两人出乎意外地相处得很好。总统被他那‘聪慧明亮的眼神’吸引了，只是简直无法使这两人意见一致。”

经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幕后说服，戴高乐和吉罗这两位法军终于同意进行合作。1月24日，法国这两位将军同时出场亮相，在罗斯福面前作了“一次短短的、甚至是勉强的握手。”当丘吉尔进来时，戴高乐对丘吉尔说：“我们两人已经同意……我们将尽我们的力量来草拟一个圆满的计划，一起行动。”“吉罗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1943年1月26日，戴高乐将军和吉罗将军发表了联合公报，内容如下：

“我们会见了，我们交谈了。我们共同确定了所要达到的目标，我们一致认为，这个目标就是彻底打败敌人，以期获得法国的解放和全人类自由的胜利。如果在战争中能把全体与盟国并肩作战的法兰西人团结起来，我们相信，这个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丘吉尔写道：“在举行了这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告成功的强迫婚姻‘持枪逼婚’（美国人这么说）之后，总统便对记者发表了演说，我支持了他的意见。”

由于这次会议一直严守秘密，所以当记者们看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等人时，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无条件投降的公告。他说：

“……只有完全摧毁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威力，世界和平才能到来……摧毁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战争威力就是说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无条件投降。

那将意味着合理地保障未来的世界和平。这并不是说要消灭德国、意大利或日本的人民，而只是说要消灭这些国家的以征服和镇压他国人民为基础的哲学。”

在卡萨布兰卡的八天中，在罗斯福住的“达累斯沙达”别墅里，有好几家得到骨肉团聚的机会。除罗斯福的大儿子埃利奥特中校之外，还有小儿子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上尉，他在大西洋舰队一艘巡洋舰上服役；有英国特种勤务旅突击队的伦道夫·丘吉尔上尉，还有罗伯特·霍普金斯中士，他们是奉艾森豪威尔的命令从突尼斯前线特来会亲的。

我们可以从小罗斯福的回忆中再去重温一下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情况。

战事已经变更了这个城市的面貌。

在11月8日，星期日那天晚上我们所发动的对非进攻战中，卡萨布兰卡是我们预定攻击地点中的最南端的一个。我的战区是阿尔及尔，在非洲的西北角上；这算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看到我们派到卡萨布兰卡的弟兄们的攻击目标。

战事过去已经两个多月了，可是在下面的港口我们还可以看到那艘遍体鳞伤的法国战舰，杰恩·拔脱号躺在那儿。而这个城市的本身，从码头一直到山脚旁，都显示出战争的确在这儿发生过的痕迹。现在，已经是正月了，大路上挤满着美国的部队和美国的吉普车、卡车。往山头看去，非洲的早春已经为万物染上了动人的色彩，点缀着有钱的法国居民的邸宅与别墅，明朗、温暖而欢快。这和沃根基成了最强烈的对比，其间的差距，使人感觉到好像有一个时代那么久远。

我相信我们之选择卡萨布兰卡做我们的会址决不是为了卡萨布兰卡这个字在西班牙文中的意义是“白宫”。总之，它是那么凑巧地被选作这次重大会议的会址，而当我们的政府这样决定以后，他们立刻派了一队密探们在迈克·瑞莱的指挥之下来征选那些“最重要的人物们”生活、会面、谈话的恰当的场所。我到那儿的第一个下午就碰到了迈克。他带着抱怨的神情告诉我当他接到命令要把卡萨布兰卡保护得像白宫那么安全的时候所碰到的许多困难、与所必须解决的许多的复杂问题。

第一，在法属摩洛哥的全部区域之内，到处都是敌人的间谍与情报员。纳粹们被赶出这个领域还是最近的事。他们虽然走了，法国的法西斯分子还残留在那儿，荷包里满是德国人送给他们的钱，而我们的保安队还得时常设法去破获他们，把他们逮捕起来。同时，我们在卡萨布兰卡与西属摩洛哥相距并不甚远，而在1943年正月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佛朗哥和他的党徒们并不见得对我们怀有什么好意。

好像这许多麻烦还不够：仅仅三个星期以前，德国人还对卡萨布兰卡来了一次全面空袭。说不定那只是一次盲目的攻击，可是也说不定那是有目的地想炸毁巴顿将军巨大的汽油库；事实上，他们那次的炸弹全都掉在毫无军事价值的对象上，炸死了好多阿拉伯平民，引起了阿拉伯人对他们的仇恨。可是那次空袭却足够使迈克担心，他调来了大批高射炮部队，分布在卡萨布兰卡的周围和城内，因而使纳粹们在对北非短波广播中开始胡乱地猜测（在柏林，戈培尔的虾兵蟹将们有一次相当接近了事实的真相，他们报告说马歇尔将军准备不久去和英方的参谋长们举行军事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英美联合参谋总部的高级军官们以安福旅馆作为这次会议的本部。安福旅馆是一座十分愉快的、专门招待游客的旅社，虽不十分宏

伟，却非常现代化，小而安适。在旅馆的四周划出了一块禁地，重重的铁丝网架得密不通风；这一大块禁地他们称之为安福军营，里面除了那座安福旅馆外，还有预备给我父亲和丘吉尔住的几所别墅。在铁丝网的外面来回地巡逻着巴顿将军的部队，他们一方面向一切进出这块禁地的人要求查看通行证，而另一方面自己也弄不清这块禁地里究竟要干些什么。

在那块禁地内，当我父亲坐的那只巨大的飞机还在南大西洋的上空，在巴西与英属冈比亚之间飞行的时候，我二个人伸着鼻尖跑到厨房里去嗅探一番，想看一看他们给行将到来的大人物们预备的伙食。两个月的英国伙食和两个月的C种粮食配给已经减低了我的标准。因此，我感到那次管理厨房的军官们把伙食做得实在太好了。

星期二，快近黄昏的时候，我和迈克赶到梅特依纳机场去迎接父亲和他的随员们。他们预定在6点几分到达，我们所站的地方就在专门停泊我父亲飞机的空地旁边。

“喂！”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迈克喉咙里咕哝了一下，转过头来望着我。“这是我父亲从1932年的夏天飞到芝加哥去接受总统任命以来第一次坐飞机。”

“不仅是这个第一次，”迈克回答我，而他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他在想到这许多“第一次”所给与他的忧虑。“这是有史以来一个美国总统第一次坐飞机出国旅行。事实上，这是一个美国总统第一次坐飞机，不论是在国内或是国外，不论是公事或是私事旅行。”他颇有表情地望着我，用手在额上做着擦汗的姿势。

不久，按照规定的时刻，父亲坐的那架C—54式飞机从远远的地平线处飞进了眼帘，在机场绕了个圈子后，雄伟地停落在跑道上。我赶忙跑上去和父亲打招呼。父亲先下飞机，接着下来的是霍浦金斯、麦金泰海军上将、麦克利大尉、俾斯莱上校、以及其他十多个人。还有差不多一打的密探们，有一部分是跟第一批人员一起到的。

父亲的精神十分好，一点没有疲劳的样子。我们坐着一辆不知从什么地方征用来的巨大而旧式的法国篷车回到那座营地去，一路上他不断地谈说着这次飞行以及途中的所见所闻。

“当然罗，这并不是我的第一次飞行。1932年的6月……”

“爸，你在说些什么？那次飞行不是我也跟你在一起么？”

“喔，对了。可是当我在海军部的时候我也坐过好几次飞机呀，那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呢。那时我坐的是海军飞机，出去视察。那种飞行你是绝对不会晓得的。”

“多谢上帝！”

“可是这一次对我是很重要的，伊利奥。我觉得很高兴能够看到我们飞行员工作的情形，以及这许多年来航空事业的情况和飞行技术的进展。使我透视到将来的……”

他又谈到他那天的飞行。

“飞过达喀尔。我们这次飞的并不是平时的航线，你知道，平时他们是在陆地的上空直接飞过的……”

“我知道，爸。这条路线我飞过有三四次了。”

“一点也不错，一点也不错。我知道你是老资格。可是你也总得给我一个初次经历的人一个机会呀。”他皱了一下眉头，又很快地对我微笑了一下。

“从飞机中看到停泊在达喀尔港口的战船李乞留号。我几乎忘记告诉你英属冈比亚境内的情形。巴得斯特。你别说了：我知道你也到过那儿。可是我可以和你打赌，我在巴得斯特一个下午要比你在那儿住两个月所看到的東西还要多。”

事实上，的确如此。

一进那块禁地，我们的车子就一直开到我父亲住的那座别墅门口。那座别墅是值得描写一番的地方。里面的那间起居室足有二十八英尺高，从高大的法国式窗子中可以望到外边的一座美丽非凡的花园。大概是为了要保护这些窗子，这个别墅的主人在窗外装了钢质的帘子，拉下来可以把整个窗子掩遮起来。从迈克的观点看来，这可以说是再完善没有的装备了。外面有一个临时改装的防空壕，就建筑在花园邻近的游泳池里。

屋子里有三间卧室。两间在楼上，里面的一间分配给霍浦金斯住，另一间则是分配给我与小佛兰克林的（小佛兰克林大概在一两天之内就可以到达）。楼下的那间卧室则是给我父亲睡的，这间卧室有很多值得赞叹的地方，可是却绝对够不上“得体”这两个字。我父亲看了一眼之后，不由自主地吹了一声口哨。“现在我们什么都全了，只缺少这屋子的女主人。”他笑了一笑对我说。非常明显，这是一位十分女性化的法国妇人的卧室。屋子里到处是幕帷，到处是壁饰，一张床至少要有三码宽。而浴室中的那张浴盆是陷入地下的，砌着黑色的大理石。

离开我们住的地方不远的丘吉尔的别墅，霍浦金斯去请他到我们这儿来吃晚饭。那一天晚上，除了我父亲、丘吉尔和霍浦金斯之外，还有马歇尔将军、金氏海军上将、安诺德将军——美国的三个参谋长以及英方的陆军上将勃鲁克爵士、海军上将庞德爵士、和空军上将鲍德尔爵士三位参谋长。蒙巴顿将军和哈立曼那天晚上也在场。

那天晚上，大家都有点疲乏了，可是并没有妨碍他们享乐的兴趣。吃晚饭的时候，双方唯一的意见冲突是这次卡萨布兰卡会议的秘密性，或者说没有秘密性而起的。出席的军官们——尤其是英国方面的军官们，而丘吉尔则袒护他们，都担心纳粹们可能来一次偷袭，只要他们得到些风声，确定这儿有什么大事在进行中。英国方面主张大家应该搬到马拉喀什去。父亲则反对这一主张，并且明白他说了出来，他的坚定态度总算把他的反对派压了下去。不过麻烦的是不仅在那一天，在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他都得以同样坚决的态度来压他的对方。马拉喀什这个名字不断在谈话中被人提出，不论我们是在谈论着什么。

晚饭以后，父亲和丘吉尔并排坐在靠着那排大窗子的一张舒适的沙发上。钢帘已经拉了下来。其他的人们则把椅子拉近来，排成一个半圆形，围着他们坐。谈话的题目是政治。在晚饭后的这两三小时中，陆海军的将军们陆续告辞退出，到了近午夜的时刻，只剩下了父亲、丘吉尔、霍浦金斯、哈立曼和我。谈话的方式似乎有些迂回。主要是关联两件事：斯大林和那纠纷重重的法国政局（当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达尔朗已经入墓了快三个星期了）。这第一个问题是：斯大林会不会来？答复是：不会来。他已经拒绝参加这次会议，父亲告诉我们：一、他必须亲自指挥红军作战（那时候对于东战场频频传来的好消息我们都感到十分兴奋），二、我们知道，假如他真的来了，他一定会不断地提出西战场这个问题。

“不管怎么样，”丘吉尔说，“没有他我们也可以照常进行我们的会议。

我们可以和他保持经常的联络。任何计划都可以送到他那儿征求他的同意。我们有哈立曼在这儿。”

站在他的立场上，哈立曼（那时是我们的租借物资管理委员）报告说，除开对欧洲的一个全面攻击，苏联最需要的是必须按时交付租借物资。父亲对我们的生产计划担忧。我们的生产还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计划，因此这不仅影响了东战场，甚至还影响到我们对英国所应负的责任以及我们自己海陆军的迫切需要。

在那天晚上，似乎谁也不愿意马上谈到正经事。大家都想舒舒服服地靠着椅背，打个呵欠，伸个懒腰，喝杯酒，松弛一下。我父亲可以说是这几个月来第一次能够卸掉一会儿战争的重担，而其他的人也正和我父亲有同样的感觉。我忙着在跟他们斟酒。父亲和霍浦金斯开始问起丘吉尔关于戴高乐的事；谈话一下子就转变到第二个主要题目上来了。

“戴高乐呀！”丘吉尔叹了口气，动了动他那富有表情的眉毛。

“你非把你那问题中的孩子带到这儿来不可。”我父亲说。那是我们给戴高乐取的绰号。从那时候起，在整个会议中，戴高乐便被称为丘吉尔的“问题孩子”，而吉伦便变成了我父亲的“问题孩子”。

当时，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对我们进攻非洲而引起的政治纠纷感到乐观或是满意（这是最温和的形容词了）。在这儿重新申述当时的那种复杂错综的冒险，我必须附带阐明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当时的政治策略的运用曾经减少了好多美国人性命的牺牲，这无论从军事或是爱国的观点来看，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知道（那时候我父亲心中早就知道）当时有人却犯了很大的错误，而这个错误是相当严重的一个错误。

父亲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好像是被两个观念所支配的：第一，他急着要以最好而最快的方式来解决当时那显然已经混乱得太不像样的局面；第二，他发现他的国务院已经被拖进了一条无法回转的途径，而为了将来外交上的交涉和来往，他必须尽量保全国务院的面子。事情做错了，这当然是不好的；可是明明知道已经错了，还假装没错的样子一味干下去，这就更糟：这一条真理产生了我父亲的第一个观念。当你的僚属犯了一个错误（而这些僚属们在今后的年月中还必须每天和你的“名是盟国，实是竞争者”的友邦们从事微妙的交涉），这是不好的。但是你如果弃你的僚属于进退两难的地步而不顾，那么你等于间接帮助了你的竞争者：这一条真理产生了我父亲的第二个与第一个完全冲突的观念。

总之，在那第一天晚上我父亲显然是想听听丘吉尔对于这一个问题有什么话好说，想因此探明丘吉尔的打算。

“戴高乐现在架子端得十足，”丘吉尔说，“他拒绝跟我到这儿来。他非常干脆地拒绝了。”他对他自己的困难，好像不但不介意，而且还感到相当得意。“我没法子迫他离开伦敦到这儿来，”丘吉尔很快乐地说，“他对于盟军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尔取得统治权的那种方式十分不满，他简直在大发脾气。你知道，他有一种极端的爱国心理。并且，现在艾森豪威尔既然已经派吉伦在这儿主持大局……”他很忧愁地摇动着他的头。

最初，父亲采用温和的方式，可是后来他的态度逐渐转为坚决，终于坚持着非派人把戴高乐带来不可。他坚决地主张临时政府绝对不可以交给一个人来主持，不管是戴高乐也好，吉伦也好；而这两个法国领导者必须共同建立起一个机构，来统治法国，一直到法国真正地得到解放为止。

在那天晚上的谈话中，我得到一个印象，觉得丘吉尔和艾登一定在从前毫无办法的时候，曾经私下答允过戴高乐做复兴法国的唯一领导者。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中，丘吉尔那晚所采取的步骤是十分小心翼翼的。

“我的问题孩子，”他说，“认为吉伦在这儿的正式的地位是对自由法国的一种非友谊的行为。”他的声音十分庄重。我又重新感觉到他对于他的“问题孩子”的这种作风似乎并不真正的关心。“他希望，”丘吉尔又接下去说，“能够有单独的权利来判断，并且决定参加任何临时政府的人物。这我知道当然是办不到的。”

我父亲提议英美两国应该赶快给戴高乐一道强硬的通知，向他明白他说明，假如他不马上停止他的叫喊而立刻飞来参加会议的话，那么英美将即刻停止对他的一切支援。丘吉尔点了点头。“我想这大概是最好的办法了，”他说。“不过目前我是无法保证他的行动的。”

过了午夜很久，丘吉尔才离开我们。父亲已经相当疲倦了，可是他谈话的兴致还很好。一方面是由于旅行以后的兴奋，另一方面则因为又能看到我，他觉得很高兴。我坐在一旁，看他宽衣上床。

“是我在胡思乱想呢，”我说，“还是丘吉尔为了戴高乐的捣乱不听话而感到苦恼呢？”

父亲笑了：“我不知道。我希望能在一两天内把事情弄明白。不过我有一点很有力的怀疑，”他说的时候，特别着重“怀疑”这两个字，“我觉得我们的朋友戴高乐没有到非洲来是因为我们的朋友丘吉尔根本就没有请他来。我有相当充分的理由相信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只要丘吉尔和他的外交部有要求，戴高乐是什么事都愿做的。”

“为什么呢？”

“利害相同，英国人准备保持他们在殖民地中的地位与势力，他们也准备帮助法国人保持他们在殖民地中的地位与势力。丘吉尔是一个维持现状的伟大人物，他的脸就活像是永远维持原状，是不是？”

这使我想起了那次在沃根基的争端。父亲沉默了一下子，突然微笑了，好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思想似的。

“你笑什么，爸？”

“我在想蒙巴顿，”他回答，“你知道为什么丘老这次把蒙巴顿也带来了？他来的目的就是想说服我，想告诉我派登陆艇到西南亚去是多么重要的事。”

父亲看出了我眼光中惊讶的神情，于是他继续说下去：

“当然是担心缅甸！英国人想要克服缅甸。这是他们第一次对太平洋战争表示真正的关心，为什么呢？为了他们的殖民地帝国！那都是英国殖民地问题的一部分。缅甸影响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它们都是互相关联的。要是里面的一个获得了自由，其他的便会跟着要求学样子。这就是为什么丘吉尔要那么关切地把戴高乐藏在他的角落里。戴高乐和丘吉尔的思想完全相同，他也绝对不愿意看到一个殖民地帝国在这次战争中消失。”

“这和蒙巴顿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预备选他来做一个新的战场的最高总司令——西南亚战区，可是你用不着担忧。我怀疑他们是否有能力说服金氏。要想从他那儿拿走我们一部分太平洋登陆艇！还是想从这个战区拿走我们一部分大西洋登陆艇！”

我问父亲关于吉伦的情况。

“吉伦？我从国务院时常听到关于他很好的报告，在我们攻入非洲以前，墨非就一向负责处理我们和法国的事务，他在屡次报告中都说吉伦是可以用来平衡戴高乐势力的唯一的人物。”

“伊利奥，”他接下去说，“戴高乐预备在法国组织一个一人政府。我简直想不出另外一个人比他更靠不住的了。他的整个自由法国的组织里充满了警察间谍，他用密探来侦察他的人民。在他，所谓言论自由就是剥夺人民批评他的自由。在这种情形之下，谁又能完全信任在戴高乐背后支持他的那个力量呢？”

这使我想起了方才父亲所说的关于缅甸的那些话。当然，从丘吉尔的立场看来，这一个冒险是合乎逻辑的，收复新加坡，一个最好没有的、戏剧性的突击；这可以使英国的声望在亚洲与近东的殖民地民众之前大大提高。可是这一个战事所需要的军队、给养与登陆艇在哪儿呢？给养路线之延长也是个大问题。再说另一方面，我们正迫切地需要这许多东西来打击希特勒。

父亲打了个呵欠，我站起身预备走了，可是他摇了摇手，叫我再坐下。

“别走，”他说，“还早着呢。再说，我还有很多话要谈。”

他又谈到了戴高乐，说他的身体、他的灵魂、他的一切都是英国人的，说英国给他金钱、物资、以及精神上的援助使他能建立起在伦敦的自由法国政府并且开展在法国的地下活动。他好像又在大声地说出他的思想，他在排练，组织起他的思想，预备在第二天以及今后延续十天的会议中运用。

他的思想又回转到殖民地以及殖民地市场的问题，这个问题他认为是将来一切和平机会的核心。他在他的烟嘴中换上了一支香烟，带着思索的神情说：“殖民地制度就等于战争。从印度、缅甸、爪哇榨取一切资源。从这些国家中搬走一切财富，可是却从来不回报他们什么，诸如教育、好一点的生活标准、最低的卫生设备等等，这种行为就等于是埋伏下战争的导火线。也就是说在和平的机构尚未开始以前，你已经在否定和平机构的价值。

“当我们一提到印度这两个字，你留心注意一下丘吉尔的表情！”

“印度应该立刻采取共和政治，在某些年以后——5年或是10年，它应该有权力来决定它自己的地位，依然留在帝国范围之内还是获取完全的独立。

“作为一个共和政治的国家，印度应该有资格来享有一个近代形式的政府，适度的卫生与教育的标准。可是当英国不断地从印度搬走它的财富，印度又怎么能得到这一切呢？每年，印度的人民都在等待着两件大事——死亡与纳税。比什么都要准确，他们年年都有灾荒。他们称呼这个时期为灾荒季节。”

他停住了，想了一下。

“我必须告诉丘吉尔，我今天在英属冈比亚所看到的一切。”他说，声音中带着坚定的调子。

“你是说在巴得斯特所见到的？”我提醒他。

“今天早晨，”他说。现在他的语音中含着极为真挚的感情，“在八点半的时候，我们坐着汽车通过巴得斯特到飞机场去。土人们刚开始工作。穿得褴褛不堪……面色阴沉……他们告诉我说这些土人们要到快中午的时刻才变得比较活泼一点，高兴一点，因为那时候太阳已经晒干了地面上的露水，驱逐了早晨的寒冷。他们说这些土人的一般工钱只有一先令九便士。一先令九便士！连五角钱都不到！”

“一个点钟吗？”我带着些傻气地问。

“一天！五角钱一天！此外，他们还可以得到半杯米。”他不安地在他的大床上移动着。“污秽、疾病、死亡率高得可怕。我问了一下他们的一般生命年龄，你永远猜不到的。只有二十六岁！这些人过的生活连牛羊都不如。他们的牛羊还可以比他们活得久一点！”

他半天没说话。

“丘吉尔或许以为我上次没当真。这一次他该明白我不是在说着玩的。”他带着思虑的神情对我看了半天。“你那个地方的情形怎么样？阿尔及尔情况怎样？”他问我。

我告诉他那儿的情形也完全相同。土地富饶，资源很多，土人们穷得不堪设想，只有少数白种居民生活过得非常好，还有少数的土王子过着十分优裕的日子，此外则是贫穷、疾病与无知。他点了点头。

接着他就对我谈起今后我们所该采取的方针：我们应该帮助法国恢复它世界强国的地位，然后委托它管理它战前的殖民地，作为一个委任统治者，它必须每年报告它代理统治的情况，诸如文盲扫灭的程度，平民疾病之治疗与根除等等……

“等一等”我插嘴了，“它向谁报告呢？”

“在联合国的组织成立以后，它该向联合国理事会报告。”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谈到这个计划。

“没有旁的，”他回答，“世界四大强国——美国、英国、中国和苏联，在打完这次胜仗以后，应该负责建立世界的和平。这四大强国应该担负起重大的责任，帮助全世界一切落后、不景气的殖民地区域推广教育，提高生活水准，改善人民健康。而当有一天这些殖民地区域能够到达成熟的阶段，它们应该有享受独立的机会——只要全体联合国公认它们已经有了足够独立的资格。“假如我们连这一点都办不到，那么我们不如干脆承认我们是无法避免再一次的战争了。”

这想法未免有些太沮丧了，夜已经很深了，我想。

“两点半了，爸！”

“是的，我现在也觉得相当疲倦了。你自己也该好好地休息一下，伊利奥。”

1月15日，星期五。

吃早饭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迟了。还只有十点钟，可是已经有五六个人在我父亲的卧室中陪着他很勤勉地开始工作；这些人照理是应该由我来接待、通报，然后引到父亲跟前去的。赶忙呷下了我的咖啡，我走进去看了他们一下：他们是马歇尔、金氏、安诺德、霍浦金斯和哈立曼；不久，提恩将军——美国联合参谋总部的秘书长也加入了。我在旁边听了一会，知道他们是在讨论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议事程序。这议事程序中一定有些颇费周折的地方；我时常奇怪为什么人们老是化好几个钟头来算计他们还要化好几个钟头来讨论的事情。这一次，他们足足谈到中午才停止。

天气十分晴朗而美丽。只要往外边的花园中看一下那些鲜艳的花丛，你就可以马上感觉到午饭是应该在外边露天吃的。我们一共六个人：霍浦金斯和哈立曼；丘吉尔和他的贴身侍从汤姆生海军中校；父亲和我。吃饭时谈话的中心是当天下午的工作计划以及还应该召见的人物：诸如艾森豪威尔、墨非等等。丘吉尔同时要求允许他介绍英军中东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给大家会

面一下，假如亚历山大来的话。我们很快乐地吃着，谈着；许多问题只不过是偶尔谈到而已，谁也没有对它加以漫长的讨论。

在这个时候，我们攻入北非的战事进行得还算顺利，不过却也没有什么惊人的收获。我们准备把隆美尔的部队包围到海边，一网打尽，可是这一个战役的军事结局还依然是一个大问号。那天下午，我们同意双方详尽地报告并且讨论今后的军事作战计划，以便决定我们第二个攻击目标。渡过英法海峡，攻入大陆的作战始终是双方公开的争论点，这个作战计划当时的暗号叫“围歼”，就是1943年的第二战场。跟往常一样，在我们的屡次谈话中，美国方面永远推动提出这个问题，而英国方面则始终回避。

午饭以后，丘吉尔和他的侍从走了，哈立曼也跟着辞出，他们走了不久，艾森豪威尔就到了。我知道他曾经害过病，因为不久以前我曾经见过他一两次，可是那天下午他的病似乎已经好多了。他是陪马歇尔和金氏一块儿吃午饭的，他一见我父亲，马上就对非洲的战事作了一个详尽的报告。他叙述给养的困难，因为北非海岸的铁路是单轨的，而且已经十分陈旧了，父亲很有兴趣地听着，艾森豪威尔又说那儿的公路对于给养的输送也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纳粹的间谍是否捣乱得很凶？西属摩洛哥对我们有什么威胁？”父亲问。

“我们很密切地在监视着他们，总统先生。一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做过任何活动，而我相信他们在将来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的。”

“在目前的情形下，我看你所碰到的政治问题也够多的了。”父亲笑着说。艾森豪威尔微笑了一下，表示回答。他没说话，假如他说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说：“喔，这些问题压得我背都痛了！”他又继续叙述我们的部队在卡夫萨与推贝萨区域内所遭遇到的抵抗，在那些日子，我们还不过是开始懂得战争的时候，敌人的抵抗是相当坚强而顽固的。

“这不能算是一种推托吧，我相信。”父亲最后说话了。

“不，总统先生，这不过是说工作是相当艰难的罢了。”

“那么，究竟怎么样？你的估计如何？”

“我不懂你的意思，总统先生。”

“完成这一件任务要多少时间？”

“我可不可以‘假定’一下，总统先生。”

父亲微笑了一下。

“只要气候有一个转变，总统先生，我们可以在暮春的时候把他们整个儿地包住，或是赶下海去。”

“所谓暮春究竟是什么时候？6月？”

“说不定能够在5月的中旬，至迟是6月。”

这使我高兴极了，父亲也表示满意。

墨非在五点钟左右的时候进来和父亲谈了几分钟。他和艾森豪威尔和我父亲只讨论一个问题——法国政治。墨非十分迫切地想引起我父亲对吉伦的好感，他说吉伦是一个有才干、有能力的人物，说他实在是美国所应该选择的理想的对象。我在旁边听了一会几，就悄悄地溜到外边来了。按照规定的计划，联合参谋总部要在傍晚的时候交给丘吉尔和我父亲一详细的报告，叙述他们当天午饭后会议中的经过与成就，因此我跑到大门外去等他们来。丘吉尔比预定的时刻早到了几分钟，在他的后面跟了三个人；他要我父亲在五

点半的会议开始之前见一见他们。我和丘吉尔把他们带进了父亲的屋子里。他们是陆军上将亚历山大、空军上将泰德爵士和国防部的陆军上将依斯梅。正像上次在沃根基一样，英国方面出席会议的顾问们又在数量上占了优势，和我们的人数相比几乎是二对一。

亚历山大将军那时正在西部沙漠指挥着英军追击隆美尔的非洲兵团，这次他就是从那儿的司令部直接飞来的。他恐怕可以算是英国最能干的野战将领了，而那一天下午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严峻的、疲乏了的、单纯的军人。他胡子也没有刮，身上穿着战斗服，皮肤被日光晒得黑黑的，样子似乎有些疲惫，他简短地可是却非常生动地叙述英军的攻击情形，怎样地把纳粹的军队迫向美军在北非中部所形成的铁壁。

在谈到某一点的时候，父亲的注意力忽然有些涣散，我凑过身子去轻轻地在他耳朵边提醒他：

“爸，你的意思是不是要使出席这次会议的每一个英国将领都有一个相对的美国将领来平衡势力？”

“对了。”

“那么他们既然找了泰德来，我们为什么不找史巴兹呢？”

“真的，我几乎忘了。赶快去找安诺德。叫他立刻设法把史巴兹找了来，愈快愈好，假如不妨碍那儿的战事。”

史巴兹将军是我的顶头上司，在一两天以后他坐着飞机赶了来，出席以后的参谋长会议。为了要使读者明白当时的实际情形起见，我得顺便提一提那天下午来向丘吉尔和我父亲报告的出席联合参谋长会议的人员中，英国军官占了九位而美国军官只有五位。说不定我们的参谋长们一个人要说两个人的话。因为那次会议我并没有参加。

和双方的参谋长们谈了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父亲还有半小时的工作要做，因为哈立曼带着英国的运输大臣蓝得士爵士来看他。这又是一次预定只有五分钟，而结果延长到三十五分钟的谈话。

最后，父亲总算有了个机会休息一下，喝一杯我为他调制的他所爱喝的酒。

“这样还可以。”他喃喃他说，在沙发上很舒服地移动了一下他的身子。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吧？”

“我想是如此。”他微笑着，带着回忆的神情。

“怎么啦？”

“今天下午英国方面提到了缅甸。”他很满足地呷了口酒。“你知道，伊利奥，我们不知花了多少精力和时间才劝服金氏把所有的船舶和登陆艇调到大西洋战区中，这战区还只不过是我們主要战争的背景而已。你能猜到当英国方面提到缅甸的时候他的反应吗？他真是一个伟大的海军将领。他说：‘在一切的战争中，胜利是由海上的力量决定的；因此，海军所决定的计划当是最好的计划；目前，只有太平洋战区才是一个海战的区域；因此，太平洋战区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战区。’”父亲大声地笑了起来。“这并不能算是他的推理，不过也差不多了，这理由已经足够了。”

“爸。”我打断了他的话头。

“怎么？”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是今天下午来的。”

小佛兰克林从门外走了进来。我们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大家都兴高彩

烈。小佛兰克林是驱逐舰梅朗号上的执行官，他曾经参加卡萨布兰卡的攻击，他很迫切地想告诉我们那次攻击的经过情形，而我们也同样迫切地想听他叙述。几分钟后，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的马歇尔将军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参加到我们一伙，很热心地听着。他谈到战争，他目睹的战场，怎么样参加那次进攻战和其后的战斗，关于后者我也插了几句嘴，说了一些我自己的经验。这次谈话使我父亲听得又羡慕又妒嫉，使他回忆起他在上次大战中也曾作为海军次长参加过战争，到过前线。

“这一次我也要到前方去一下。”

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对看了一下，继续吃他们的晚饭。“怎么啦？”父亲追问。“为什么都不作声？”

“沉默或许就是表示同意，爸。”我的弟弟回答。

马歇尔睁大眼睛对他瞪了一眼，他赶忙把嘴闭上。

“这绝对不可能，总统先生。”艾森豪威尔将军说。

“这根本办不到。”马歇尔将军表示同意。

“为什么呢？不见得有多大危险吧。你们两个来的时候，路上碰到什么困难没有？怎么样，文森豪威尔？从阿尔及尔到卡萨布兰卡一路上遭遇到什么攻击没有？”

“最后的两百英里中我们大伙儿都套着降落伞预备随时跳下的，总统先生，飞机上的一只引擎坏了，而还有一只也差不多了。坐在飞机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觉得心慌的。”

“可是这种危险是机械上的。你们不让我到前方去应该根据军事上的理由。究竟是否有什么军事上的危险呢？恐怕没有吧，是不是，伊利奥？”

这一下把我问得有些狼狈了。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都睁大眼睛望着我。我做了个手势，指指我塞满着食物的嘴，“没办法说话。”我含糊地说。

“胆小鬼，”我父亲说。可是他很耐心地等着，我只好假装着把嘴里的东西吞下去。“你说吧。”他催我。

“从阿兰和阿尔及尔到突尼斯，爸，运输机在路上是很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的，这决不是开玩笑的事。”

“我们可以派一队战斗机护送呀。”

“总统先生，”艾森豪威尔说，“大批的战斗机护送一架C—54的大飞机，尤其是在纳粹的无线电广播对这次会议有种种猜疑之后……这只会招引敌人的攻击，像蜜糖招引苍蝇一样。”

“命令归命令，总统先生。”马歇尔说。“可是假如你一定要命令我们这样做，那么美国陆军中自我们而下，没有一个人会愿意负这个责任的。”他说话的神气非常认真，使我父亲感到很失望，可是他不得不表示同意。最后，他们终于采取了一个妥协的方式，请我父亲到拉巴特的北部去检阅巴顿将军的三个师团。

吃过晚饭以后，并没有什么规定的工作。两位将军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只剩下我和小佛兰克林陪父亲闲谈……我们谈到我们的家，我们的母亲及其他家属……都是些儿子与父亲别后重逢时一般所谈的话。父亲身边带了些纽约和华盛顿的报纸，我们赶忙围上去热心地翻阅一阵，谈论着报上所载的事情，里面有一段记载，叙述一个叫做拉姆伯脱生的议员在下议院中指责罗斯福的儿子们，说“他们沉湎在纽约的夜总会中，乐而忘返，而美国的一般青年们则都远离家乡，在国家而战斗，而死亡。”事实上，在那个时候，

我的大哥詹姆斯正跟着卡尔逊的突击部队在太平洋中作战，约翰在受训，不久即将派到海上做一个军需官。这些报纸上总是有些荒谬得使人发笑的片段新闻的。

父亲那天晚上睡得相当早，还没到十二点钟他就上床了。他实在需要一晚好好的睡眠。

1月16日，星期六。

早晨，一向来得很晚的丘吉示居然很早就到了。他到的时间还没到十点钟，他和父亲整个一上午都和艾森豪威尔、墨非、和英国的驻盟军总司令部专员麦克美伦爵士在一起。他们讨论的题目又是法国政治，小佛兰克林和我自从1941年8月在沃根基金会以后就不曾再碰到过，事实上，他是沃根基金会以后我所见到的第一个兄弟，我和他在屋里耽搁了没多久就出来了，只听到他们谈话的中心又是戴高乐和吉伦。到那个时候，丘吉尔和我父亲又给戴高乐和吉伦找到了新的名字来代替“你的问题孩子”与“我的问题孩子”的称呼。他们现在干脆简短地叫他们“D”和“G”。D在什么地方呀？为什么他还没准备来呀？他们就那么简短地问。那天主要的政治论点还是怎么样为法国的政治纠纷找出一条比较圆满的出路。前一天晚上，我已经读了相当多的国内报纸上的记载，使我明白这是怎么样一个重要的外交问题。那天我第一次觉察到墨非是怎样地受到各方的煎熬与责难。从我们所听到的谈话中，至少有一部分批判是相当正确的，他主要关心的事情似乎是使未来法国政府能够包罗曾经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中被视为“绥靖主义者”的人物。

午饭又是在花园里吃的：一共是五个人，父亲、霍浦金斯、佛兰克林、我和新来的乔治·杜尔诺。乔治那时是航空运输部的上尉，他战前在白宫中干过多年INS的工作，是我父亲的老朋友。这又是一个父亲能够随便休息的场合。到卡萨布兰卡以后，虽然工作十分繁重，但是这一种生活的转换却对他颇有裨益，他精神十分好，疲劳的灰暗的阴影已经从脸颊上消失。

喝咖啡的时候，他又谈起开发殖民地区域的计划，这似乎已经成为他所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对于一个以往从不曾到过非洲的人，他这次所收集到的情报，无论是地理上的、地质学上的、或是农业上的都可以说是太丰富了。当然，我以为我对非洲是相当熟悉的：好几个月前，我曾经架着飞机飞过大部分非洲，从空中摄取相片。可是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有机会得到比我所知道得更多的东西。我们讨论到南突尼斯的广大盐泽，这盐泽在很古的时代一定是个很大的内海。父亲又提到起源于亚特拉斯山麓的河流，这些河流向南方流去，消失在撒哈拉大沙漠之下，变成了地下的河流。父亲说：“引导这些河流作灌溉的用途，将使我们加利福尼亚的帝国山谷显得像一小块白菜园那么大！”他又说到那块盐泽。那里的地要比地中海的水平线低得多，假如我们能挖掘一条运河来使这盐泽重新变成活湖——一百五十英里长，六十英里宽，那么，“撒哈拉几百英里的沙漠可以变为肥沃的土壤。”父亲这话说得一点也不错。撒哈拉并不只是一堆黄沙，它事实上有使人惊讶的丰盛的活力。每一次雨后，总可以看到处处开放出各色各样的鲜花，过了几天之后，这些花又在强烈的阳光与过度的干燥中枯死。小佛兰克林和我对闪了一下眼睛：父亲难得有这样的高兴，他的活跃的心灵与敏捷的想像配合在一起，活泼地工作着，而我们的脑中都在想，聪明而健全的计划将使这块土地有不知多大的改善与发展。

“财富！”他叫道。“帝国主义者始终就没有觉悟到他们究竟能做些

什么，能创造些什么！他们从这块大陆上抢走了不知多少万万元的财富，而这是因为他们实在太近视了，始终没有想到，与这块土地的发展可能性相比，他们的几万万元实在只不过是几个铜板而已。要发展这块土地，必须使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能够享受一个更好的生活……”

那天下午，美国的各部参谋长们回到我父亲那儿，报告当天与英国方面讨论到的各项计划。从这个报告中，我们知道英美双方在很多地方都抱着相对的意见，而丘吉尔与他的参谋长们所拟定的议事日程与两天前我父亲和霍浦金斯所批阅的美国方面的议事日程竟完全不同。英国方面只想在地中海发动小规模战斗，而置攻打欧洲侧面的大规模作战计划于不顾。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谈起西西里，以及其他几个把我带到胜利之路的中间地点：诸如多得喀尼斯群岛，从那儿使我们进入希腊，而终于攻入山岭连绵的巴尔干半岛。

1月27日，星期日。

中午的时候，第一批客人到了。他们是诺戈斯将军，法军驻拉巴特的司令官；巴顿将军和威尔伯将军。威尔伯将军是巴顿的部下；他来的目的是想做我父亲的翻译，可是我们并不需要他，因为我父亲的法文说得十分流利，而他可以毋须旁人的帮助，和诺戈斯直接交谈。

诺戈斯和巴顿这两位将军相处之融洽是值得惊诧的，他们在几个星期前还在法属摩洛哥的海岸上很炽烈地交战。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们两个都是职业军人，他们在战场上的对抗是决不会扩展到战场之外的，此外，他们二人都没有强烈的政治观念与见解。他们都是按照命令而行动。而幸运地，巴顿是比诺戈斯有更高的工作效率与才能的。诺戈斯接到命令要他抵抗，于是他就抵抗；后来，他又得到命令，要他停止抵抗，于是他就停止。现在，他有了新上司。

在我父亲看来，这不过是一次礼貌上的拜访而已。可是，这次拜访却有它另一方面的意义；这位诺戈斯时常被丘吉尔提到，说他是使他没有办法带戴高乐到卡萨布兰卡来的一大阻碍。当时，诺戈斯——法国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职业军人与殖民地管理者；对于一切事务的处理，他希望上峰能给他一道明晰而毫不含糊的命令，然后他愿意不受干涉地单独去执行——是一场热烈的争辩的中心。据丘吉尔告诉我们，戴高乐在伦敦坚决主张他的同胞、他的同僚诺戈斯应该作为一个附敌的军人而关在牢中，他应该先被监禁起来，然后受公审。可是这儿在法属摩洛哥，我们都知道巴顿将军（不久之前还是他的敌人与猛烈的交战者）却坚决主张诺戈斯应该保留他现有的地位。后来，巴顿曾经为诺戈斯提出一份非常公正而强硬的报告，他认为诺戈斯在摩洛哥的苏丹与当地土人间的声望与势力，在我们利用该地为我们的基地的时期中，对我们有莫大的军事上的帮助。

在那一个温暖的星期日的下午，父亲向那个法国人问起关于摩洛哥人民的情形以及怎么样改良他们的生活，对于这些问题，那个法国人瞠目不知何对。他从来就不曾动一动脑筋来探索一下这些问题的答复，也从不曾有什么人向他问起这些问题。可是他知道得很详细究竟有多少财富可以从这国家搬走，而他亦知道得同样详细这些摩洛哥的土人们可以被榨取到什么程度。这儿的苏丹，巴顿告诉我们，多少年来始终是在诺戈斯的掌握之下，诺戈斯只想维持这一现状，此外，他似乎并无其他企图，这位戴高乐的死对头和父亲谈了一会就跟着其他两位将军起身告辞。

他们走了以后，父亲说：“伊利奥，你替我记下来，我预备请那位苏丹吃一次晚饭。问一问墨非或是随便什么人关于请他吃饭的条丈与形式。这个诺戈斯……我们可以不必去理他。”

诺戈斯、巴顿和威尔伯离开我们后就去看丘吉尔。丘吉尔陪他们坐了一会儿就步行到我们的别墅来，和我们一起吃午饭。他告诉我们那天早晨他到码头去看了一下那条法国战舰杰恩·拔脱号的躯壳。

“什么，你去看那条法国战舰？”父亲很激动地叫道：“天呀，假如你能去看，我也能去。”

我们忍不住都大声地笑了起来。他一下子变得像个六岁的孩子一样：你有冰淇淋吃，我也要一点。

那天下午，马克·克拉克将军来看我父亲。丘吉尔已经走了，走的时候他耳朵里塞满了我父亲他在对戴高乐问题上的责难。父亲始终认为丘吉尔是故意不让戴高乐来，而只要他愿意，他可以随时把他的“问题孩子”叫了来，父亲的这一个信念一天天加强起来。现在，马克·克拉克将军已经来了，他有很重要的消息要报告。因为他亲自把美国的“问题孩子”吉伦带到卡萨布兰卡来了。现在我父亲有一个机会可以亲自见一下这位被墨非和我们国务院所极力推荐、认为是美国所应该支持的、用来平衡被英国所捧出来的独裁的戴高乐势力的唯一恰当的人物。父亲感觉到相当小心却颇有兴趣，最后终于很迫切地想见一见这位被任命指挥北非法军的吉伦将军。

克拉克耽搁了没多久，看见父亲已经准备接见吉伦，他就走了，预备去把吉伦带来。我想当时整个别墅的人都感到十分兴奋：这几天来占住我父亲整个心灵的对丘吉尔的外交战似乎可以自己解决了，我们都这样希望着：这将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棋局中的十分重要的一步。当克拉克带了吉伦回来的时候，墨非和麦克利大尉也来了，大家都坐下来预备作一次决定性的谈话。

然而这次会面对我父亲真是一个绝大的失望。

在吉伦的眼中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存在过。他认为目前只有战争中的军事问题。他笔直地坐在他的椅子上，从不松弛一下。只有他的年龄使他稍为软化一点，连他的牢狱生活都不曾在身上留下任何显著的痕迹。当他最初的那种不安与疑惧的心情消失的时候，他的语气中开始有了坚决的声调。

“只要给我们武器，”他大声地叫道。“给我们大炮、坦克和飞机。这是我们全部的需要。”

父亲对他相当客气，可是他的问话却非常坚决。他的军队究竟从什么地方来？

“我们可以征募殖民地的部队，几万人都不成问题！”

那么谁来训练他们呢？

“我有很多军官。这决不成问题。只要给我们武器就行。至于其他……”

可是他所谓的“其他”却包含着许多他永远无法洞察的严重的问题。丘吉尔早就指明他之迟迟不废止原先在维希政权下颁布的反犹太法律是戴高乐不满的最大原因之一，或者至少是他所声明的原因之一。吉伦把这些问话放在一旁，不加答复。他只是一心一意地重复他自己的见解。

“我们唯一的需要是装备。几星期的训练，我们马上就可以有广大的有力的军队。”

父亲用他的问话来暗示吉伦，说他未免把他的工作看得太容易了。可是

那位法国将军却如此专心地陈述他自己的计划，以致我怀疑他是否觉察我父亲的否定的反应。吉伦的信念是非常坚强而没有边际的。可是父亲却始终没有答允他什么。

吉伦和其他的人们一离开他的房间，父亲就用表情和手势表示出他对吉伦的印象。

“我怕我们现在是依靠在一根非常脆弱的芦苇上，”他说。他举起他的双手，短短地笑了一声。“这就是墨非说的可以号召起法国人民的人！他是个毫不中用的行政官员，也将是一个毫不中用的领导者！”

那天晚上的晚餐席上有丘吉尔、蓝得士爵士、海军上将柯银汉、海军上将金氏、陆军上将苏未维尔和哈利曼，召请这些人的目的是想使大家可以利用晚餐的时间来讨论那重要的船舶优先问题，并且找出一个双方同意的答案。在那个时候，各部参谋长们已经联合起来把那个缅甸作战的题目推开窗外；大家已经开始具体地讨论盟军下次攻击的目标应该是西西里，目的是想保障通过地中海到达波斯湾而转入苏联的交通线。可是那时船舶还是异常缺乏，而需要又是那么迫切。大西洋之战，在 1942—43 年的冬天，离开胜利还远得很。为了要在英国屯积起必需的物资，究竟需要保留多少吨船舶？我们应该留出百分之多少的船位来把我们的部队与给养从地中海撤回到英国去？我们是不是可以确定非洲的战事能在 5、6 月间结束？我们应该为西西里留出多少船舶来？在英国人的心目中，保留给摩尔曼斯克和波斯湾之役的船舶吨位可以减少；而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则认为我们应该尽量留出多数的船舶来完成这一方面重大的工作。

这个关于船舶问题的会议一直延续到夜深一时，而我在他们谈论中途就先退出了。那天夜晚，我和小佛兰克林离开了安福营地，到几位年青军官们的宿舍中去玩了一晚。

1 月 18 日，星期一。

马克·克拉克和墨非在早晨又来看父亲，重新和父亲讨论法国的政治情形：他们在一起谈了有两小时之久，小心地计划在法国获得真正解放以前，美国对组织临时法国政府所抱的政策。在我父亲的目光中，我们的困难是相当明确的：我们对吉伦作为领导者的资格犯了评价过高的错误，我们采取了与维希系统的法国殖民地人士合作的暧昧政策，这两点使美国很难能够反对英国所支持的戴高乐的一人政府。墨非和克拉克走了不多久，丘吉尔来吃午饭；午饭时的谈话很散漫，关于戴高乐之始终不在卡萨布兰卡露面，父亲和霍浦金斯继续很温和，却很明确地与丘吉尔争论了一番。

那天下午，父亲第一次得到了一个离开他住的那所别墅的机会。他由巴顿将军和巴顿的第一装甲兵团的祥生中校陪着，爬上了一辆吉普车，出发去检阅一队派来安福营地的步兵队。我在门口迎接他的归来。

“你应该去看一下那班军乐队的，”他说。“里面有一个胖家伙差不多有三百磅重，他吹的一支笛却最多不过只有四两。”

各部参谋长们按照预定时间在五点钟来看我父亲，他们坐了一个半小时才走。七位英国方面的军事代表和四位美方军事代表已经决定了攻入西西里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的暗号叫 HUSKY。在某一点上看来，我们可以说一方面刚决定退出北非，另一方面却马上从事于西西里的作战。这一次，美国方面的主张在 1943 年春天横渡英法海峡的作战；与英国方面的主张先夺得西西里与多得喀尼斯群岛，然后通过希腊或巴尔干进攻欧洲；由 HUSKY 这个新作

战计划的决定而得到了妥协。显然，丘吉尔曾经提议放过意大利而攻击他所谓的“欧洲柔软的下腹部”。他始终认为我们攻入欧洲应该择取一条适当的路线，使我们与红军会师将在中欧一带，这样，英国的势力范围可以尽量地扩展到东欧来。当时英美两方面都认为 HUSKY 是这次战争中向前的重要一步。为了把盟国的大军调到西西里方面来作战，并且把意大利从战争中消灭掉，我们变为横断英法海峡的作战只有延迟到 1944 年的春天才能进行。

那天下午，父亲和丘吉尔都同意通知斯大林英美双方的新战略。在同一天的下午，这两位政治家又想到要对轴心国发布一个关于战争的共同声明。

吃完晚餐以后，我和小佛兰克林就到大街上去逛。我以为父亲一定已经上床而很早睡了。可是当我们在夜深二时回到别墅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确已经上床，可却并没有睡着。他在看一本卡夫曼——哈脱戏剧的二毛五分钱的再版书，“来吃晚饭的客人”，他一面看，一面不断地发笑；在他的床边是一本他刚看完的“纽约人”。他还没有睡是因为想等我们回来，听我们谈谈晚上的经历：和每次一样，他总是羡慕我们所享受的比较自由的生活与行动，非常有趣地听我谈说我们一路上的故事。说老实话，我们那晚出去并不好玩，相当乏味；我们找了两个海岸巡逻队员做我们的向导，在本地的市街上兜了一个圈子；可是我尽量利用我的想像把细小的事物描述得十分生动。

1 月 19 日，星期二。

一早，我用力摇醒了我的睡眠朦胧的弟弟。小佛兰克林在那天清早要回到他的驱逐舰上去，而他几乎误了时间。哈利曼和墨非很早就来和父亲一起工作了，讨论和吉伦作第二次会谈的准备。那位法国将军在中午的时候到达，他的脑中还充满着他模糊的未来军事计划。父亲对他阐明了美国在战时的对法政策：

——临时政府必须组织，而必须由吉伦与戴高乐二人共同负责组织。

——临时政府必须管理法国一切行政设施，直到法国完全解放为止。

吉伦对于这个计划并不怎样热心，可是他亦没有什么相反的意见可以提出，他没有对什么特殊的地方感到不同意，他所关心的只是美国究竟能供给他的殖民地军队以多少军火。

当谈话在并不兴奋的气氛中行将结束的时候，霍浦金斯对我做了个手势。

“你的父亲想买些纪念品，预备带回去送人。你愿意陪我一块儿去物色一番吗？”他说。

“我当然愿意。”

“我们恐怕要到饭后才能去。我想他们还准备拍照——你的父亲和吉伦合照。”

午饭以后，巴顿将军派了他的汽车来接我和霍浦金斯进城去。我们在大街上所看到的只是些地毯和一些质地颇为低劣的摩洛哥皮货。我们派人送了几条地毯到别墅去，给我父亲自己看看，挑选几条合式的。我们接着就坐着汽车在海边区域内兜了个圈子，看一看几星期前我们的部队所攻击的海岸与沙滩。

回到我们别墅的时候，我们发现丘吉尔已经来了，带了他的儿子雷道尔夫。他的儿子那时候是义勇兵团的上尉。从前我曾经见过雷道尔夫一面，那是在阿尔及尔，圣诞节的晚上。我很希望能够和他谈一下，因为我知道他除

了是义勇兵团的一位军官外，同时也是英国国会的一位议员。可是我在没和他谈话之前的希望是如此的高，而谈话后的失望却又如此地大。我发现在阿尔及尔的那个圣诞节的晚上，年青的雷道尔夫对谈话有一个独特的观念，他认为谈话似乎应该是单方面的演讲。

这一次我看到年青的丘吉尔在我父亲的别墅里，我心里暗暗地想看一下，他在他父亲和我父亲的面前，是否能像在我的面前一样，那么没有顾忌而明确地发表他的言论。我最初以为他或许会有点胆怯，可是却没想到他居然还是那样的饶舌，并且对他所提到的任何题目都带着他独断的、决定性的见解。他在场的短短的五十分钟之间，我们只听到他一个人在讲话，他解释错综复杂的巴尔干的战争与政治，他向在场的政治家们说明一种最简易的方法，可以使他们保持英国人在地中海的领导权，而同时却无形中使世界战争延长数年，他暴露出联合参谋总部为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所拟定的作战计划中的错误与失策的地方，他轻淡地为首相和总统解决了那使他们甚感苦恼的微妙的法国政治问题。那真是一番十分出色的表演，抓住了他的听众们的兴趣，但是观众们默然倾听，并非是由于5日来之疲乏，而是觉得他的作风甚为有趣，可以借此分散一下他们紧张的心情（说不定我应当在这里把雷道尔夫的父亲除外，可是我所记的确是我当时的反应，也是我父亲的反应，他在年青的雷道尔夫走以前，始终忍着他的笑）。

他们走了以后，就剩下我和父亲两个人。几分钟以后，巴顿将军的汽车来接我们到他的总部玛司别墅去吃晚饭。那天晚上的晚餐桌上有海军少将柯克、巴顿的代理、陆军少将凯司、陆军准将魏特迈、陆军准将威尔伯、陆军准将赫尔、和陆军上校盖氏。这些军官们大部分是第一装甲兵团中带兵的指挥官，而他们都显然在等待一个机会，想向美国总统声述坦克与装甲部队在一般现代战争中之无比的优越地位。在这个合唱中，巴顿担任了主要的男高音的角色，而其他的人则很合理地加入合唱，配成和声的部分。飞机？步兵？

“装甲！”巴顿叫道。“现代战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今后的战斗，虽不能说是全部，但至少可以说是大部分，将由坦克与装甲机动车所担任，至于步兵？步兵能干些什么呢？除了担任扫荡的工作与保守坦克所占领的阵地。”

我相信那天晚上是我提到了飞机这个题目。

巴顿很有礼貌地加以反驳。

“当然，飞机也有它的用处。我绝对不会说飞机是毫无价值的。我始终认为飞机对于掩护装甲部队的地面作战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我是一个空军，为了表示对空军的忠心起见，我提到了一下飞机这个题目，此外，我便始终谨慎地一语不发。至于我父亲，他只自顾吃他的晚饭，松弛一下他的精神，而尽量享受那个夜餐。他是绝对不会让他自己被牵涉到任何军队内部的争论中的。因此巴顿将军那晚得以随心所欲地发表他的言论（在一个多月以后，他奉命指挥突尼斯南部战场的作战，我颇有趣味地回忆起他的那段谈话，当我听到我们的非洲总司令部的军事广播中不断地发出巴顿将军的请求，要我们作更多的空中侦察，供给更多的空中支援——不是在背后掩护，而是要我们在他的装甲部队之前领导攻击）。

巴顿将军在卡萨布兰卡的总司令部实在像是一个陈列的场所。在我们攻下这城市以前，他的这所别墅是纳粹派到法属摩洛哥的代表团的本部；当敌

人退走的时候，他们匆匆离去，没有时间来取下屋中的任何华贵而值钱的装饰。巴顿将军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一样，领着我们参观屋内各处的华丽的摆设与装饰物。

父亲和我在十一点钟过后就回到我们住的那所别墅中来。回家的途中，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和我开玩笑，讲起方才的装甲部队对空军的论说。他好像觉得很高兴，很得意的样子，而在他的谈话中他表示他的这种心情。我们到家后不到五分钟，丘吉尔就来了，他和我父亲一起喝了杯酒，谈谈关于吉伦与戴高乐的问题。丘吉尔很间接地又重新提出他的主张，说法国临时政府的组织最好还是交给戴高乐一个人去负责办理；他已经知道父亲对吉伦的能力感到相当的不满。可是那天晚上父亲好像没心情和丘吉尔再辩论这一点；他很干脆地拒绝讨论这个问题。或许他是太疲倦了，他并没有很周到而机巧地讲明为什么他不喜欢再多谈这个问题，因此霍浦金斯和我不得不配合起来，小心地尽量把谈话的中心扯到其他无关紧要的题目上去。夜深一时，丘吉尔起身告辞，霍浦金斯也跟着上楼到他的卧室中去。

我送我的父亲到他的卧室中去。父亲说，“现在丘吉尔是当真开始感觉到有些不安了。今天晚上，你自己可以看得出来。”

那天晚上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丘吉尔很明显地想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而父亲则明显地拒绝讨论它，我当时认为我父亲已经疲倦，不愿意多谈。事实上那却是他的一种战略，显然，两方面都知道对方的用意。

“再过两三天你就可以明白这个故事了，”父亲说，现在他的样子突然变得高兴起来。“今天是不是星期二？我可以和你打个小赌，丘吉尔在星期五之前一定会乖乖地告诉我们他有办法叫戴高乐到卡萨布兰卡来。”

我们谈到了巴顿将军，父亲说，“真是一位非常愉快、使人喜欢的人物，你说是不是，伊利奥？”我们又谈到年青的雷道尔夫·丘吉尔，父亲的批评是：“像他这样大胆而没有疑惧的人物大概很少有的吧！”后来我们又谈到那天下午我和霍浦金斯所看到的那些地毯。父亲有些担心英美双方的参谋长们所作的最后军事决定可能引起斯大林与苏联人民的重大反应。“假如斯老头子能够自己来就好了，他可以亲眼看到我们的船舶的困难与生产问题……？”

父亲那天晚上相当疲乏。我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1月20日，星期三。

生产与给养的问题是这一天议事程序中的第一个项目。苏末维尔很早就来和霍浦金斯一起吃早饭，我在八点半下楼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工作好半天了。霍浦金斯当时是优先委员会的主任；关于美国战时生产的情形，他是唯一知道得最详细的一个人，他知道当时美国的生产量还微少得可怜。

我的上司，史巴兹少将在十点钟左右来看我父亲。他是前一天到达卡萨布兰卡的，父亲希望能和他当面谈一谈。史巴兹那时是美国驻非空军总司令，同时他又指挥西北非的空军部队，后者是属于盟国联合航空作战部的，父亲认为这机构听起来似乎有些复杂。史巴兹点头表示同感。

“它的确是相当复杂的，总统先生，”他说。“联合指挥并没有使它更为简易化。泰德恐怕可以说是再理想没有的人物了。”空军上将泰德的阶级比史巴兹高，他是非洲盟国空军的最高统帅，“可是我们虽然相处得十分好，有好多困难还是免不了的。”

“究竟是个什么困难呢？”

“是这么一回事，总统先生：在这个战场之内，所用的飞机差不多全是美国的。战术与战略也是美国的。一切的作战也完全是美国的，可是最高的统帅权却在英国人手里。”

我插了一句嘴。“事实上，爸，史巴兹将军在负责一切空中战斗，可是在泰德的指挥之下。”

“总统先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史巴兹接下去说，“我们的合作不圆满。事实上，我们相处得都很好。我所描述的困难，我相信，是一切盟国，一切联合指挥所共有的困难。联合指挥最容易引起问题的时候是当这个联合指挥部所指挥和管理的只是属于一个盟国的人员与物资。”

父亲点了点头。史巴兹又继续谈到他的司令部所遭遇到的其他问题：在那个时候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得到充分的飞机的补充以及怎样建筑足够应用的硬地机场。我们在非洲的机场是很难能使我们满意的，在一场大雨之后，我们时常不得不取消一切预定的作战计划，有时候是几小时，有时候甚至是在几天之内我们完全无法活动。

与美国的高级将领作这一类的谈话对我父亲有重大的帮助与补益。当时与英国联盟作战的政治情形是这样的：英国人因为答允了给一个美国将领来做最高统帅，坚持要由英国将领来担任比最高统帅略次一级的职位，这种要求也是相当正当的。因此海军总司令便由一个英国人（柯银汉）来充任，而空军总司令也是一个英国人（泰德）。在地中海一带，由英国人来指挥一切海军作战活动可以说是很恰当的，可是在空军作战中便有些不同了；史巴兹得负全责来指挥一切空战的活动，而同时却必须服从一个英国皇家空军将领的命令，固然这位将领是一个非常有才干而使人有好感的军人，可是在实际上，史巴兹还是不免感到许多不便与困难。

墨非，象个油滑的伸缩玩具，那天早晨又探进头来看我父亲和霍浦金斯。他们讨论怎么样使戴高乐的支持者，英国政府，能够觉悟到我们是的确确实地主张法国的任何临时政府必须包罗戴高乐以外的势力。他们还在谈论着的时候，丘吉尔和他的顾问麦克美伦来吃午饭；我在花园内的餐桌上添了几个位子，而他们继续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把戴高乐带到卡萨布兰卡来是不是探明他反对这计划中的临时政府的真正理由的最好的办法？是不是应该马上就叫他来？为了要叫他到这儿来，使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头痛的问题，丘吉尔以为我们应该做何种的让步？美国方面是否能够确定在将来的政治舞台上是非吉伦不可的？除开了主观上的冲突，是否尚有其他的不和阻碍这两个人到达一个圆满的政治上的联盟？

谈论到最后，丘吉尔突然把椅子朝后一推，站了起来，说他准备再去见一下吉伦。我偷偷地看了一下父亲，可是他脸上的表情只透露出一种友好的关心。即使他还是在怀疑丘吉尔的动作完全是一种做作和政治上的策略，他是绝对不会在外表上表示出来的。

快近傍晚的时候，丘吉尔又走进了父亲的别墅中的起居室，后面跟着吉伦。这一次我留在外面和父亲的密探们以及偶尔的来客们闲聊，没有进去听他们的谈话。在屋子里，父亲与丘吉尔以吉伦和他的侍从文官波尼亚托斯基为对象，仔细地研究戴高乐所提出的各项问题；正确地计算怎么样可以使他们这一次的联盟不致于完全是动摇性的；尽量地从单方面来沟通这两位主观甚强的法国军事领袖间的主观上的不和。这些是我屡次听他们在反复谈论的

话题。父亲和丘吉尔一定会和我一样地感到厌烦了，可是我终究比他们好得多，因为至少我是可以毋须抓住这个问题不放的。

当他们走了以后，我口到我父亲的身边，脑中在想着今天晚上该在丘吉尔的住所晚餐，而说不定在晚餐席上他们又得讨论起这同一的问题。父亲正在批阅一堆刚从华盛顿送来的公文，看见我走进房门，他抬起头来，说了句使我放心的话：

“伊利奥，我们已经决定今晚不再谈公事。”

在丘吉尔的别墅中的那一个晚餐会的确是十分欢乐而愉快的。作为英国的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老是坚持着要随身带着大英帝国的作战计划。他的侍从们为他布置了一间壮丽的作战室，到处铺着，贴着各个战场的地图。他非常高兴而得意地指点给我们看：假如战争是一种游戏，而不是那种血腥的、混乱的、乏味的、消耗元气的勾当，我相信这些地图实在是一切游戏中最好玩的了。每一张地图上都插满了小针，可以拔出来又插到其他的位置上去。而最迷人的可以说是那张北大西洋的大海图，上面以各色各样的记号指示出纳粹的潜艇活动，每一个滑动的小型潜艇代表一个纳粹的潜艇集团：很多的纳粹潜艇静伏在罗列翁和布勤斯特，又有很多潜艇指向西方，针对着我们航向英国本上的船舶集团，一部分潜艇埋伏在阿速尔群岛的海中，又有一部分在冰岛海外，或是指向北方，监视着摩尔曼斯克的海航线，每天丘吉尔看他们在这张大地图上登记关于船舶动态的最近情报；每一次都怀着重大的不安的心情，担心着这一批船舶是否可以平安无事地完成它们的旅程？那一批船舶中有多少吨的重要物资将爆炸、散失、而沉到海底？英国的海岸巡逻队是否有一个机会来狠狠地炸掉几支这些豺狼似的潜艇？那一年冬天，北大西洋的海战将要到达一个最高潮的阶段；这张大海图上的小针与小型潜艇所产生的不安的心情正代表着全世界的不安与关心，它的解决包含了世界史课题的解答。

那晚我们回来得比较早，父亲一回家就上床了，因为第二天将是一个漫长而忙碌的日子。

1月21日，星期四。

我还没下楼，他就已经起身，吃完早饭，出门去了。与他同去的有霍浦金斯、哈立曼、麦金泰和墨非；克拉克将军是他们那天的主人。从卡萨布兰卡乘车向北到拉巴特，在那儿我父亲去检阅第二装甲兵团，步兵第三师与步兵第九师。他们一批人形成一个相当可观的行列：领头的是一队宪兵机器脚踏车队，一部吉普车，一部侦察车，接着是我父亲的轿车，随后的是侍从他的一行人，坐着军车，再后的是两部重卡车，载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两部侦察车，又是一队机器脚踏车队殿后。我父亲的密探头迈克甚至还准备了一队战斗机，在高空保护他们一路沿着海岸线向北，然后保护他们回来。

八小时以后他回来了。

“好玩吗？”

“好极了！真是再好没有的一个生活的变换……”“可以暂时忘掉一下吉伦和戴高乐，是不是？”

“事实上，今天早晨去的时候，我们在路上看到几队法国摩洛哥的步兵与骑兵队在操练。我没说什么，但是我想可能是吉伦故意叫他们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操练，使我可以看到他屡次所说的……”

“你坐了一天的汽车？”

“不。他们为我准备了一辆吉普车来检阅第二装甲兵团和步兵第三师。我得说，一进吉普车，我坐上好半天才下来。”“你忙不忙，是不是还有旁的事要做？假如你……”

“我没事，晚饭以前没人来找我，你坐下来，我要告诉你一天的经过。我希望你能看到那个步兵师团中有几个人脸上的表情。你可以听到他们惊异他说：“噢，是老头子亲自来啦！”说到这儿，父亲哈哈大笑起来。

“你在哪儿吃午饭的，爸？”

“在检阅场上露天吃的。和克拉克、巴顿在一起吃的。当然，还有霍浦金斯。”他向楼上喊道：“喂，哈菜！你说今天在检阅场上吃的那顿午饭好吃不好吃？”

霍浦金斯正在楼上洗澡间里洗热水浴，他大声地回答：“午饭时的音乐真是再好没有了。”

“对了，”父亲说，“他们奏阿历山大的爵士铜乐曲，还有一只关于德克萨斯的曲子，一边奏着一边拍手的，你总知道的……”“是不是那支叫做在德克萨斯的中心的曲子？”

“就是那支。此外他们还奏了几只华尔兹舞。伊利奥，你告诉我。除了美国军队，还有什么国家的军队能够有联队的军乐队奏那一类的乐曲，而他们的总司令则正在一旁吃着火腿，洋山芋和青豆？”他伸了一个懒腰。“啊，我今天累了。午饭以后我又检阅了步兵第九师，然后我们坐着汽车一直开到劳乌梯港口。”

“你看到码头上那些船吗？”

“我们炸沉的那些船吗？当然我看到了。”

“我不晓得你计划着要到劳乌梯海港去的。”

“那儿有我们的一所公墓，”父亲提醒我。“公墓里躺着八十八个美国的勇士。我们留了一个花圈在那儿……也留了一个在法国公墓里……”

“不凑巧今天天气不大好。”

“雨是四点半以后才下的。……这些军队，伊利奥。他们个个都精神抖擞，随时随地都可以应战似的。一个个都那么壮，晒得黑黑的微笑着，并且……并且装备整齐。”

“嗨，你这是什么？”

“什么？喔，这个，这是我今天吃午饭的饭盒。他们送了给我。我预备把它带回国去做一个纪念品。”

“说实话，爸，你又在胡乱收集东西了。……你得知道一个海陆空军总司令就是在国内要捡一个饭盒也不难呀！”

“一点不错。可是这只饭盒是我亲自用来吃午饭的，在拉巴特，在我检阅参加这次艰苦的战争的三师美国兵的那一天。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品。我一定要把它带回去。”

他已经快回到他卧室门口，预备去换衣服了，突然间我们听到客厅里有人走动。那是丘吉尔，他跳了进来，满脸的笑容。

“我坐一分钟就走，”他叫道，“我来告诉一点最近的消息，而且是好消息！”

“总司令部来的消息？”父亲问。“是什么消息？”

“伦敦来的消息，”丘吉尔笑容满面他说。“戴高乐，看来好像是我们已经有办法劝他到这儿来参加我们的会谈了。”

沉默了一下子，父亲简短地说：“很好。”他慢慢地向卧室移动。“恭喜你，丘吉尔。我始终，”他说，相当尖锐地，“我始终知道你是有办法的。”

那天晚上，父亲九点半就睡了。那是他到北非以后睡得最长的一晚。

1月22日，星期五。

快近中午的时分，通讯兵团派人来为父亲与丘吉尔拍几张正式的像片，全体参谋长们也参加一起摄影。阳光照耀着，大家都坐在父亲的别墅外面的庭院中；大家高声地谈笑着，空气十分和谐而随便，会议中艰重的工作已经快近结束的阶段。关于怎么样使戴高乐与吉伦结合起来的一个微妙的谈判固然还没有完成，但是谈判的基础却已经奠定了。不论是好是坏，军事方面的决定大致已经通过，而唯一还没有开始的工作是草拟一份向全世界公布的联合声明，阐明卡萨布兰卡会议的立场。

摄影完了以后，父亲和马歇尔将军两人一起进午餐，午餐以后，他们俩人又在父亲的起居室谈了很久。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我静静地坐在门口的扶梯上，等候父亲的使唤。我可以听得到他们的谈话：马歇尔解释美国参谋总长们在提出1943年进攻欧洲这个议案时所遭遇到的各种困难，可是现在双方总算决定了在地中海的作战计划；他简略地叙述他们怎么样压服了英国方面进攻缅甸的野心；他又报告说英美双方同意在盟军顺利地进攻西西里的场合，对于意大利的攻击务须以不扩大范围为原则。马歇尔走了以后，那天下午父亲便没有什么其他的约会了，他和我谈起联合参谋长会议不知经历了多少险峻的道路才达到了进攻西西里的这一个计划；他带有哲学风味地批判英国方面坚持不愿从西方，而想从南方来攻入欧洲的计划；他很担心斯大林的态度。当后者听到我们又要延迟横渡英法海峡的作战的时候；他说：“战争是变化不定的事件。要获得这次战争的胜利，我们必须与一个盟国维持很困难的团结，而同时却显然地把另一个盟国置于不利的地位。要想获得这次战争的胜利，我们被迫采取一种战术上的妥协，这妥协必然地要得罪苏联，而使我们将来不得不采取另一种妥协，而这另一种妥协又必然地要将得罪英国。总而言之，战争的迫切需要主宰了一条艰难的道路。”

“可是迟早我们要得到胜利的……”我开始申述我的意见。

他的回答是：“我们为战争而形成的团结决不是我们为建设和平而形成的团结，两者的距离相差太远了。战争终结以后，我们马上可以听到一种呼声，说我们的团结是可以不必要的了。那个时候才是我们的工作真正地开始的时候。”

那天晚上，晚餐以前没有鸡尾酒，晚餐的时候没有葡萄酒，也没有猪肉。苏丹——回教的“天父之子”是我们的贵宾。

他来了，带着继承他王位的年青的儿子、他的大宰相、他的文书大臣，全都披着华贵的飘动的白绸袍，并且还带了礼物：一对金镯子和一座高高的妇人头上戴的冠冕，是送给我母亲的。一看见那座冠冕，父亲直着脸对我斜看了一眼，接着很庄严地闪了一下他的眼睛。当时在我们俩人的心目中有着一样的思想：想到我母亲在白宫里主持一个形式的宴会，头发上高耸着那一座又高又大的威严的冠冕。

苏丹坐在我父亲的右边，丘吉尔坐在父亲的左边，于是晚餐开始了。开头的时候丘吉尔好像兴致十分好，他告诉我们，戴高乐在那天中午时候已经到达，并且已经和吉伦一起吃过午饭，去拜访过丘吉尔。可是在谈话的进行中，丘吉尔的脸色却变得愈来愈难看了。使他不高兴的原因是父亲和苏丹非

常融洽地谈到法属摩洛哥的广大的天然资源，以及开发它的丰富的可能性。他们两个谈得十分高兴，他们的法文，并不是丘吉尔的最强的语言，使他们很容易地谈论到许多问题，诸如怎么样提高摩洛哥人的生活标准，以及应该怎么样保留摩洛哥的大部分财富在它的国境之内，以达到这一个目的。

苏丹表示他是万分愿意能够得到外界的最大帮助，使他的国土中可以获得普遍的近代教育与近代卫生的水准。

父亲为他指明说，要达到这一个目的，苏丹不应该让外国的势力在他的国内得到特权，这种特权将使他的财富外溢，以致干涸。

丘吉尔想改换他们的谈话题目。

苏丹，又提起了方才被丘吉尔切断的谈话线索，问我父亲关于法国政府对将来的意见。

父亲把他的叉子放平稳了，然后很高兴地说，战后的情景与战前的情景将有明显的不同，尤其是关于殖民地问题。

丘吉尔干咳了一声，立刻讲起其他的事情，想把话题扯开去。

苏丹很有礼貌地，进一步问我父亲，他所说的“显然的不同”究竟是什么意思？

父亲开始叙述英法两国金融家之间以往的关系，说他们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只顾自己的财团组合，以榨取殖民地的财富为目的，最后他又说到法属摩洛哥可能有很大的藏油量。

苏丹很热心地抓住这个题目，声明他是绝对赞成任何这些资源的开发，接着他又很忧愁地摇了摇头，悲叹他的国内缺乏有训练的科学家与工程师，缺乏那些可以毋须外来的帮助而能自己开发这些资源的技术人员。

丘吉尔非常不安地在他的椅子上移动着。

父亲很温和地提议摩洛哥可以派遣人士到国外，譬如说，美国的有名的大学去受教育，训练成工程师或是科学家。

苏丹点了点头，假如不是出于礼貌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当场拿出纸笔，记下这些大学的名称与地址的。

父亲继续发表他关于这一点的意见，手里玩弄着他面前的玻璃杯。他说苏丹可以和几家美国的大公司订立合同，委托他们来实行他所谈到的开发计划，只要送给这些订约的公司一笔酬劳或是以百分比来分配利益。他说这种方式，对摩洛哥有很大的利益，可以使法属摩洛哥政府保留它自己的资源的大部分，并且，最后还可以把它们收回来，完全自己管理。

丘吉尔鼻子里哼了一声，装作没听见。

那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晚餐会，全体宾主，有一个人除外，可以说是尽欢而散。当我们吃完了，全体站起来的时候，苏丹向我父亲保证他在战争终结以后，将立刻请求美国政府来帮助开发他的国家。他满脸红光，快乐地叫道：“我的国家有了一个新的未来！”

皱紧了眉头，咬住根大雪茄，那位英国的首相跟在苏丹的后面走出了饭厅。

戴高乐在那一天的到达好像是夏天的闪电一样的突然，可是却澄清了郁结的空气。苏丹在饭后显然还想多坐一会儿，以便更详尽地讨论我父亲在餐桌上提出的许多问题，可是我父亲当晚的工作使他无法留他多坐。父亲向麦克利上尉做了个手势，叫他留下来做记录，又对墨非和霍浦金斯做了同样的

手势，最后叫我也留下，以便有什么特别的使唤，而其他的人则都起身告辞。于是，什么都准备好了，只待戴高乐的登场。

他是在人们走了以后十分钟来的。进门的时候，头高高地昂着，满脸是阴沉的气色，样子十分难看。他和父亲谈了近三十分钟，父亲的态度非常客气，戴高乐则始终是那么冷淡而暧昧。下面是一段他们典型的谈话：

父亲：“我确信我们能够帮助你的伟大的国家走上复兴的大道。”

戴高乐：（嘴里哼了一声，一言不发）。

父亲：“同时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的国家能参加这一件伟大的工作实在感到万分荣幸。”

戴高乐：（咕哝了一声）“你太客气了。”

那一段苦涩无味的谈话总算告了一个段落，僵硬地坐在椅子上的那个法国人笔直地站了起来，好像开正步似地向门口走去，头也不回。

几分钟以后，丘吉尔又来了，他的后面跟着麦克美伦。他们又花了一小时互相报告并且讨论各人和戴高乐谈话的经过。戴高乐对我父亲的那种傲慢而阴沉的态度并没有使我父亲感到气恼，我想他早就猜想到戴高乐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墨非先说话，接着是丘吉尔，接着是霍浦金斯，接着我听到我父亲的声音，接着又轮到丘吉尔。我自己则在想：现在在法国的那些人民怎么样？那些在抵抗德国的法国人民又怎么样？他们拥护哪一个？戴高乐？还是吉伦？拥护他们之中的一个？还是两个都拥护？

最后，我听到我父亲平静的声音：“过去的已经过去，没法子再挽回。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两个人，他们将以同等的地位、同等的责任来建立起法国的临时议会。在这一步办到以后，法国的民主政权已经走上了再生的道路。当临时议会开始执行它的任务的时候，法国的民主就向前跨出了它的第一步。不久，法国的民主政权就可以自己来决定戴高乐的命运和吉伦的命运。这将不再是我们的事情了。”

丘吉尔和其他人走以后，父亲和我谈起法国和法国的前途。

“前几天我们已经谈到，”他说，“怎么样将法国政权逐步交给一个有戴高乐与吉伦的联合政府，在法国解放过程中由他们担任这方面的责任。过渡时期的政权一直延续到法国可以举行自由普选的时候为止。这看来似乎是唯一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可是戴高乐一定还是要作对的！”

“他认为必须由他来判断谁应该参加，谁不应该参加法国临时政府。这一个观念在他脑中已经固定了。”

“他不是还说到法国的殖民地吗？”我补充地说，“我从厨房里走进来的时候听到……”

“一点也不错。他很明确地说希望盟国在法国获得解放后立刻将法国全部殖民地交还法国管理。你知道，盟国必须在北非的法国殖民地内维持军政管理，这时期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几年。我现在还不敢断定我们将殖民地归还给法国是正当的。”

“嗨，你听我说，爸，这一点我不明白。我知道殖民地是很重要的，可是不论怎样，这些殖民地是属于法国的。……我们又怎能不还给法国呢？”

他看了我一眼。“它们怎么会是属于法国的？比如说摩洛哥，人民全是摩洛哥人，国家反而属于法国？再拿越南来说，日本人现在统治那个殖民地。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容易地征服了那块土地？越南的土人在法国人的统治之下是那样被践踏、被虐待，以致他们认为谁来都可以，总比生活在法国的殖民

地统治之下要好得多。为什么这些土地属于法国？有什么逻辑、什么历史法则能做根据？”

“是的，可是……”

“我是讲另一个战争，伊利奥，”父亲叫道，他的声音突然严厉起来。

“我是讲在这次战争以后，我们再允许千百万人民重又回到半奴隶状态中去，这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有权利说话，是我们使法国获得自由解放的。”我提出了这一点。

“伊利奥，你该知道，假如不是为了法国、英国以及荷兰的那种贪婪，我们美国人是绝不会今夜死在太平洋之中的。难道我们应该让他们再像从前那样胡作妄为吗？再过15年或20年，你的儿子又到达当兵的年龄了。”

“联合国组织成立以后，他们可以来接收这些殖民地，在委托管理的制度下保管一定的年份。”

“我再说一句活，伊利奥，说完了我就得请你滚蛋，我疲倦了。这句话就是：‘在我们获得胜利以后，我将尽我全部的力量使美国不致于重蹈故辙，接受任何足以伸长法国帝国主义野心的计划，或是任何足以教唆英国施展其帝国主义野心的方案。’”

他指了指门旁的电灯开关，没留神在门边上碰痛了他的大拇指。

1月23日，星期六。

父亲这天起身比较迟，在他没起床的时候，由霍浦金斯接待许多来看他的人物。安诺德将军先来，哈立曼也跟着到来，最后到的是巴顿将军。我并没有什么事可做，于是我在我们的那位不相识的法国女主人图书室内消磨了一个多小时。这位女主人的读书的嗜好偏重在轻松的小说——诸如戈莱脱的作品等等，可是最后我终于发现了一本使我注目的书。那是一本纸封面的平装本，我把它从书架上拿下来，挟着它走进我父亲的卧室，他刚吃完了一顿很迟的早餐。

“看过这本书没有？”我问，把那本书掷在他的怀里。

那是安得莱·莫理斯为他写的传记。他非常喜欢地翻阅了一下。

“给我支笔，伊利奥。那儿……在那只梳妆台上。”

于是他用非常华丽的法文语体在那本书上签了字，写上一段纪念词赠给那位女主人，对于我们在她的别墅内过了很多愉快的时间表示谢意。在写这一段纪念词的时候，我父亲使用了一切他所能想得到的最得体的、最花巧的法文词汇。

“现在给我把这本书放回原处，伊利奥。不过我敢打赌她是决不会再把这本书抽出来看的。真是太坏了！我倒真想看看假如她再翻到这本书的时候脸上的表情。”

“我倒想看看书店老板脸上的表情，假如他将来无意中居然收买到这本书的时候。”

“别胡恩乱想了。”他大声地笑起来。于是我把那本书放回原先的书架中。

那天一起吃午饭的只有霍浦金斯、丘吉尔、我父亲和我。“无条件投降”这个词就是在那天的午餐桌上产生的。不论那个词有没有什么独特的价值，但它是父亲创造出来的词，霍浦金斯十分喜欢它；丘吉尔一面慢慢地嚼着他嘴里的东西，想了一下，皱了皱眉头，又想了一下，最后脸上泛出微笑，终于说话了：“真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词！而我现在可以看得到戈培尔和他的

党羽们听到这个词后将怎么样狂叫起来！”

事实上，“戈培尔和他的党羽们”这两三天来已经开始在不安地叫了。我们的食堂隔壁的那间小厨房是我们的密探们时常坐着闲谈的地方，那里安置着一架短波无线电，我们时常在那里听他们的英语广播：他们恼怒地猜测究竟有什么大事在卡萨布兰卡进行，而他们已经一步步地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父亲，在他的新词被旁人赞同了以后，就开始思索它在其他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

“当然喽，这正是苏联所希望的，这对他们是再好没有了。无条件投降，”他又重复了一遍，舌头敌吸着他的牙齿。“说不定斯大林自己早就想到了这个词。”

霍浦金斯说：“一吃完饭，我们立刻为那个联合公报写一份草稿。”

“新闻记者们明天就到。”父亲说。

“我知道的，五点半钟参谋长们来的时候我把它准备好。”

那天下午，墨非与麦克美伦来了两次，坐的时间很短，好像颇有些神经质。父亲决定在第二天同时召见戴高乐与吉伦。快近傍晚的时候，双方的参谋长们都到了，他们陪着父亲和丘吉尔围着食堂中的那张大餐桌坐着。那是最后一次大规模会议，双方之间的最细微的冲突都已经解决，发动 HUSKY 作战的日子也都初步地确定了，丘吉尔声明他希望你不要直接攻入意大利，以便绕巴尔干半岛大规模地进攻欧洲。于是，1943 年横渡英法海峡的 ROUNDUP 的作战计划不得不搁在一边，以便实行 1944 年的另一个计划 OVERLORD。双方又拟定了一部详细的计划，预备在西西里的战事结束后，即将部队及物资撤退至英国集中（而北非战事也将结束）。这次会议到八点钟左右才散会，每个人都对会议的成果感到满意和欢喜。

联合公报的草稿在大家面前宣读了一次，有的部分需要改动，其他部分另行起草。卡萨布兰卡会议已经接近结束。人们都开始收拾行李，回到各自的防地。

晚饭时没有什么客人：只有霍浦金斯、他的儿子鲍勃（他是两三天前满身污垢、头发散乱地从最前线他的战斗摄影部队飞来的），父亲和我四个人。晚饭时谈的都是公事。

晚饭以后，直到夜深，父亲、丘吉尔和霍浦金斯一起草拟那个行将发表的联合公报的最后文稿，以及给斯大林的电文。墨非和麦克美伦也来坐了一会，提供了一些意见，补充那个联合公报中关于法国政局的一部分。他们在两点的时候退出，两点半的时候丘吉尔举起他的不离手的酒杯。

“无条件投降。”语气中并无惊叹号，只有坚定的意志。我们大家都干杯。

1 月 24 日，星期日。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早晨十一点钟，吉伦将军来了，父亲立刻和他开始工作。

“将军，你必须保证你愿意和戴高乐在一起……”

“戴高乐这家伙！他是个利己主义者。”

“我告诉你，我对于你的某一方面的疑虑很有同感，而也就因为如此，我才劝你……”

“他是一个没有大用的将军。我所需要的只是军队的给养与援助，我可

以……”

“……必须和他一起合作，为你们的国家草定一个过渡时期的临时政府的计划。将军……”

三十分钟以后。终于：

“我懂得了，总统先生，我懂得了。”

他们还在谈话的时候，戴高乐来了，站在外面客厅里，焦躁而气恼地等着。他与吉伦两个人在门口擦肩而过。戴高乐走了进去。

路已经铺平了，可是重要的主角却需再三的催促才肯登台。戴高乐活像是故事中的女孩，倔强地不肯轻易就范。父亲一步步地进迫，由和蔼的请求而转为诚恳的劝导，由催促而终于采用直接的命令。在他采用了最后这一个步骤的时候，他向我点了点头，我轻轻地走出门外，向吉伦做了个手势，和他一起走回到房中。两位将军死板地面对面瞧着。为使他们言归于好，父亲叫他们两人用握手的方式来肯定他们在我父亲面前所应承的诺言。他们终于交换了一次短短的甚为勉强的握手。丘吉尔在这时候走了进来，父亲满脸都是笑容。他并没有说：“告诉这个人……讲呀，告诉他你在我面前怎么说的。”可是这些话却全在他表情中流露出来了。

“我们已经同意，”戴高乐简短地对丘吉尔说，“我们将尽我们的力量来草拟一部圆满的计划”，他停顿了一下，“一起行动。”吉伦点了点头，表示肯定。

“来呀，”父亲叫道，“拍照！”于是他们四个人都到后面院子里去摄影。当摄影机的开关“喀嚓”响了一声，而活动的镜头转过来对着他们的时候，这两位将军又握了一次手，父亲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早就聚在外面等待着的记者们与摄影记者们在十二点的时候被请到草地上，围着父亲和丘吉尔坐下。父亲和丘吉尔并排坐着，谈说会议的经过。在强烈的阳光下，只有父亲眼睛下面凹进的眼圈，他的黑领带与他袖子上的黑纱（那时候他还带着祖母的孝）是没有色彩的。丘吉尔的铜盆帽很威风地顶在他的头上，他的雪茄从右边转到左边，一下子又从左边转到右边。他满脸都是欢乐的神情。“无条件投降！”记者们飞快地用铅笔在纸上记了下来。这一次记者会议并不长，在结束的时候，父亲和丘吉尔轮流和每个人握手。

“你们这一群人大概可以说是记者的精华了，”父亲喃喃地说。“在白宫中的记者招待会上，出席记者之多是我无法和他们一个个握手的。”

我陪着他回到屋里，向他告辞，因为在几分钟之内我就要出发回到我的部队里去。

“怎么样？”

“怎么样？”

“OK，爸，……现在什么都OK了！”

“是的……我们完成了不少的事。相当值得的。”

“我想这一次暂时的生活与工作变换对你有很大好处。”

“伊利奥，我还想和你交换一印象。有一件事我很想弄明白。”

“什么事？”

“我很迫切地想知道……”他突然停止不说，想了一会，又开始了，“你知道，多少世纪以来，英国人始终在历史上重复着同一的勾当。他们总是非常聪明地，非常正确地选择他们的同盟国。他们经历过很多次的战争，可是在他们所参加的每一次战争中，他们都有办法胜利地爬起来，继续以他们反

动的手掌把握住世界的人民与世界的市场。 ”

“ 是的…… ”

“ 这一次，我们是英国的同盟国。我相信我们是应该做它的同盟国。可是……最初在沃根基，其后在华盛顿，现在在卡萨布兰卡……我极力想使丘吉尔和其他的人们明白我们虽然是他们的同盟国，预备和他们并肩走向胜利，可是他们绝对不能再以为我们与他们联盟是单单为了要帮助他们坚持他们的古老的、中世纪的帝国观念。 ”

“ 我懂得你的意思， ” 我慢慢地说， “ 我想他们也该明白这一点。 ”

“ 我希望如此，我希望他们能够觉悟到他们并不是这个同盟的主宰。他们应该明白在胜利以后，我们决不会坐在一边，袖手旁观他们的反动制度压制亚洲每一个国家以及欧洲半数的国家的成长与发展…… ”

“ 英国已经在大西洋宪章上签了字。我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美国政府确实要他们履行这部宪章上所规定的任务。 ”

霍浦金斯从门口探进他的头来。 “ 诺戈斯在这儿，他是来送行的。还有密乞里也在。 ”

“ 密乞里？ ”

“ 法国北非舰队的总司令。 ”

“ 噢，对了。我马上就出来……现在，孩子？ ”

“ 再会，爸！ ”

“ 再会。 ”

“ 代我向你母亲问好，带我的吻给他，希望你保重身体。 ”

“ ……别忘记你自己也得多多珍重你的身体，你才是容易受伤的一个。 ”

二十分钟后，在一队汽车的护送下，他出发了。我也接着出发向阿尔及尔，回到战争的怀抱中。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后，父亲从北非回到国内，明显地老了，对战争的过度操劳，严重地损害了他那病残的身体，为了调换一下工作环境，从 1942 年夏天起，父亲大部分时间在华盛顿以北 66 英里的马里兰群山中一所名叫 “ 香格里拉 ” 的别墅里办公。这是一所只有四间卧室的简朴山庄，里面有总统专用的浴室，还有一间客人用的浴室。另外，有秘书人员、电话总机、特工人员的篷屋，周围是陆战队的营地。这里空气新鲜，环境幽雅。闲时，父亲就坐在装有纱窗的小走廊里，观赏卡托克延山谷的美景。工作累了，他喜欢玩赏自己的集邮，打打单人纸牌，在自己图书室送来的书籍上签上名字，或是签上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 F · D · R。照他说，他起初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人们总是借了白宫的书而不归还。他的一位朋友打趣地问他： “ 总统先生，你认为人家对经过你笔签过名的书可能会收敛些吗？ ” 但是总统总相信这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措施。那一年 8 月，他把一本书送给他的顾问舍伍德，这是人家送给他的一本很旧的《诗篇》。他通读了这本书，还在某些段落上打了记号。父亲作记号的一个地方，其中有第三十九首诗篇的最后一句诗： “ 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 ”

在 “ 香格里拉 ” 别墅里，父亲在起居室或走廊里批阅送来的文件，草拟和发出给马歇尔的函件以及给丘吉尔、斯大林或蒋介石的海底电报。总统同他的统帅部筹划，指挥着太平洋、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战争。他虽然非常劳累辛苦，但不时地收到来自各条战线的胜利消息，他的心情就无比欢快。经常对他周围的人说： “ 我们进行战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赢得胜利，而更重要的是赢得真正的和平。 ”

第五章艾森豪威尔总是赢家

没有优势，美国决不进入欧洲

罗斯福，欧洲战事应在 1944 年底结束

美国应当成为中苏、中英之间的调解人

斯大林格勒的消息对于我们在阿尔及尔的人们是一支最好的兴奋剂。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我们部队的工作也实在够繁重的了，因此，我们也需要时时刻刻传来的令人兴奋的消息。我们当时的工作是给“战术”空军空袭意大利提供所需要的一切情报，另一方面则为“战略”空军监视纳粹部队的行动，以及为我们的非洲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好像这些工作还不够多，后来我们又担负起 Husky（进攻西西里）作战中的空中摄影侦察任务。空中摄影就是：从空中测量地上的目标，飞机必须保持直线飞行与一定的高度，使你拍摄的照片能够有统一大小比例的标准。执行这种任务的飞机是赤裸裸地没有任何自卫武器装备的，而飞行员也无法作战术躲避飞行。这种摄影侦察飞行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飞机的损失率是每月百分之二十。在我们到达北非后的九十天之内，我们部队中最初的九十四名飞行员只剩下不到十个。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作战，我的处境十分艰难，而我的工作也差不多像驴推磨似地忙个不停，通过整个春天一直到初夏，我都不曾有轻松的日子。有一两次我曾经被邀请到总司令部去和艾森豪威尔以及他的陆海军侍从武官打桥牌。（轮到我和艾森豪威尔合伙的时候，我总是赢的，否则，我只有听凭我的运气了。）

最后的那一次桥牌会正是我们开始攻击西西里的前几天。那天晚上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我们部队在占领潘脱莱利亚岛的要塞时的辉煌的表现，这一个要塞岛完全是由空军占领的。由于那次意外的成就我感到很得意，未免有些“来吧，你们这些纳粹们，来多少我们干掉你多少”的那种神气。艾森豪威尔将军以他那种稳重的、沉着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潘脱莱利亚，是不是？”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全体地面部队向空军全体投降，”我骄傲地说。“现在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了。”

艾森豪威尔将军很清醒地说，“当我们进入欧洲的时候，必须有如此优势的物资与火力才能使谁都无法阻挡我们。并且，在我们还没有做好这种准备以前，我们决不进入欧洲。”突然他又带着沉思的神情说，“即使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许还会遇到阻挡。”

大家都沉默了，想想法国的海岸，有多少人被杀死，有多少飞机被击落，有多少船舶被打沉。

“欧洲还远得很，离我们不知有多少里、还要过多少月，”艾森豪威尔说，他好像是在大声地说出他的思想。“我们应该一步步地做，而目前西西里是我们第一个目标。”

我知道艾森豪威尔曾经主张在 1942 年就开辟第二战场，可是他的计划却被英国方面否决了。我知道他与我们的联合参谋总部决定在 1943 年必须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虽然英国方面可能更容易地再度劝止我们，因为我们大部他的军队已经用于地中海战区。现在，在 1943 年的初夏听到他的这个清醒而谦逊的估计，对于我们的美军总司令，我有了更高的敬意，由于他对部下人

员的关切与爱护，他坚持以最大限度的美国生产品拨给我们的军队。可以猜到即使是在 1944 年，当我已经确信进攻西欧的战争一定要发动了，虽然艾森豪威尔将军已经奉献出整个的心灵，但他还是以最谦逊、最小心的态度来处理这一件伟大的任务。

不久 HUSKY 战役便正式发动了。我们部队所圆满完成的初步工作使我们都感到十分高兴。七月的下旬，当我们部队正在西西里肃清残余的最后一批纳粹的时候，我的高级司令官接到陆军部的一道命令，叫我即刻回到美国，协商整顿侦察作战中的许多问题。同时，太平洋战区也派了个卡尔·波立夫加上校去，他在那儿一向做着与我同样性质的工作。这个命令将使我在华盛顿停留两个月，8 月和 9 月；我一方面因为要离开我们部队，觉得十分遗憾；另一方面则很想看看我的父亲和母亲，以及其他没有派往海外工作的亲人。

我在五角大楼必须专心一意地去做工作，因为他与我们未来的侦察作战有十分重大的关系。可是很幸运，这工作并没有阻碍我时常与我父亲见面谈话的机会。

他的健康并不如我想像中的那么好，与六个月以前卡萨布兰卡的时候相比，他已经显得老多了。那一年夏天，他的静脉窦的病又复发了，可是他的精神还是很好。他对于战争的军事前途流露出非常沉着的自信。我去看他的时候，多半是在早晨他吃完早餐以后，九、十点钟的时候，或是在晚上十一点钟左右，当他的最后一位访客已经离去的时候。在他的心目中，战争的策略已经发展到一个他可以看到最后胜利的阶段，而他甚至可以断定那个胜利的日期。9 月中的某一晚，他提到那个日期。

“欧洲的战事可以在 1944 年的年底结束。”

我吹了声口哨。

“瞧红军在中部猛烈的攻势……”

“1944 年的年底？！”

“当然毫无问题，假如我们对法国的攻击能够有力而迅速。”

“法国？”我狡猾地问。

他的神色丝毫没有变动。“我不知道。攻击法国应该是相当合乎逻辑的。也很容易地可能是欧洲的下部，或是德国，或是挪威，我不知道。”他脸上充满着直率的表情。

“日本呢？这种从一个岛打到另一个岛的战术——是相当费时间的……恐怕要到 1946 年的年底才打得完罢？”

“不会的。1945 年的下半年就可以结束了。最迟是 1946 年的年初。你想想，当希特勒被打倒了以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全部力量来对付日本，他们还能受得了吗？”

“那么英国呢？苏联呢？他们会不会继续协助我们？或者只是蹲在一旁，想休养它们自己的创口呢？”

“你知道我们在卡萨布兰卡的声明。丘吉尔完全同意这个声明，而后来斯大林也表示同意的。”

“据我所知道的，英国人在打败希特勒以后，将不再对战争发生兴趣，他们已经厌倦了战争。而我们又是否能信任苏联呢？”

“我们现在是信任苏联的，是不是？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明天不信任它呢？总之，我希望在最近能够亲自见到斯大林。”

“什么？真的吗？”

他点了点头。“在目前，我们还是在谈判中。他要我们到他的国土中去和他会面。他还是很小心地向我们说明他是在亲自指挥着红军作战。而我必须说句公平话，只要红军能像目前这样地继续向前推进，别人是很难能够作出任何足以延迟他们行动的提议。”

“我猜想他也或许有些怕罢。”

“怕？怕什么？”

“怕你和丘吉尔两人会做个圈套，把他套住。诸如此类的玩意儿。”

父亲笑了一下。“我怀疑他的人民对我与丘吉尔的所谓‘友好’关系是知道得相当详细的，”他颇为神秘地说。

不多几天以后，父亲和一批顾问们坐火车出发向北，到魁北克去会见丘吉尔和英美双方的参谋长们，举行又一次军事会议。这个会议的暗号叫Quadrant。1943年8月11—24日在魁北克举行比号为“四分仪”的会议，对是否应把在法国北部的登陆作战（“霸王行动”）放在最优先的位置，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但未做出最后的结论。会议一致同意在法国南部发起一次登陆作战（代号为“铁砧行动”，后改称“德拉冈行动”），以策应“霸王行动”。丘吉尔建议组成东南亚最高指挥部，分别任命蒙巴顿和艾森豪威尔担任上述两个地区的最高指挥官。我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无法以任何资格去参加。在8月中，我离开华盛顿到加利福尼亚去了三、四次，参观各地的飞机工厂以及墨洛克干湖的飞机场，研究空军侦察部门中的各项特殊性问题。父亲在没出发以前就曾经和我谈起过这次会议，因此虽不详尽，我却多少知道一些这次会议中的议事内容。在8月下旬，父亲从魁北克回来的时候，我就问起他会议中“大辩论”的经过。

他说：“辩论的阶段看来好像是已经快结束了。英国方面完成了一部横渡海峡的作战计划，马歇尔介绍了这个计划，似乎问题还多得很，可是至少这部计划已经完成了。并且，它已经被双方所赞同。”他颇为忧郁地微笑了一下。“丘吉尔坚持要我们赞同这部计划，至少要我们‘在原则上’赞同。这样，他们可以留一个后退的余地。”

我当时说了几句话，意思是只要他能设法和斯大林也会一次面，那么他至少可以有一个人能帮他向英国方面说明开辟西战场之迫切的需要。

一个多星期以后，这个问题，又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被谈论到。父亲向我表示虽然他对于战争中的军事方面有绝对大的把握，可是政治方面却依然还有很多值得顾虑的问题。关于和平机构的方案在他的脑中已经更进一步地具体化了，为了要商榷这个方案，他更迫切地想会晤其他的世界领导者们。

“所谓‘联合国’……它们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一个阶段，可是它们是在朝这一个方向走，而我们可以推动它们走得更快一点，更远一点。在目前……！”

“怎么啦？我觉得目前的情形并不坏呀……至少我们是在统一的方向之下并肩合作呀。”

他把桌上的一堆文件推向一边（我们是在他的书房内，白宫的三楼；时间已经快近午夜）开始用笔在稿纸本上胡乱地划着。“问题是，”他说，“我们事实上并没有在同一的方向之下前进，除开表面的行动而外。拿蒋介石来讲，他固然有他的许多困难，可是他凭什么理由叫他的军队不打日本人。”

“战争的政治性是实在太浓厚了。在一个国家还没有走上真正的绝路以前，它总是采取一种对它的政治大为有利的方式来推行战争，而不愿尽量迅

速地来结束战争。”

“你是在说谁，爸？中国？还是英国？”

他点了点头。“就是我们与英国的联盟，”他继续说，“也有一种容易使中国与苏联误会我们是在国际政治上完全支持英国方针的危险性。……”他集中精神在纸上划写着：它写的是一个很花的“4”字。“美国将必须领导，”他说，“领导……并且以我们中间人的立场去调解和帮助解决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和与争论；帮助解决中英、中苏在远东方面的争端。我们有力量可以办到这一点，”他继续说，“因为我们现在是个强大而自足的国家。英国是在走向衰落的道路，中国则依然停留在十八世纪之中。苏联怀疑我们，并且也使我们怀疑它。美国是在世界乱局中足以建立和平的唯一的强国。

“这是一个巨大而艰辛的责任。而使我们能够圆满地达成这一个责任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和这些巨头们面对面地谈一下。”

“这一方面的进行有什么结果没有？收到斯大林的回信吗？”

“斯大林有回信来。他说只要我和丘吉尔能够到莫斯科去，他总是欢迎的。”

那时是9月中旬，四巨头会议的希望还是和正月一样的渺茫。

当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父亲的时候，我得设法引他说话。那时他刚吃完早饭，还在床上没有起身。窗外正下着9月的雨，又寒冷，又潮湿；而他的精神也就不如往常那么好。最初他尽量叫我说话，询问关于我的工作情形，似乎对此很感兴趣。他想知道夜间侦察的情况，在西西里的作战中，那些最初的、实验性的夜间侦察飞行完全是我个人所担负，因此，我告诉他我们所发明的侦察纳粹夜间部队行动的新方法。我告诉他我们怎么样使用新式的照明炸弹，以三十秒钟的间隔向地面投下，这些炸弹在飞机与地面之间三分之二的地方爆炸，照耀的面积达一平方英里，使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拍摄敌人移动的照片。最后，我很巧妙地把这个谈话的题目逐渐转移，说我希望战争中的军事行动能够很快地结束，接着就问他战争中的政治前线最近有什么好的进展。

他说：“我前几次和你谈起的会议大概可以有希望实现了，伊利奥。我们已经大致决定把这个会议分两次举行，先和蒋介石会晤，然后与斯大林。这两个人不能见面，因为在西伯利亚国境上正集结着日本的大军，颇有随时准备行动的样子。而另一方面，苏联始终还没有对日本宣战。”

我问他目前是否有办法在一个中间地带会见斯大林。

“我相信并不是不可能的。假如这个会议成为事实……”

“那么？”

“那么，这会议的地点大概不会离你的防地太远吧。”

这就是我最希望知道的。假如父亲的话成为事实，那么我或许又能得到一个机会被派做我父亲的贴身侍从。在这样一个兴奋消息鼓舞之下，向我父亲说“再会”的时候也就并不觉得怎么难受，因为我希望在几个月以内，能够在地中海一带又见到他。

回到我的防地以后，我们立刻计划把我们司令部从突尼斯附近的拉马萨村向前推进至意大利脚部的最南端。在11月中，我们已经在圣塞凡罗建立起我们的基地。一方面突破敌人顽强的防卫，另一方面则诅咒不给我们一个从空中攻击敌人机会的坏天气。意大利被迫退出战争与整个夏天和秋天间纳粹在俄国大草原上所受的打击使敌人的士气大为衰落。可另一方面，盟军的士

气也并不见得怎样高涨。因为在意大利我们的机械化部队的推进已经逐渐地停滞下来，而我们的地面部队则随时随地都面临被纳粹散布在整个意大利山道中的八十八式钢炮正面射击的威胁。

11月气温突然降低，天气也变得很坏。所谓“阳光的意大利”这句名言已经变成了我们谁都不愿意听的大笑话。而我开始想到父亲和我谈起的三巨头或是四巨头会议，不知道他的这个希望怎么样了。而就在这个时期中，我突然从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那里接到一道秘密命令。我必须立刻出发到阿兰去会见一个“重要人物”。那一定是我期待中的会议变成事实了。

11月19日下午，我飞过地中海，到达阿兰，即刻坐着汽车被送到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临时司令部。在那儿我看到我的弟弟小佛兰克林，他是暂时离开他的驱逐舰请事假来的。我差不多有一年没见他了。这一次父亲并没有坐飞机，他是坐那条最新型的大战舰伊奥瓦号来的。当我在阿兰与小佛兰克林舒适地对饮一杯威士忌酒的时候，我想他的战舰大概正驶过直布罗陀的岩岸。

当时还有很多重要将领在我们的周围，除了艾森豪威尔将军，还有英国的海军上将柯银汉、我们的海军中将海威脱、以及双方的一大群陆军准将与海军上校们。此外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善良的迈克，他是在这次旅行中比总统先一步出发到达，以便能警戒和保护总统的安全。我相信即使对他自己的祖母也会带着些怀疑的眼光来打量一番，他永远是那么赤胆忠心地执行保护总统安全这一件重要的职务。

星期六的早上我们就起身很早。那是一个明朗晴丽的早晨，在细雨迷蒙的星期五之后，能够有这样的天气，我们大家都觉得有一种感激的心情。八点半的时候我们已经站在阿兰的海军基地美萨尔凯维的船坞上。从我们的望远镜中，看到有人从伊奥瓦的大船被降落到船旁的小汽艇中。

二十分钟以后，我们看到了我父亲。他向我们挥手，大声地喊了一声“哈罗”，健康而染着海洋色的脸上泛起了微笑。“罗斯福天气！”他叫道。

我们接着都坐进了艾森豪威尔的汽车，父亲、艾森豪威尔将军、小佛兰克林和我四个人，向五十英里外的拉西尼亚机场出发，一路上全是迂回曲折的峻险的山路。这一次海航对我父亲的健康很有益处，他的气色很好。他很兴奋地期待会议日子赶快到来。他对我们说先到开罗，然后再到德黑兰。与蒋会晤之后，他再和斯大林会面。他一肚子都是计划。

“战争以及和平，”他说，他的声调中带着感激的情绪。“你能不能等一等，艾森豪威尔？”

“您请便，总统先生。”

于是佛兰克林和我争着问起他关于家中的情形，关于母亲以及安娜（罗斯福总统之女——编者注）的消息。他告诉我们，他随身带了好些国内的报纸，晚上有空的话，我们可以在一起翻阅一阵了。他的随员中有很多是旧时的熟人，可是也有些新人：除了霍浦金斯之外，华生将军、勃朗海军少将、麦金泰海军中将，李海海军上将也都来参加这次会议。除了偶尔谈到几句我们一路上所见的风景以及家中的情形，父亲只顾谈着行将到来的会议的日子，而无心作其他的谈话。在不知不觉之间，我们似乎很快地就到了拉西尼亚。父亲立刻坐上了他C—54式飞机，奥梯斯·勃拉恩少校这一次又是他的驾驶员。小佛兰克林、霍浦金斯和其他将领与他同机，他们毫不耽搁地立即起飞前往突尼斯。

我自己另外有飞机停在拉西尼亚机场，是一架 B—25 式的夜间摄影侦察机，我们一个中队指挥官里昂·格莱少校陪我同飞。发动的时候，有一只引擎似乎发生了故障，转动得不甚灵活，这可使我们着急了好几分钟，可是最后，在那架总统的飞机起飞了三十分钟以后，我们总算顺利地在空中了。我们开足了引擎追上前去，最后比他们先到达埃尔亚依纳。

艾森豪威尔将军、小佛兰克林和我从那儿又陪着父亲坐汽车出发，向在卡太基为他准备好的别墅奔去（又一次巧合：这个别墅的名字也叫“白宫”）。我们的汽车在路上要经过卡太基古代竞技场的废墟，父亲以前从来没有到过这儿，因此我们不得不在中途停车，领他观光一番这古代的废墟。

父亲的别墅就在突尼斯湾的海岸上，地点与建筑都十分优美，父亲在里面觉得十分宽适。当我们通过卡太基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部队的后方司令部就在附近的拉马萨，我们部队中差不多半数的人员就以那个地方为基地。这实在是一个再好没有的机会，我决不能轻易放过。

“你肯不肯，爸？”

“干什么？”

“去检阅我在拉马萨的部队？”

“当然可以！什么时候去？可不可以在下午迟一点去？五点钟行不行？”

我大声地笑了起来。“我倒希望我能在五点钟之前把一切都准备好，我试一试看。”于是我急急忙忙地赶到我的司令部去，把人员临时召集起来，预备检阅。那个时候，我指挥着西北非摄影侦察混合纵队，全体有六千盟军，其中二千八百人驻在这儿，其余的则在意大利。里昂·格莱，佛兰克邓（我的副指挥）与我匆匆忙忙地尽量把一切整顿得有条有理，而父亲则正在卡太基批阅一批刚从华盛顿送到的文件。

五点半的时候，我们部队整齐地排起队形，看来是相当威风，这我自己也得承认。父亲坐在一辆吉普车上检阅全军。

“看到那些制服没有，爸？我们这儿倒可以开联合国大会了。”

“美国兵，这我当然认得。法国兵，英国兵，加拿大兵……穿那种制服的是哪里方的部队？”

“南非部队，此外还有新西兰与澳洲的部队。”

“倒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队伍，伊利奥，你应该觉得很光荣。”

“别为我操心，我是觉得十分光荣的。”

晚餐可以说是一个宴会。点缀当晚餐桌的有苏末斯贝、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司机，和南茜·盖基、海军上将盖基的女儿，她那时在北非担任红十字会的工作。父亲想第二天一早就离开突尼斯，可是艾森豪威尔将军马上就表示反对。

“星期日晚上夜间飞行要好得多，总统先生。星期一早上就可以到达开罗。”

“夜间飞行？为什么，我特别想在飞行途中看一看从埃尔阿拉美起的战争所经的路线。”

“白昼飞行太冒险了，总统先生。我们不希望一路上都派战斗机保护，这等于自找麻烦。除此而外，夜间飞行还可以平稳得多。”“可是……”

“夜间飞行是 Sop，总统先生。”

“Sop 就是作战上必要的步骤，爸。”我向他解释。

“谢谢你，”父亲很周密地说，“有一些军队的俗语我做总司令的也多少知道一点。”接着，他回过头去对艾森豪威尔说，“好吧。现在你是我的上司。我只好听你的话。可是你另外得答应我一件事作为补偿。”

“什么事，总统先生？”

“假如你要我在卡太基消磨一整个的星期日，那么你必须亲自带我去观察一下卡太基的战场——古代的以及近代的战场。”

“这简直是在讨价还价，总统先生。”

我在拉马萨的工作使我第二天无法陪我父亲去参观那些古今战场，可是小佛兰克林却陪艾森豪威尔将军与我父亲去了，他坐在他们前面，司机旁的座位上。那天晚上回来，他告诉我白天的经历，父亲很严密地把艾森豪威尔将军考验了一下，他不仅问起盟军在梅杰士埃尔巴布以及推勃巴的突破战，并且还考问古代卡太基人所发动的几次战争。艾森豪威尔关于古今每一次战役的详尽与丰富的知识使我父亲感到十二万分的满意。这正表明艾森豪威尔像我父亲一样，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并且有极强的求知欲。小佛兰克林告诉我他们回到别墅门口的时候，父亲满面都是笑容。当艾森豪威尔正要下车的时候，父亲伸出手来把他拉住。

“你知道，艾森豪威尔，我怕我或许要做一件你所不喜欢的事。”

小佛兰克林尖起了他的耳朵。究竟是什么事？罢免他这个战区的指挥权？还是一句反面话，当场晋升他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地位？

“我知道你是十二万分看重哈莱·勃乞的，”父亲说。艾森豪威尔点了点头。“虽然他差不多是你的左右手，可是我恐怕不得不把他从你那儿调走。”

艾森豪威尔的脸上泛起了一丝浅浅的阴影。“那么，总统先生……”

“事情是这样的，埃尔麦·戴维斯又提出了辞呈。假如我调勃乞去做他的后任，你的意见如何？”

“那么，总统先生，我得承认这对我倒是一件难事。可是假如你需要他，假如你说一句话，那么，我答复只有四个字“悉听尊便。”

父亲不响了，据小佛兰克林告诉我，他脸上的神情表露出十二万分的满足。这正是他所喜欢的答复，而这使他不得不对艾森豪威尔有更进一步的好感，尤其是他知道这位将军是怎么样不愿意放走勃乞。

“我想再考虑一下，或许这种调动是不必要的，我决定了再通告你。假如你对勃乞谈起这件事，你可以对他说，他是足以继承戴维斯的工作的唯一最理想的人物。总之，这件事要到正月才能有最后的决定。”

我敢确定勃乞肯定感到万分高兴，当他在两个月以后听到了当局决定挽留戴维斯的消息的时候。

那天晚上晚饭以前，我回到父亲别墅的时候，他正在滔滔不绝地谈着。他痛骂那些故意使美国不能倾其全力来推行战争的美国议员们。那天晚上在华盛顿，我相信一定有好几对耳朵被烧红了，这些人中当然包含着范登堡、泰夫脱、奥但尼尔以及哈姆、菲许。他谈话的另一个题目则是关于他当天白昼旅行。他看见移动中的阿拉伯人和骆驼商队；他看见遗弃在不久前的战场上的许多烧毁了的坦克与卡车；他看见那有名的六〇九山岗。在那块平凡的小丘上，我们很多的士兵倒下来，战死在那儿。

当晚一起吃晚饭的有严峻而沉默的海军上将李海、父亲的陆海军武官华生与勃朗、海军提督麦金泰、小佛兰克林和我。小佛兰克林和我都知道我们是无法陪父亲一同到开罗去的，小佛兰克林的假期已满，必须立刻赶回到他

的舰上去，而我则在拉马萨还有许多未了的公事。可是我们依然坐了车到埃尔阿奥纳去送我父亲和他的随员们出发。霍浦金斯已经在机场等我的父亲，飞机上已经为他和我父亲特别订了两个座位。

在飞机起飞之前，父亲又和小佛兰克林开始了星期六那天的辩论，为什么小佛兰克林不肯和他一起到开罗去？可是我的弟弟只是微笑着，向父亲挥手说了声“再见”，目送那架巨大的C—54式飞机离地起飞。在我们回到卡太基的途中，佛兰克林告诉我那场辩论的经过，他的驱逐舰——梅朗号，在派莱莫被炸伤了。几架德国的轰炸机居然炸中了那条驱逐舰，两颗炸弹就掉在驱逐舰的左旁，一颗炸弹掉在舰上。现在梅朗号预备在两三天内开出直布罗陀海峡，经历一段漫长而危险的航程回到美国边岸的船坞去修理。而小佛兰克林绝不愿意接受任何建议，使他作为一个舰上的执行官，无法亲自参加那一次对舰上的其他船员有很大的危险的海航。

我在后方司令部的工作在一天一夜之间就处理完毕。星期二的晚上我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报到，就坐着他的飞机向东飞向开罗。飞机上，除我而外，还有艾森豪威尔将军，他的六七位参谋，以及我的妹夫约翰·鲍梯格少校。鲍梯格少校本来被派在意大利盟国军事政府中工作，这次他是专门请假来的。我们的那架C—54飞机在天黑以后离开突尼斯，黎明时候到达埃及国境，清晨，我们的飞机已经围着开罗的空运总部的机场绕圈子，预备降落。

立刻就要开始我第三次的战时会议了。

第六章蒋介石的军队不打日本人

在美国人眼里，金字塔也充满诱惑 罗斯福：我见到了蒋委员长

蒋介石把精锐屯在西北

中缅印战区才是被遗忘的地区

丘吉尔不喜欢马歇尔：他太有耐心、太有礼貌而且太坚定

艾森豪威尔希望得到一枚美德勋章 罗斯福、丘吉尔不出席蒋介石的

酒会

宋美龄太像一位老练的演员，她有独特的第二性格

罗斯福也忌讳“13”这个数字

史迪威是个高大坚韧的军人

英国人不赞成“越岛战术”

马歇尔——预定的欧洲战区盟军总司令 1943 年，各条反法西斯战线捷报频传，尤其是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使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实现了根本的转折。在历时 200 多天的整个战役中，法西斯军队在顿河、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总损失，大约是 150 万人，3500 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2 万门大炮和迫击炮，3000 架飞机和大量的其他技术兵器。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最终粉碎和制止了德军在苏德战场上的战略攻势，迫使它转入战略防御和退却。苏军夺取了战略主动权，开始了战略反攻，希特勒的军队已被赶出了顿巴斯和左岸的乌克兰。1943 年从 11 月 6 日，红军解放了基辅。苏联战场的胜利，有力地鼓舞了苏联军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斯大林格勒战役刚刚结束，罗斯福就致电斯大林，热烈祝贺苏联红军取得的这一伟大的胜利。电报说：

“你统率下的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武装部队的统帅，我谨向您祝贺。为保卫这座已使大名永垂不朽的城市而进行的 200 天史诗般的战役，以及全体美国人都在为之诚实的决定性胜利，在这场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纳粹及其同伙的战争中，将永远保持为最光辉篇章之一。

“你们在前线作战的部队指挥官和战士，以及在工厂和田野支援他们的男男女女，通过共同努力，不仅增添了自己祖国部队的荣誉，而且以自己的榜样激发了一切联合国重新下定决心：竭尽全力彻底打败共同敌人，迫使他们无条件投降。”

在非洲，在地中海地区，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已经完成了对最后几股轴心国家军队的包围；非洲敌军被迫投降，仅突尼斯一役，敌人就损失 30 万人。“火炬”战役胜利结束后，美英远征军正向意大利本土进军。7 月 25 日，当巴顿的新七军和蒙哥马利的老八军席卷西西里时，墨索里尼终于遭废黜，巴多格里奥元帅在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领导下，出来接管了意大利政府。罗斯福兴奋地向美国人民宣告：“轴心上已裂开第一道口子。”“但是，”总统补充说，“我们对意大利提出的条件仍旧跟对德国和日本一样：无条件投降。”1943 年 9 月 8 日，在艾森豪威尔军队的强大攻势压力下，意大利政府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太平洋战场，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也正在把两支进攻的箭头一步步地向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逼进。美军继在瓜达卡内纳尔取胜之后，又于 3 月 8 日击毙珍珠港事件的罪魁祸首、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美国

太平洋舰队正向所罗门群岛一带进逼。

为促进胜利形势的发展，研讨盟国协同作战问题，盟国决定召开开罗会议。在开罗会议之前为了加强主要同盟国之间的了解和联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并为召开首脑会议事先作好安排，苏美英三国政府商定先举行外长会议。

1943年10月19至30日，苏美英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三国代表团的领导人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美国国务卿赫尔，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此外，三国的一些高级军事参谋人员也参加了会议。据艾登回忆：“三国政府同意了议程，每一个主角都有一个他认为特别重要的题目。俄国人所关心的是1944年春天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最合乎赫尔心意的题目是关于战争目标的四国宣言和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我的目的是就建立盟国可以磋商与战争有关的机构达成协议，因为这些问题正纷纷找上门来。所有这些主要目的都一一得到实现。”

三国外长会议公报指明：“加速战争的结束是首要的目的”。

会议决定在伦敦成立欧洲咨询委员会，以研究战后的合作问题。

莫斯科外长会议还通过了四项宣言：

一、“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由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作为四大同盟国之一的国际地位受到普遍重视。据赫尔回忆，关于中国参加四国宣言的事他曾同莫洛托夫商量过。赫尔说：“美国政府就中国局势做了并正在做一切可做的事情。在我看来，不能把中国从四国宣言中删去。我的政府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对中国来说，现在如果俄罗斯、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到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莫洛托夫表示承认赫尔说得有道理。于是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受权与三国外长一起在“四国宣言”上签了字，所以成为四国宣言。这个宣言的全文是：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联合国政府、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共同遵照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以及以后历次宣言，一致决心对它们现正与之分别作战的轴心国继续采取敌对军事行动，直至各轴心国在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放下武器为止；负有使它们自己和同它们结成同盟的各国人民从侵略威胁下获得解放的责任；认为必须保证迅速而有秩序地从战争过渡到和平，并建立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全世界用于军备的人力与资源缩减到最低限度，特联合宣告：

（一）它们用以对其各自敌人进行战争的联合行动将为建立和维护和平与安全而继续下去；

（二）它们中与共同敌人作战的那些国家，对于有关该敌人的投降和解除武装等一切事项将采取共同行动；

（三）它们将采取它们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以防止对敌人提出的条件遭到任何破坏；

（四）它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这些国家不论其大小，均可加入为成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五）为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在重建法律与秩序和创立普遍安全制度以前，它们将彼此协商，必要时并将与联合国家的其他成员国进行协商，

以便代表一个国际共同体采取共同行动；

（六）战争结束后，除了经过共同协商和为实现本宣言所预期原目标以外，它们将不在别国领土上使用其军队；

（七）它们将彼此，并与联合国家的其他成员国协商和合作，以便对战后时期控制军备达成一个实际可行的全面协议。

维·莫洛托夫
科德尔·赫尔
安东尼·艾登
傅秉常

莫斯科，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

十分明显，四国宣言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它为战后和平缔造奠定了基础，并为后来的联合国工作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

二、“关于意大利的宣言”。宣言确定，同盟国对意大利的政策应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和建立民主制度，但并不限制意大利人民以后选择自己政体的权利。

三、“关于奥地利的宣言”。宣言载称，奥地利应从德国统治下获得解放，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

四、“关于希特勒分子对于其所犯暴行的责任的宣言。”宣言载明希特勒罪犯将在其犯罪地点由各国人民加以审判。由于这项宣言关系重大，它是由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后发表的（11月2日）。

10月30日，外长会议结束。当晚，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特琳娜大厅举行宴会，招待美英代表们。赫尔坐在斯大林的右边。席间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据赫尔回忆，斯大林清楚而明确地对他说：“……在同盟国打败德国以后，苏联那里将参加对日本的战争。……”

他最后说，我可以极其秘密地把这话告诉罗斯福总统。我衷心地感谢了他。”

莫斯科外长会议不久，于1943年11月22日至11月26日，12月2日至7日，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分两段举行美、英中三国会议。罗斯福的本意是召开有斯大林参加的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会议。可是斯大林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因为苏联对太平洋战争持“中立”态度，他不愿参加讨论对日作战的国际会议。因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决定把一个会分成两个来举行：中国人参加、苏联人不参加的开罗会议，然后是苏联人参加、中国人不参加的德黑兰会议。两次会议都是在盟国的胜利已成必然的情况下召开的。开罗会议举行前，罗斯福曾经踌躇满志地对儿子埃利奥特透露他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他说：“美国将不得不出面领导，领导并运用我们的斡旋进行调解。帮助解决其他国家之间必将产生的分歧：俄国和英国在欧洲，英国与中国、中国与俄国在远东。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大国，是强国，而且我们不妄求。英国大走下坡路，中国仍在18世纪状态中，俄国猜疑我们，而且使得我们也猜疑它。美国是能在世界中缔造和平的唯一大国。这是一项巨大的职责，我们实现它的唯一办法是面对面地与这样的人会谈。”

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满怀热情，丘吉尔半心半意，蒋介石则是抱着讨

价还价的目的要求罗斯福增加军援。整个会议是关于远东战略问题的辩论。罗斯福、马歇尔、史迪威极力主张把日本驱逐出缅甸，保证中国陆上国际交通线，加强中国军队力量，作为最终打败日本陆上主力的重要战场。丘吉尔否定缅甸有重要战略价值，更不希望由中国人和美国人收复缅甸。他认为打败日本靠海上力量就够了。但是他和蒋介石不便过于反对罗斯福的意见，因此有条件地同意进行缅甸战役。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还同蒋介石秘密讨论了远东战后统治安排问题。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在国际保证下，使大连成为苏联可以使用的自由港。根据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向斯大林作出的暗示，蒋介石同意了这一安排。

罗斯福总统认为，要中国继续作战来牵制日本部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机场对轰炸日本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罗斯福一再试图说服蒋介石改组他的腐败政府，结果毫无成效；但是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继续支持这位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原中国的独裁者。当时美国统治集团永远不会允许他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游击队。罗斯福召回了在中国的美国军事指挥官史迪威将军，满足了蒋介石对金钱的没完没了的要求，并试图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来对待，以便提高蒋介石的斗志。这些办法都失败了，只是实现了一个最紧迫的目标：中国仍在作战。

开罗会议最主要的成果是美英中三国联合发表的《开罗宣言》。它宣布：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谋求利益，也无意于扩张领土。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此外，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我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开罗宣言”是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重要法律依据。

小罗斯福，对开罗会议的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像在卡萨布兰卡的布置一样，迈克在会议地点四周都装上了铁丝网。大部分参加会议的人都住在曼纳大厦。从大厦的外表看来，这一定是一个中期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师所设计的。父亲住在我们柯克大使的别墅里。比我父亲早到一晚的丘吉尔和蒋氏夫妇也分别住在附近的别墅中。我猜想在开罗会议期间，迈克并没有因为周围的严密的铁丝网而减轻他的担忧。他认为开罗城里不知有多少人被政治狂热病所驱使，很可能企图暗杀居住在曼纳附近的那些大人物之中的任何一个，或甚至全部。

在柯克大使的别墅的门口，我跳下军车，赶忙走进去给我父亲说早安。那时还没到十点半，他正在床上一个人吃早餐。他精神很好，似乎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我问他这两天来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事情？很多，很多。”

“是些什么事呢？”

“啊——我见到了蒋委员长，出外看了一下金字塔，接到一封斯大林的电报……”

“电报里说什么？”

“说他准备定在28日到达德黑兰，那就是下星期日。”

“那么这个会议是确定的了。”

“大概是确定了吧。”他又了个鸡蛋送进他的口中，向我挤了挤眼。

“你对蒋委员长的印象如何？”

他耸了耸肩。“我想他与我所想像的差不多。他和蒋夫人昨晚在这儿吃晚饭，到十一点左右才走。他知道他需要些什么东西，而同时他也知道不能得到他所需要的全部。可是我们多少总可以想个办法出来的。”他推开他的早餐盘。“扶我一下，伊利奥。”他坐到床边，开始穿起衣服来。一面穿着衣服，一面和我继续谈话，而我则趁这个时候，从盘里偷了些土司碎末，塞在嘴里，又为我自己斟了杯咖啡。“到现在一共开了两次全体会议。全部参谋长都参加了。可是在那些会议中……我猜想他们是太公式化了。在中国，在缅甸，在印度的事态真相始终不曾在会议中吐露出来。从昨晚和蒋氏夫妇的谈话中，我倒知道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远胜过那四小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

“你知道了些什么呢？”

“关于那陷入停滞状态的战争，以及为什么蒋介石的军队不打日本人但他们还是在报纸上登载许多战事的消息。他说他的部队没有训练，没有装备，这一点我倒很容易相信他。可是却不能解释他为什么极力阻挡史迪威将军训练中国军队。也不能解释他为什么把大部最精锐的军队屯在西北——红色中国的边境上。”父亲的贴身侍役亚瑟·泼利梯曼走进门来，拿走床边的早餐盘，又回来帮我父亲穿衣服。

父亲继续他的谈话。他谈到给养的困难，以及英国方面始终反对建筑雷多公路的计划……谈到英国方面不愿意通过缅甸的丛林采取任何攻势……谈到与越过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运输相关联的许多问题，以及那些特别合乎逻辑的工作的悲剧性代价与牺牲。我曾经和好多熟悉中国、缅甸、印度战场的空运总部的飞行员们谈过话，知道他们都有一肚子的牢骚，而我照实地把这种情形告诉了父亲。父亲一面听着，一面不断地点头。

“派到那边去工作倒真是件苦事，”他说。“我曾听大家说太平洋战区是个被忘掉了的战区。可是与中缅印战区相比，太平洋战区真不知要好多少。我绝不羡慕派到那儿工作的任何一个人，从史迪威起直到最末的一个士兵，他们得尽他们的能力来扩展那儿的战争。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的给养却等于零。我们绝不能怪他们，说他们藐视目前的主要战争在欧洲，而当欧洲的战争一旦结束，我们即刻把重心转移到日本与菲律宾方面的这一个事实。战争的重心永远不会转到他们那个方面去，可是我们却怎么能责难他们对这一个方向的努力呢？”

“前晚在参谋长会议中我见到史迪威，我叫他为我留出些时间来，让我可以和他二人私下谈一谈。要是没有他，我真不敢想像中国局势的发展会变得怎么样。”

“事实上，在中国的工作只有一个要点：我们必须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以牵制日本的军队。”

我问起英国方面在中缅印战区的动向。“我想只要蒙巴顿到那儿去了以后，一定会开始什么大规模的举动。”

父亲微笑了一下说：“我相信蒙巴顿自己也是那么想，”“他目前迫切地想获得足够的登陆艇，预备从水陆两方面来攻击安达曼群岛。”

“安达曼群岛在哪儿？”

“听丘吉尔那种说法，你会以为安达曼一定是他所宠爱的巴尔干半岛这一边的战略上最重要的地点。可是，安达曼却在孟加拉湾，缅甸南部的海中。他们认为可以从安达曼群岛攻击仰光。”

“我认为一切能使用的登陆艇现在都被保留起来预备在明年春天开辟第二战场时使用的。”

“不知道你信不信，伊利奥，关于那个西战场，英国方面现在又表示怀疑，提出了许许多多新的问题。”

“关于 OVERLORD 这个作战计划？可是我以为这个问题在魁北克会议中早就有了最后的决定！”

“我们全都这么想，事实上也是如此，那是早就决定了的。可是丘吉尔不断地向每个人表明他的怀疑。”

“他说明什么理由没有？”

“他还是始终不肯放弃他通过巴尔干实施攻击的那个观念。‘与苏联的共同战线’，诸如此类的主张。马歇尔将军是……非常耐心，非常有礼貌，非常坚定。我相信丘吉尔已经开始不十分欢迎马歇尔了。他发现不论他采取何种方法，哄骗也好，讲理也好，发脾气也好，马歇尔还是始终坚持他的正面给希特勒一拳的战术。”

“和丘吉尔面对面办交涉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使，谁去办都行，我是绝不羡慕的。”

“可是我却可以告诉你一个人，有一个人却有办法和他相处得很好，而凭这一点他真该得一个勋章。这个人就是艾森豪威尔。”父亲说。

“喂！”我叫道。“这使我想起了的一件事！”

“什么事？快讲，因为我在十一点钟要去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有五分钟我就得走了。”父亲说。

“你是不是当真要给艾森豪威尔一个勋章？”

“当然是呀。可是他却不肯接受。当我颁发给麦克阿瑟荣誉勋章的时候，我也给了他一个同样的勋章，可是他却把勋章退回来了。他说这个勋章是发给英勇的人们的，而他并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英勇的事。”

我说：“一个多月以前，我和比台尔·史密斯谈起这个问题。他说有一个勋章艾森豪威尔很想能够得到。这勋章就是美德勋章。他说有一次艾森豪威尔告诉他这是他所希望获得而始终没有得到的唯一的勋章。史密斯说，他之所以喜欢这个勋章是因为这是一个任何人都资格获得的勋章，即使是一个很好的伙夫也可以得到它。可是艾森豪威尔却始终没有得到过。”

父亲想了一下，微笑着说道：“你能不能为我保守这个秘密？”

“为什么不可以呢。”

“好极了。假如你能马上拍一个电报给史密斯，叫他草拟一道奖状，关于北非战役，西西里战役等等。假如他能够在我们的出发到德黑兰之前得到这个勋章，我将亲自为他佩带在军服上。”

“我马上就去办。”我说。

父亲去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时候，我跑上楼去，走进预先为我准备好的房间里，漱洗了一下，就开始享受一顿地道的早餐。早餐是在柯克大使别墅的屋顶平台上吃的，那是一个环境优美，阳光极好的地方，可以清晰地看到远处的金字塔。这里的奢侈使我想到了开罗的情形将与卡萨布兰卡大不相同。海军当局为了这次会议专门派来了八个头等厨子，他们都有高超的本事，

能够把军粮烹饪成精美的盛宴，并且对于每个人的招待都非常周到。因此，这一次我就无须再留心为每一个想喝酒的访问者斟酒了。同时，我虽然依旧是我父亲的贴身侍从，我可以不必每一秒钟都在场听候使唤，或是参加每一个约会了。我可以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时间，有时候甚至可以离开别墅，到别的地方去观光一下。

有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一个人坐在平台上，在完全休息与松弛的状态中，懒懒地眺望着远处的金字塔。让自己的思想漫游在回忆与遐想之中。我相信任何人在这种环境中都有同样的回忆。流动与不朽的时间，疾扫过这些坟墓的战争，来来去去的将军们，埃及的国王们，罗马的帝王们，大元帅们以及带兵的将领们。

父亲的医药顾问麦金斯提督突然地跑来，扰乱了我喝最后一杯咖啡时的白日梦。他对于我父亲飞行到德黑兰的计划，颇为担忧。

“在这样明朗的阳光下有什么可以担忧的，麦克？”

“我不是和你说着玩的，伊利奥。我认为他只应该飞行到巴士拉，然后从那儿转乘火车。伊朗的那些山高得很，飞机必须飞得很高。而在那种高度……”

“飞过几座高山恐怕总是免不了的吧。”

“即使如此……你今天是不是和他一起吃午饭？”

“我想大概是吧。”

“他是听你的话的。你能不能告诉他你认为他后半部旅程中必须坐火车。这是正经事，别以为我是在说着玩的。”

“你和他的飞行师勃拉恩少校谈起这件事没有？”

“没有。”

“为什么不叫我去和他商量呢？叫他小心不要捡太高的山峰飞。父亲究竟能飞多高才不致于有什么危险？”

“决不能超过七千五百，这是最高的限度。”

“好吧，我会告诉勃拉恩的。他为父亲驾驶过好多次飞机，因此他懂得怎么样对付这一类的问题的。你可以不必担心，麦克，我会好好地照顾他的。”

楼下的会议到下午一时才结束。我跑下楼去和丘吉尔与霍浦金斯寒暄一番，并且看一看自从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后就不曾再会过面的其他的人们——马歇尔将军、安诺德将军、金海军上将、苏未维尔将军、以及英国方面的参谋长们。进去吃午饭以前，我抓住一个机会和父亲谈了几句话。我问他关于OVERLORD作战计划有什么新发展。

他微笑着说：“很困难，至少英国方面的见解是如此。但是，在魁北克所草拟的计划还依然是目前的计划。”他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他们提议把它转变为一个小规模攻击，或许以挪威为攻击的对象，而把战事的重心依旧放在地中海方面。可是这新的计划还没有决定。”他向马歇尔所站的地方点了点头，以颇有意义的眼光朝那个方向望了一下。他说：“马歇尔将军，依然是会议席上的宾相。在他的心目中，目前所应该讨论的问题只有一个：谁来指挥我们从西方发动的进攻？”

霍浦金斯与鲍梯格这时候从另外一堆人群中走了过来，父亲和他们一起走出屋子，到花园中去坐着等候午餐时刻到来。吃午饭的时候，大家很少谈到公事。霍浦金斯提醒父亲说当天下午蒋氏夫妇举行一个鸡尾酒会，问他去不去。

“对了。我是恐怕没办法去的。伊利奥……你代表我去吧，怎么样？”

“蒋氏夫妇的鸡尾酒会？我当然愿意去的，假如你不需要我做什么别的事。”

父亲说：“今天下午，除了几个礼节性访问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事。客人来的时候你在外面先好好地招呼一下他们，到约定的时刻你再把他们引进来。四点半左右你就可以离开，坐汽车到蒋氏夫妇的别墅去。”

“去了我怎么讲呢？”

“关于我不出席吗？你可以说五点钟的时候我要接见劳伦斯·斯坦因哈脱。”

斯坦因哈脱那时候是我们的驻土耳其大使，当我们在开罗的时候，外边正流传着很多关于土耳其加入盟国作战的谣言。我问父亲关于这件事我们是否已经有了什么决定。

“双方并无什么最后的决定，可是我自己的主意却打定了。”父亲说。

霍浦金斯在旁边微笑着。你可以看出他们在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一定有其他的第三方面对我们的最后决定表示不同意。我不难猜到这第三方面一定就是丘吉尔。

“你关于土耳其问题的决定在这儿是不是一个机密，爸？”

他笑了起来，说：“我恐怕对每个人都谈到过这个问题了，土耳其参战的条件是要我们给它租借大批物资来配备军队。它要这些物资干什么呢？想因此可以在战后成为一个强国？丘吉尔认为我们应该给土耳其它所需要的物资，使它可以即刻参加战争。为什么呢？他明知道租借物资分配给土耳其以后，分配给我们进攻西欧的物资将因此减少，我真不懂为什么他还要那么主张？”

“说不定土耳其加入到我们这边来会增强他从地中海攻打希特勒的论调。”

“这也很难说。”父亲带着讥嘲的口吻说。

午饭以后，父亲所说的“礼节性的访问”开始了，柯克大使的别墅顿时变得像纽约的中央火车站那样热闹。我在前厅招待来客，领他们走进起居间，拿出香烟来招待他们，和他们应酬一阵，然后在约定的时刻，得到里面的暗示，把他们带到花园里父亲的跟前。有时候霍浦金斯在一旁陪着，有的时候是我，或是父亲的陆军武官华生。从二点十五分到四点半之间，来访的客人，按照先后到达的次序来算，一共有：亚漠·默罕摩特，哈赛奈恩爵士，埃及的皇室元老；墨斯达发·纳哈斯，埃及的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他代表埃及的国王发洛克一世向我父亲致歉意，说国王因为不久前乘车失事受伤，未能亲来拜访）；希腊的国王乔治（父亲对他的评语是：“蛮漂亮的人物，可是头脑却是空洞洞的”）；埃迈虞限·曹台洛，当时希腊流亡政府的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希伦爵士，英国驻埃及大使；南斯拉夫的国王彼得（我问父亲他对彼得的印象如何，因为彼得显然已经请求美国给予直接的援助以挽回他行将失去的王位。父亲对于我的发问，觉得有些惊讶，他似乎想不到居然会有人对彼得的意见当真发生兴趣。“人家该怎么想呢？他还是个小孩子。如果说他有什么意见，那全是旁人给他想出来的。”）；波利基，当时南斯拉夫的总理兼外务大臣；亨利·梅脱兰·威尔逊将军，驻中东英军总司令与劳逸斯将军，中东的美军总司令；空军上将道格拉斯，中东英国皇家空军总司令；亚尔格农·威立斯海军元帅，驻莱望脱的英国海军司令；以及史东将军，

驻埃及英军总司令。

当来客比较稀少的时候，我找了个和霍浦金斯谈几句活的机会。

“我看父亲和丘吉尔之间好像又有些什么纠纷。”我说。

霍浦金斯耸了耸肩，“这一次有一点不同，”他说。“事实上，可以说有两点不同。第一，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大量地生产坦克、船舶、大炮。这是与上次不同的地方，今后的战争大部分都要使用美国制造的装备，美国出生的士兵。而这一点也是与上次不同的。”

“你说得很对。”

“谁应该来主宰这一次会议呢？”他带着思索的神情对我看了一会儿。

“可是，同时丘吉尔知道这一次会议是在大英帝国的土地上举行的。这就使事态又有些细微的不同了。此外，这一次会议中所讨论的议事又与前几次完全相异。这一次会议的中心是远东与中东的局势，讨论的一切人物与问题对于美国人，甚至是你的父亲，都是比较陌生而不熟悉的。丘吉尔与艾登，他们从初级学校时代起就开始埋头研究中东与远东问题了，他们对于这些问题可以说是老门槛了。这两个地区形成了他们帝国的核心。”

“那么，现在究竟是谁在主宰这个会议呢？”

“这你可以不必担心，”霍浦金斯安慰我。“你父亲还始终居于领导的地位，不过他还需要一点时间。他小心地看，仔细地听，他是在学习，可是他始终是大老板。”

我在四点半钟的时候离开了作为向导的岗位而出去担任一件新的任务：代表父亲出席蒋氏夫妇的鸡尾酒会。他们的别墅离我们的住所约一二里远，当我走进门的时候，我发现丘吉尔的女儿撒拉正和我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可是我没有机会和她谈话；蒋夫人走到我的身旁，毫不停留地把我带到两张并排放着的椅子上坐下。我觉得她像一位颇为老练的演员。差不多有半小时之久，她生动地、有风趣地、热心地谈着，而且老是设法把我作为我们谈话的中心。这种恭维与魅惑的功夫之熟练到家是多少年我难得碰到的。她谈到她的国家，可是所谈的范围只是限于劝我在战后移居到那儿去。她问我是否对畜牧农场发生兴趣，那么中国的西北对我简直是最理想的地方了。她为我描画出一个有能力、有决心的人从中国苦力的劳作中聚积财富的金色的画面以后，把身子靠向前来，把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膝盖上，闪耀着光彩的眼睛凝视着我，同意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在最初的几分钟内，我极力地对自己说：这位夫人只是对我们之间的谈话感到浓厚的兴趣，而在她的心中绝无其他任何动机。可是在她的神态之中却有一种与绝对的真挚不相融洽的生硬的欢愉光彩。我绝对不曾相信我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以致她认为必须将我征服，使我很快地变成她的好友，为了将来任何其他的目的。不过我却相信蒋夫人多少年来始终是以一种征服人的魅惑与假装对她的谈话对方发生兴趣的方式来应付人们，尤其是男人，也许现在这已经变成了她的第二性格。而我怕看她的第一性格发作，说实话，那会吓坏了我。

当她离开我去招呼其他客人时，我赶忙为我自己斟了一大杯酒，一口气喝了个干净。于是我便在四周走动了一下，和我所认识的人随便谈谈。屋子里挤满了许多高级的将领，除了我父亲与丘吉尔以外，三国代表团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来了，空气中震荡着谈话的声音。我得到了一个机会被介绍去见蒋委员长，他不会说英文，我们通过了一个翻译交换了三四句随便而客气的寒暄话。一个多钟头以后，我告辞出来，回到了父亲的别墅。我回去的时候他

还在和斯坦因哈脱在谈话，乔治·亚伦也在，他是我们国务院中的远东问题专家。当他们快要谈完的时候，我参加了进去。

“今天的鸡尾酒会怎样？”父亲问我。

“不坏，”我回答。斯坦因哈脱和亚伦又坐了一会儿，和父亲约定他从德黑兰回到开罗后第二次会面的时间，并且讨论到由于父亲对土耳其参战的态度，他们是否应该把土耳其总统，伊斯梅脱·依诺奴，带到开罗来见一下父亲。他们走了以后，我问父亲：

“我猜想他们的意见与你相同，认为土耳其不该在这个时候参战。”

他点了点头，接着就回到那个鸡尾酒会的话题上去。他想知道我对蒋氏夫妇的印象，我特别告诉他我对蒋夫人的看法。他皱着眉头，带着思索的神情听我讲完，然后批评说：

“我不知道我会有像你那样激烈的看法的。毫无问题她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而我决不想在她的国内使人知道我是她的一个敌人。可是目前在中国有谁能替代蒋的地位呢？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领袖。蒋氏夫妇固然有很多短处，可是我们却不得不依靠他们。”

我告诉他在方才的鸡尾酒会中我碰到劳逸斯将军，他约我今晚吃晚饭，饭后在开罗玩一夜。我请求他的许可。

“今晚上反正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只有霍浦金斯、李海、华生和麦克在这里，不记得谁提议打纸牌玩。你去你的好了。痛快地玩一玩。”

因此，那天晚上我和劳逸斯将军以及其他几位到一家开罗的夜总会玩去。当我在十二点钟以后回到父亲别墅的时候，他的客人们正在起身告辞。我陪他一起到他的卧室，他想知道我是怎么样消磨一晚上的，而我则急于想知道他是否已经听到关于当天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讨论经过。白天我每次经过曼纳大厦的时候，我都看到许多高级将领们在阳台上晒日光，显然他们是在继续他们的会议而同时则设法想得到一些空气与阳光。

父亲说根据李海的报告，会议略有进展，可是却还没有什么最后的决定。英国的代表还是以相当坚决的态度（父亲认为这是起源于丘吉尔的）指责这部在夏天草成、在秋天修正过的 OVER-LORD 作战计划中真实的与幻想的弱点。美国的代表则以更坚决的态度（我认为这是起源于父亲与马歇尔将军）坚持这一聪明的作战计划，而反对在挪威或是地中海的小规模战斗。

“我猜，”父亲说，“马歇尔和金氏看到这部两次被双方同意的计划又被从头讨论过，一定感到很灰心，而我得承认，我能够了解他们的这种心情。”

显然，中国、缅甸、印度战区中的英美将领们之间的摩擦多少增强了一些英国方面反对西欧作战计划的顽固态度。摩擦的原因是英国方面始终认为中国的军队是无法组织成任何战斗机构的，这正和史迪威未经证实的努力相反，同时，英国在缅甸的战术是“慢打、小打”，而我们的战术则是“快打，大打”。我对我父亲说：假如我们考虑到英国帝国的责任，则他们这种军事方面的战略多少是有些道理的。

“当然是有道理的，可是他们的帝国观念虽不能说是十七世纪，或是十八世纪的，至多也不过是十九世纪的吧。而我们的战争则是二十世纪的战争。多谢上帝的保佑，战争的局势总算多少有些好转。现在已经不再是我们求生存战争了。可是毕竟是险得很，差一点我们就会失败的。战争之所以如此艰难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的不朽的帝国这一个观念”。父亲说。

“我告诉丘吉尔我们对付菲律宾的例子，我们怎么样坚持着推广教育的

初步计划，我们怎样努力把统治菲律宾的责任从我们的肩上转移到他们自己的身上……”

“丘吉尔怎么说呢？”我问。

“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菲律宾人是一个不同的种族，他们的天性比较富于独立自主的自信心，并且能够担负重大的责任。他说我们不理解印度人、缅甸人、或是爪哇人……甚至中国人！”

父亲那晚并不像平时那样紧张。第二天并不是一个十分忙碌的日子，因此他觉得很闲散，想多谈谈。我们各人又点上了一支香烟，散漫地随便聊天。我们猜测德黑兰会议的情形与可能的成果，我们猜测斯老伯伯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当我们两个单独谈话的时候，他老是称呼斯大林为斯老伯伯的）

“有一点我是有把握的，”他微笑着说，“关于我们从西方进攻欧洲的主张，我可以得到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其实，在明年春天，假如苏联方面的战事还是像现在那么神速而顺利，说不定根本就没有开辟第二战场的必要了！”那时候红军在神速地越过平原，逐渐接近波兰的国境，最初还差一百哩，后来是六十哩，而现在只剩下五十哩了。基辅已经被攻克。我们都觉得很高兴，我们似乎已经看到战争的结束。我对我父亲提起他上次关于德国将于十二个月内战败的预言，并且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这预言似乎并不是不可能兑现的。

“不一定十二个月，伊利奥，最多十三个月就够了，”他说。接着，他赶忙说，“我还是说十四个月吧，我不要十三个月。”

“可是也说不定会是十三个月呀。”

“不，要不是十二个月，就是十四个月，好像是华盛顿广场的母亲的公寓大厦，你还记得吗？那座大厦是没有十三楼的，十二楼上面就是十四楼。”

“已经打过十二点了，是不是？现在可以算是星期四了。我祝你过一个快乐的感恩节。”“对了，今年的确有好多事是值得我们感谢的。”

一点半的时候，我把一本侦探小说放在他的床头，离开他回到自己的卧室。

第二天早晨，霍浦金斯与贾德干来看我父亲。他们走了以后，父亲批阅了一小时由外交邮包从华盛顿送来的信件。中午的时候，丘吉尔和蒋氏夫妇来了，带着他们陆海军参谋部的将领，于是大伙儿都到外边花园里去摄影。午餐的时候，大家又讨论给养的问题，蓝得士爵士与魏纳脱大使和我们的道格拉斯与陆次麦克洛埃交换着关于这一方面的意见。当我们离开餐桌的时候，我接到了勃拉恩少校到达的消息。前几天我们请他和迈克一同坐飞机到德黑兰去看看，再回来告诉我们那儿的山岗是否高得使我们非接受麦金泰的建议不可。当勃拉恩少校看到我的时候，他举起他的大拇指与食指，形成一个表示赞可的圆圈。“完全OK”。他报告说。“假如气候不太恶劣，我们可以很舒服地飞行，最高的高度也决不会到七千。”

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又兴奋，又欢喜。他绝不愿意乘火车在炎热的天气中迟缓地完成他后半段旅程。

当天下午，在别墅宽大丰富的厨房中，大家正在忙着筹备一个盛大的感恩节的宴会。可是蒋氏夫妇却有事，无法来参加这个盛会。不过蒋委员长和他的夫人在下午来和我父亲一起喝茶，我们四个人坐在花园里的树荫下。大部分是蒋夫人一个人在说话，她很动听地谈说她预备在战后扫除中国文盲的计划，利用一种新的“基本中文”的文体，将中国文字减少到和我们的“基

本英语”中所用的字数差不多的程度，一千二百字到一千五百字之间。她同时还讲到其他的将来改革中国的计划。父亲一向对中国人民有崇高的敬意，并且对他们的问题以及开发他们资源的可能性有很浓厚的兴趣，所以在蒋夫人滔滔不绝地谈话的时候，他很热心地听着。想到昨天他所说的中国目前没有其他足以使中国继续抗战的领袖，我怀疑他是不是也在考虑蒋夫人所描绘的这些改革似乎不一定要等待旁人来替代蒋氏以后才能推行。

他们走以前，蒋夫人为她的丈夫翻译。提到他与我父亲已经双方同意关于增强国内团结的初步协定，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我竖起我的耳朵，可是他们并没有对这个话题加以任何讨论。显然他们早就比较详细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了。蒋与我父亲对这一种团结的努力似乎是完全协调的。

感恩节的晚餐是一个再欢乐没有的宴会了。第一，这个宴会正碰上了一个好时候。正如我和父亲在昨晚所谈到的，苏联的军队正在顺利而神速地推进；一连串的会议已接近大家所希望的一个圆满结束的阶段；另一个，恐怕是最重要而最多事的会议马上就可以开始。盟国的团结，虽然不断地有着许多困难，似乎目前已经达到了最紧密的地步。而不久四巨头中的第四位也将与我们见面；我们的部队以重大牺牲越过了塔拉瓦与玛金岛，吉尔贝特群岛也早被我们收复；在欧洲的上空，我们巨大的空军机队一天天地在增强其威力，以压倒的阵容袭击柏林。

因此，当我们在柯克的别墅欢度感恩节的晚上，围着那张又大又长的餐桌坐下的时候，我们都怀着一种庆祝的心情。父亲的火鸡是他自己从国内带来的，这些火鸡是当时副国务卿史退汀纽斯和阿拉拔玛地方的一个叫做乔·卡脱的人送的。“你们能想像得到乔将感到怎样的惊奇，假如他知道他的火鸡是先飞了多远的路程才被杀了给我们吃？”父亲一面亲自切着一只火鸡，一面问我们？他亲自用刀来切开火鸡，一份份地分给全体宾客：丘吉尔、他的女儿撒拉、艾登、海军中校汤姆生、摩朗爵士、李海、魏纳脱、哈立曼、霍浦金斯和他的儿子鲍勃，华生、麦金泰、勃朗、史坦因哈脱，我们别墅的主人柯克，鲍梯格和我。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一班从克斯推普营地（我们在开罗附近的兵营）来的管弦乐队在饭厅外面，演奏着跳舞的音乐。

晚餐快要完毕的时候，父亲举起了一杯酒，提议干杯。他很简短地谈到感恩节的风俗，以及这风俗的由来。并很有感情地描述今晚在全世界，美国的士兵与水手正把这美国的传统介绍到十多个异国的土地上。接着，他说：

“讲到这里，当然使我也想到我自己，能够很荣幸地与大英帝国的总理大臣一起分享这一顿感恩节的晚餐。”

丘吉尔已经站了起来预备致答词，可是父亲还没有说完。父亲说：“大家庭，一般地是比小家庭更为密切地团结着的……因此，今年，有全英国的人民参加在我们的家庭中，我形成了一个大家庭，而比以前团结得更巩固了。我提议为这一个团结而于杯，并且希望它长久延续！”

丘吉尔站起来致答词：他的即席演讲的本领真使人敬佩。他也极力地赞颂我们战时的团结，并且保证它将不断地巩固起来。父亲唯一能够与史迪威将军作单独谈话的时间是那天晚餐以后。这位高高的、坚韧的军人在十点钟左右到达，而在十点半的时候，他已经和我父亲两个人并肩坐在起居室中的那张大沙发上，在亲近地谈论着。我和我的妹夫鲍梯格和霍浦金斯坐在一起，离他们不到几尺远。我们三个人偶尔谈几句，不过大部分的时间则是听他们说话。

史迪威将军很流畅地、直率地、安静地谈着。他从不提高声音，也很少发什么牢骚，虽然我们不难想像他的确有理由可以那样。从头到底都是难关，这似乎是他的命运，他叙述他与蒋及蒋的总长何应钦将军之间的矛盾。而回答我父亲的询问时，他很干脆地表示他是有办法来处理与对付这些矛盾。他说他的处境可以容易得多，假如他能有权来分配更多的租借物资。而同时他说他也了解我父亲无法增加其分配数量的理由。父亲问起雷多公路，他想知道关于那件巨大的工程的许多问题以及成功的希望。父亲听说，英国方面以疟疾及气候等等为理由，不肯接受建筑这条公路。可是那时候，在曼纳大厦的会议上，美国方面的意见居于支配的地位。而史迪威很安静地、有条有理地和我父亲辩说关于这一条公路的问题。在开罗，英国方面企图修正在魁北克所决定的分配给中国、缅甸、印度战场的物资吨位数量，而他们所谓的修正就是把最最需要这些物资的国家的分配量减少，而把并不最需要这些物资的国家的分配量增加。史迪威对这种修正表示不同意，他说假如在魁北克所决定的分配量要修正，那么只可以是向增加方面的修正，而绝不可以是减少。

关于中国军队是否可以训练的很好这一点，史迪威将军无须和我父亲辩论，因为我父亲对于这一点与他有相同的见解。可是父亲却很想知道史迪威训练中国军队已经取得了什么成绩，史迪威告诉他目前有美国训练的两个师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正式作战。“他们还没有发挥真正的战斗力，”史迪威多少带着些苦涩味承认说。“说老实话，我是真想立刻就回到我那儿的阵地去，帮助他们克服最初的恐慌情绪。我相信这不过是一般的初上战场的慌乱。虽然不幸地英国方面知道了他们第一次在敌人炮火下不很成功的表现，而大大地加以宣传。”可是他有极大的把握，相信最后终可以用事实来证明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正如一切良将的判断一样，我们今天很高兴地知道他的见解完全是正确的。

很明显地，父亲对史迪威有很大的好感，他留他坐在旁边谈了一个多钟头。最后当他辞去的时候，父亲对他在远东方面所面临的荆棘的道路表示深切的同情。

在临睡以前当我陪着父亲在他的卧室里一起吸着最后一支卷烟的时候，他又谈到那条远东方面的荆棘的道路。他先告诉我说英国方面甚至对我们在太平洋中所采取的战略战术都表示反对。

“他们不赞成我们从一个岛跳到另一个岛的战术，”他说。“而他们也不同意我们预备将菲律宾作为我们将来对日作战基地的看法。”他略为酸苦地微笑了一下。“或许他们认为菲律宾人是不会集结在我们的旗帜下的。正像他们自己是很难期盼他们殖民地的人民会集结在他们的旗帜之下一样。”

他继续说：“总而言之，他们认为我们应该立刻放弃从一个岛跳到另一个岛的这种战术，而开始集中我们的力量来肃清马来半岛，然后我们可以爬向中国海岸，在那儿建立起一个将来对日作战的基地。”

我也曾经听到我们自己的海军军官们谈到在中国海岸登陆的问题。

父亲说：“当然，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基地移到比英国人所主张的更北的地方，这是更为合理而容易实行的。再说，我们自己的情报与英国方面所提供给我们的完全不同。英国人说中国的海岸上密密地布满了日本军队，可是我们却很充分地知道大部分中国海岸是在中国游击队手中。”

我问我父亲这些游击队是不是中国的共产党，他点了点头，表示肯定。

“蒋偏偏又想使我们相信中国的共产党对日本军队并无任何敌对的举动。可是不幸的是，我们所知道的却与他所说的完全不同。”

据我自己从其他的地方得来的情报，我知道一切关于中国土地的空中摄影侦察以及空中测图，我们第十四航空队作战上所必需的照片等等，都是绝对机密，不能对英国方面公开。而我把这种情形告诉我父亲，他早就知道了这一点。

他说：“很久以前我们就和中国互相商定这一点了，中国政府迫切要我们同意不要把空中测图给英国方面看到。事实上，他们是要我们先答应了这一点才容许我们开始这一方面工作的。我们不难探知他们坚持这一点的原因。他们知道英国方面很想看看这些测图，为了商业上的目的……商业上的，战后的目的。”“事实上，不多几天以前，我和蒋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还谈起这一问题。他很希望能够得到我们的支持，来反对英国人带着他们战前所享受的那种治外法权回到香港、上海与广洲。”我问父亲我们是否预备给中国这一方面的支持。

父亲回答：“白给是不会的，在我们正式商讨这个问题以前，我对蒋政府的性质表示不满。我告诉他这种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我告诉他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言和，组织一个联合政府。他表示同意。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他同意了。他同意组织一个民主的政府，只要我们能够保证苏联答应尊重满洲的边境。关于苏联这一点预备在德黑兰会议上就加以讨论。”

“那么，只要你能和斯大林把这一点解决了，蒋就同意组织一个比较民主化的中国政府。而在我们这一方面……”

“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将支持他不使英国或其他国家在香港、上海与广洲享受特殊帝国的权利。这是应该的。”

这可以说是一件交易，可能有很好的收获。

“我特别觉得高兴，当我听到蒋委员长愿意在普选之前邀请共产党参加组织政府。事实上，他所关心的焦点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履行我们的诺言，不使英国的军舰在日本战败以后开进中国的港口，只许美国的军舰开进中国。我已经给了他我个人的诺言，说这一切将正如他所期望的一样。”父亲说。

“叫丘吉尔答应这一点恐怕是要费相当的口舌，而不会是件容易事。”我说。

“关于这一点，他无法与我争辩，因为打败日本的物资与兵力百分之九十九全是美国的，”父亲很严厉地说。“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将采取一个新的方向，使英国、法国和荷兰觉悟到我们管理菲律宾的方法是他们管理他们殖民地的唯一方法。”他向我指出大部分的中国人认为日本的殖民地政策要比英法荷的殖民地政策高明得多。

父亲与蒋委员长所讨论的不仅是关于中国的将来。他们还谈到马来联邦、缅甸、越南、印度等等问题。很显然地，父亲对于这些殖民地问题的态度使蒋大为兴奋。因为父亲对他说，英国在印度应该满足于它特惠的经济地位，而必须允许印度人民以政治的独立。在另一方面，法国在战后也没有任何权利回到越南，以越南曾经是它的殖民地这一个理由来要求收回这块肥沃土地的主权。他对蒋说，法国政府最多只能获得它殖民地的委托统治权，向联合国组织负责，在联合国认为这些殖民地能够自己管理它们行政的时候，法国就应该交还它们的独立的宗主权。这是他差不多一年之前所发表的同样的意见，时间并没有变更他的信仰。相反地，使他的信仰更为坚定了。

第二天上午，他有许多约会。接见了蓝狄斯、哈立曼、蒙巴顿（他关于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的战争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报告）、蒋夫人、李海提督与魏纳脱大使，最后我总算找到了一点时间单独告诉他他所需要的美德勋章已经送到了。

“好极了！”他叫道。那真是他所最期盼的一个好消息。“赶快通知艾森豪威尔，叫他在午饭以后从曼纳大厦到这儿来一下。”于是在两点三十分左右，当艾森豪威尔将军和马歇尔将军一同走进我父亲屋子的时候，父亲宣布他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他们。艾森豪威尔以立正的姿势站着，父亲叫华生宣读预先准备好的奖状。奖状宣读完毕以后，父亲做了个手势，叫艾森豪威尔走前一步。当艾将军弯下他的身子的时候，父亲拿出勋章，亲自为他戴在军服上。

“你所应该得到的还不只是这个，艾森豪威尔。”父亲说。

艾森豪威尔的眼中洋溢着泪珠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总统先生。我对于这一个勋章的感谢超过你所给我的其他一切。”

当天下午开最后一个政治会议。蒋氏夫妇、丘吉尔、哈立曼、艾登与贾德干在花园中和父亲讨论了差不多两小时之久，草拟预定在德黑兰会议结束后向全世界公布的声明。并且决定怎么样措词，使全世界知道满洲、台湾以及澎湖群岛将在战后归还中国。而朝鲜在亡国多年后将重新获得自由。

在一顿很安静的晚餐后，父亲很早就上床睡了，因为他与他的随员们第二天一早五点钟就得起身，以便在当天下午到达德黑兰。气象报告很好，全程飞行的计划得以实行。我不预备和他们同行，格莱少校已经驾驶我的飞机到达开罗，我预备坐我自己的飞机到德黑兰，因为我不知道我将在伊朗停留多久，而我必须随时都得准备离开那儿回到我的防地。此外，我已经接受了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到南部的勒克啥去游览一天。

因此，在第一天下午，当父亲与他的随员出发以后，格莱和我以及我机组乘员中的一员克莱姆上士到尼罗河的下游与艾森豪威尔以及他的几位参谋会合。我们在星期六晚上到达那儿，在勒克啥旅社中找到了几间房间过夜。我们在那旅馆中所找到的不仅是房间，在大客厅的附近的一间房间中我们发现了一架钢琴。克莱姆上士欢呼了一声，立刻跑到钢琴前坐下。在战争以前和平的日子中，他在凯·加沙乐队中当琴师，他以熟练的技巧开始弹了起来。晚餐以后，他为艾森豪威尔和我们弹了两小时之久，我们则静静地坐在一旁听。假如你闭上你的眼睛，你会觉得你又回到了故乡，而战争已经结束。

第二天，埃及帝王的坟墓，郊外的一顿野餐，卡纳克雄伟的庙宇，使我们消磨了和平、安息、悠闲的一日。我们一行人中唯一觉得不安的是艾森豪威尔将军，他不断地担忧这次开罗与德黑兰会议的成果，在进攻西欧作战的最后讨论，将决定由马歇尔将军来担任最后一次的盟军总攻中的总指挥，而艾森豪威尔将被调回华盛顿总部去做办公厅的工作。在那天下午他接连三四次提到了他关于这一点的担忧。我不知道他如此做是否因为有一位总司令的儿子在他的近旁。不论怎么样，关于这一类事，我即使觉得我应该帮他一下忙，我也还是不能有所作为的。我当时只能安慰他：“盟国的联合参谋总部在作任何最后的决定之前一定会先和你商量的，将军。”即使关于这一点，事实上，我也是毫无把握的。

格莱·克莱姆上士和我计划在第二天起飞赴德黑兰，可是我们的飞机发生了故障，因此我们不得不花了些时间来修理。最后，在二十九日，星期一

的傍晚，我们出发，计划飞过阿拉伯沙漠，清晨四点钟在中途哈伯那耶降落加油。

星期二早上九点半我们在德黑兰的机场降落，发现我们成为许多人关心与骚乱的原因。那儿的通讯本来就十分不便，因此我们无法使父亲知道我们在勒克啥被阻，多耽搁了一天，因此使大家都认为我们一定在阿拉伯沙漠中被迫降落。他们正准备派人出发搜寻。假如我们真的是被迫降落，那倒不是好玩的，因为我们知道得很详细，沙特阿拉伯的游牧民族是十分凶悍而蛮横的。我们的到达使父亲大为安心。事实上，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第七章丘吉尔怕苏联太强大

德黑兰，饮水不清洁的城市
罗斯福住进了苏联大使馆：我见到了斯老伯伯
斯大林身材矮小，但的确是一块钢铁
丘吉尔赠给斯大林一柄双锋剑，罗斯福朝天举起
丘吉尔关心战后英国的地位，他怕苏联太强大
丘吉尔和斯大林在晚餐会上争吵起来
罗斯福：我们十分需要赫尔利这样的人

开罗会议一结束，罗斯福就带着全部人马乘“圣牛”号飞机前往德黑兰。德黑兰会议，是三大国首脑的第一次会晤。会议内容主要是研究并制订了对德国的作战方针，即开辟第二战场。此外，他们还就波兰的边界问题、战后分割德国问题以及战后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议最后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和“苏美英三国德黑兰总协定”。后一文件当时是保密的，没有公布。

德黑兰宣言声称：“关于战争方面——……我们已经议定了关于将德军消灭的计划。我们已就将从东面、西面和南面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达成完全的协议”，“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就阻挡我们由陆上消灭敌军，在海里消灭他们的潜艇，并且从空中消灭他们的工厂”，“我们的进攻将是毫不留情的，而且是越来越强的。”至于怎样向法西斯德国进攻，在德黑兰总协定中规定：“注意到‘霸王战役’应于1944年5月发动，同法国南部的战役相配合。此项战役在登陆器材的数量允许的比例范围内着手准备。会议进一步注意到斯大林元帅的声明，根据这一声明，苏联军队将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发动攻势，以便阻止德国军队从东战场调到西战场。”

讨论战后波兰的边界时斯大林提出，在西边，波兰人应取得以奥得河为界的领土；在东边，斯大林坚持1939年（9月底）的边界线，认为它是合理的和正确的。斯大林说，如果把沿涅曼河左岸一带的东普鲁士北部，包括蒂尔西特和哥尼斯堡划归苏联人，他准备接受寇松线，作为苏联和波兰的边界线。罗斯福和丘吉尔均表示同意波兰的国土应向西移。但是，罗斯福在和斯大林私下会谈时，他告诉这位大元帅说：“1944年就要举行总统选举，……美国大约有六七百万波兰血统的美籍公民，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不愿失去他们的选票。他说，他本人虽然同意斯大林大元帅关于必须恢复波兰国家、并希望波兰的东部国境线再向西移，而西部国境线移到奥德河的看法。但却希望大元帅理解，由于上述政治原因，他不能在德黑兰或下一个冬天参加这个问题的任何决定，现在也不能公开参加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安排。”丘吉尔表示，他将把苏联的建议带回伦敦交给波兰人（即当时流亡在伦敦的波兰资产阶级政府）。所以没有达成协议。

会议还就战后如何分割德国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个强大的德国会把世界再次拖入战争。罗斯福主张把德国分成五个部分。丘吉尔认为普鲁士是发动战争的祸害，应予严惩，对德国的其余部分应宽容些。斯大林说，要分割德国，那就应当是真正的分割。最后，三国首脑决定由欧洲咨询委员会再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关于战后组成维持世界和平的机构（即后来的联合国组织）问题，三国的代表也交换了意见。罗斯福比较详细地谈了他的设想。斯大林表示赞同罗

斯福关于这个组织应该是世界性的而不是区域性的意见。

关于太平洋战争，斯大林大元帅说：“……一旦德国最后被打败，那时就有可能把必要的增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然后我们将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

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在反法西斯世界大战中产生了巨大作用和影响。两次会议的宗旨是以反法西斯同盟国家联合力量击败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并在战后防止侵略势力和法西斯残余的再起，维护世界和平，赞助各国人民的独立民主的愿望。两次会议的召开及其决议表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空前地加强和巩固了。会议关于加强合作和协同作战的决议，是促使 1944 年反法西斯同盟国取得战争决定性胜利的重要因素。

所以，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共产党同意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各次国际会议的决议，因为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并指出：“开罗会议决定应使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这是正确的……开罗会议又决定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是很好的。”他还说：“我们认为开罗会议关于朝鲜独立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应当帮助朝鲜人民获得解放。”

斯大林给德黑兰会议很高评价，他说：“德黑兰会议关于对德国共同行动的决议以及这个决议的光辉实现，是反希特勒联盟战线巩固的鲜明标志之一。”

到德黑兰的航程大约 6 个小时，要超过巴勒斯坦全境。可是罗斯福不同意如此匆促。“我们应该有一点多余的时间，”他说，“以后我也许再也不会飞这条航线了。”他和飞行员布赖恩少校拟定了一条路线，使他们几乎飞经圣地的每一处名胜古迹。“低飞！”他下命令，“当你飞临每处圣迹时，尽你的胆量贴近它兜圈子。”

他们首先飞临贝尔谢巴及其著名的井泉，继而飞越山谷，翻过濯濯童山，来到伯利恒。布赖恩把飞机倾侧得似乎快要使一只机翼触及地面了。罗斯福凝视着耶稣诞生的小教堂，心里真希望降落。接着，飞机沿着大路朝耶路撒冷飞去，不到一分钟，就已经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上空盘旋了。罗斯福一一辨认那些神圣的建筑物，并且激动地向坐在他旁边的麦金太尔报出他们的名称：大卫墓和天国之门！耶稣拱顶；耶稣受难地，坡上是伊斯兰陵墓；大马士革之门，圣墓教堂，哭墙。接着，他们绕着橄榄山的梯田形山坡飞了一圈，山顶上耸立着耶稣升天教堂，然后朝死海飞去。他们从这里沿着约旦河一直飞抵那个小小泛光的加利利海，海上还有渔民在打鱼呢！

飞机穿过巴勒斯坦上空后，总统就陷入沉思了。对罗斯福来说，在德黑兰会议上的艰巨任务就是同他认为“难以捉摸”的斯大林建立自己同丘吉尔保持着的那种私人关系。据美国外交官墨菲说：“总统的计划是使苏联人感到，美国人绝对相信他们，并把苏美两国在战时与平时的合作置于任何其他未来的联盟之上。”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在三巨头会谈之前，1943 年 10 月底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外长预备会议。总统想派韦尔斯参加，但是由于普遍谣传这位副国务卿同一位卧车服务员有同性恋关系，使他不得不辞职。罗斯福很尊重这位老朋友的意见，对他的辞职感到难过。赫尔在进行他在战争期间唯一的这一次重要外交活动时，以顽强的意志争取说服苏联人发表一项四国宣言，保证成立一个维护战后和平与安全的组织。斯大林向赫尔保证，一打败德国，苏联就将参加对日本的战争。罗斯福心想，这次会议就以上问题

能达成协议，就算取得“重大成果”了。

去德黑兰的七十七个美国人首先从空中看到这个都市——一座使人惊讶的近代化的都市，它的建筑物与车站座落在一连串小山脚下。这些山岗，与横贯西南的山脉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广大的盆地，包围住千百里的沙漠，稀稀落落的几所村庄，一两条寂寞的铁路轨道以及德黑兰这个城市。三巨头之所以在这儿会晤无非是为了妥协，而我相信他们三人之中，谁也不会满意这个密会的场所。斯大林，因为必须亲自指挥他的军队，坚决主张会晤的地点离莫斯科决不可以超过一天的飞行。结果，他们便选择了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友好的中立国的首都，参加联合国的一个国家，除开这两点而外，便没有什么别的值得我们介绍的了。

不方便的地方却十分多。第一，不久以前，德黑兰曾是纳粹在中东一切间谍活动的大本营；而迈克与苏联方面的密探们都确信在数千个从欧洲逃入这个都市的难民中，不管我们警戒得怎样地严密，还依然混杂着好几十个纳粹间谍与亲纳粹的人物。第二，这儿的健康与卫生问题恐怕是全世界最困难的。德黑兰的饮水是通过毫无遮盖的沟渠从山顶流到城市中来的。假如你住在城市的高处，那么你是幸福的，因为你可以优先使用沟中的饮水；可是你说不定会是缺乏公德心的，因为你得利用这流过你住所的沟渠，同时作为你取得饮水的来源与排泄污水的去处。因此，假如你不幸地住在城市的中部或是低处，那么你所得到的饮水将是居住在高处的邻居们所倾倒下来的污水。这样一来，假如你不生疟疾或是痢疾，那才是怪事。为什么一个比较现代化的都市，有广阔平坦的道路，相当近代化的医院，一所大学，博物院，足够应用的发电厂，甚至还有电话的设备，反而没有那最重要的、正当的供给饮水与排除污水的设备，这可以说是我们难以理解的小小神秘之一。

虽然德黑兰看来似乎是一个现代化的、繁荣的都市，我们很快地就可以发现伊朗的经济是既非现代化，又非繁荣。伊朗有一个首都，而围绕着这个首都则是广大的土地，游牧部落所寄生的草原，这些人民所知道的只是最卑贱的贫穷。在北方说不定情形略微好一点，因为那儿有较好的耕地，而生活也不致太困苦。在南部是油田，那时是英国的租借地，带给了一小部分波兰的上流人物以及政府官吏以巨大的财富，可是对于其他一般的居民则并无丝毫的补益与贡献。

好像这一切还不够坏似地，战争又带来了连续性的恶性通货膨胀，一包面粉的代价超过一般非公务员的伊朗平民一年的总收入；欧洲的难民必须付出与五块美金同等的代价来买一包美国香烟，二千美金一个汽车胎，八千美金一台无线电，一千五百美金一只瑞士制的手表。

面对着这高涨的物价，伊朗政府的官员们只是举一举双手，表示毫无办法，此外则并不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

这一切情形，当然是我们到达这个首都数天之后才知道的。我们到达的那一个早晨，花了差不多整整一小时设法找一部军车到机场来接我们。我们则懒洋洋地观察我们飞机所降落的那个机场，机场上停留着好几排租借法案所交付的P—39式飞机，上面新漆着鲜艳的红星。军车来了以后，我们又花了整整一小时在德黑兰城内寻找我父亲的住所。我去的第一个地方当然是美国公使馆，可是到了那儿他们却告诉我父亲住在苏联大使馆内。我后来知道，父亲之所以不住在美国公使馆而住在苏联大使馆，是有充分理由的。最初，我父亲拒绝了斯大林私人的邀请，他拒绝的理由是：他认为假如不受任何人

的招待，他可以比较自由自主一点。同时，他事先已经拒绝了英国方面的邀请，假如他突然接受了苏联的邀请，他怕会因此得罪英国方面。可是因为许多便利的以及安全上的关系，使他不得不最后接受了斯大林的招待。美国公使馆离苏联大使馆与英国大使馆都十分远，英苏两国大使馆之间的距离只隔一条街。这个城市中毫无疑问是密布着轴心国的间谍，苏联的密探后来宣布他们捕获了好多个企图行刺三位巨头的人犯。因此住所的安全是必须被考虑到的。哈立曼极力向父亲指明，假如英苏的官员或是将领们在到美国公使馆的途中发生了什​​么意外，父亲自己也会感觉到多少有点责任的。

苏联方面的确想尽了办法使父亲能十分舒适地住在他们的大使馆内，斯大林自己退居到大使馆内次要的屋子里去住，把那座主要的大厦让给我父亲。美国海军优秀的厨子与侍役也全班跟来了，像在开罗一样照顾我父亲的饮食。此外，住在那儿也的确有真正的便利，我父亲住的那一套房间开门出来，就是大使馆的会议室，一切全体会议都在那儿举行。

那个星期一的早晨，到十一点以后我才总算见到了父亲，而第一次知道他在为我的迟迟不到而担忧。

“难道你烦心的事还不够多吗？还要会见斯大林，还要开会，又苦为我飞机的迟到而担忧”。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打了个长途电话到巴勒斯坦去……”最初艾森豪威尔是提议到巴勒斯坦去游览两天的。父亲走了以后，他才临时决定改变计划，到勒克啥去。

“我真觉得非常抱歉。假如我们当时有办法能打个电报给你“尤其是当英国方面告诉我许多被迫降落在阿拉伯境内的人们的遭遇以后，我特别觉得担心。”父亲说。

我问他是不是很忙，我可以暂时离开，以后再回来和他谈。“只有华盛顿来的一些信要我批阅，此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事了。”他说。“坐下来谈几分钟吧。”

我们坐在他楼下的起居室中，房间朴素、舒适，布置得很大方。窗外是美丽的花园。我陪他坐在一张大沙发上。昨晚的夜间飞行使我很疲倦。可是我却同时觉得兴奋，急于想知道一些会议的情形。这个父亲辛辛苦苦费了一年多时间所筹划的会议现在总算实现了。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爸？你见了他没有？”

“斯者伯伯？当然，我已经和他见了面，星期六晚上我要请他来吃晚饭，可是他送了个信来说他实在太疲倦了，不能来。当昨天我搬来的时候，他来看了一下。那是昨天下午的事。”

“就在这儿吗？”

他笑了起来。“就在这张沙发上，伊利奥。斯大林元帅就坐在你现在所坐的地方。”

“丘吉尔呢？”

“这是第一次会面，只有斯老伯伯和我。当然，还有他的翻译，柏甫洛夫。”

我问他我们国务院的苏联通却尔斯·鲍伦是否在场。

“人家是要我那么做的，可是我的看法却不同，假如只有他的翻译在场，那真正表示我对他有绝对的信任，并且没有丝毫怀疑。而事实上，这样倒省了很多事，至少节省了时间。”父亲微笑着说。

我点头表示同意。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即使斯大林对英美毫无怀疑。我们应该把一切放在非公式化的友谊与亲密的基础上。

“你们谈了些什么？是不是机密的国家大事？”我问。

“绝对不是，”父亲说。“我们所谈的只是‘您喜欢不喜欢这个住所呀？’‘多谢您把这所大房子让出来给我住’，‘东战场有什么新的消息没有？’（东战场消息非常好，斯大林高兴得不得了，他希望红军能够在我们回去以前越过波兰国境。）尽谈些这一类的应酬话。很有礼貌的寒暄，我不愿意一见面马上就开始谈正经事。”

“先互相较量一下对方的尺寸，是不是？”

他皱起了眉头。“我不愿意这么说。”

“我是开玩笑的。”

“我们是开始互相认识，我们想先看一下彼此究竟是怎样的人。”

“那么他究竟是怎样的人呢？”

“啊……他声如洪钟，说话沉着，似乎富于自信心，而对于自己有十分的把握，行动迟缓而稳健。总之，我得说他处处给人以威严的印象。”

“你喜欢他？”

他点了点头，表示肯定。斯大林那次坐了没几分钟就走了，接着莫洛托夫来作礼节性的访问，而在四点钟三巨头举行他们第一次全体会议。这一次，英国方面的代表又占了最多数——一共是八位，由丘吉尔领头；我们美国方面的代表是七位——父亲、霍浦金斯、李海、金氏、提恩少将（我们的驻莫斯科武官）、劳逸尔上尉与鲍伦；苏联方面的代表数最少——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洛希罗夫、一位秘书，以及斯大林的翻译柏甫洛夫。

“并且，”父亲微笑着说，“我们把 OVERLORD 作战计划的副本给斯大林看了。他看了一下，提出了一两个问题，就接着问：‘什么时候？’”

我批评说这一次会议该是一次相当道地的会议，并且问马歇尔和安诺德在会议中到哪儿去了。父亲告诉我说他们把信号搅乱了，而他们正在德黑兰的城中。

“我相信我们可以合作下去，斯大林和我，”父亲说。“在今后的几天中，以往的许多误解与相互间的猜疑可以一扫而光，我希望因此可以一劳永逸。至于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个人之间，则……”

“不很和谐，是不是？”

“我必须把我的工作分开，分头来应付这两个人。他们太不相同了，观念、脾气……”

父亲告诉我前一天晚上他招待斯大林、丘吉尔和他们高级外交顾问们的晚餐会，以及在晚餐以后，他们怎么样一起坐到十一点钟，慢慢地讨论政治，试探各人的意见。我父亲认为语言的隔膜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障碍，而斯大林与丘吉尔之间绝对相反的见解却是最大的障碍。丘吉尔对斯大林有一个颇富于人性的反应使我父亲觉得十分有趣。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时经常穿一套蓝色的服装，而在开罗时则通常穿白色的衣服，可是这一次在德黑兰，因为看到斯大林的军服，他便也换上他自己的军装，高级皇家空军将官的服装。

我很想知道他们讨论一些怎么样的政治。

“讨论一切我们所能想到的，”父亲说。他们谈到战后的世界和平，足以维持这和平的三国机构。并且同意任何的和平基础必须建筑在这三个国家的密切团结上，这三个国家中的任何一国的相反的意见可以否决整个的重要

议案。父亲说关于这个单独否决权还必须彻底讨论，不过他表示他个人在大体上是拥护这个原则的，因为他感觉到这三个国家在将来有实行继续密切团结的必要。“并且我们还同意在必要的场合，我们可以用武力来维持和平，”他又说。“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在战后的世界中，为我们之中的每一个国家划定一个普遍安全区的疆域，这工作还必须我们去完成，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动手做了。”

父亲的秘书李格顿中尉从门口探进头来，提醒我父亲说华盛顿送来的信件必须早一点批阅好，于是我站起来预备退出。父亲忽然把我叫了回来。

“喂，”他带着胜利的目光看着我，“我想你大概还没有听到星期六的运动比赛吧？”

“运动比赛？”我完全摸不着头脑地问。

“陆军对海军。你当然参加陆军那一方面的，是不是？请你交给我十块钱。赢了配十三倍。”他向我伸出他的手来。

“我劝你还是多化些心机在国家大事上吧，”我一面说，一面把钱缴了出来。

在大厅的那一头，我听到说话的声音从大使馆的会议室中传出来，美国、英国与苏联的参谋长官们在里面热烈地开会。我走出了屋子，想看一看院子里的情形。院子里到处是苏联的卫兵，他们大部分是军官，个个全是又高又大的汉子，起码都有六尺二寸高。我兜了一个圈子，发现苏联大使馆与英国大使馆事实上由卫兵与围壁并合成一块很大的圈地，周围布满了人们，从他们的便服，我看出大部分是苏联的密探。他们每个人的衣服里都值得怀疑地鼓起一大块，显然他们全都带着重武器。斯大林对于保护他的客人们的安全似乎是十分周密，一点儿不肯疏忽。

午餐以后，父亲召见美国的参谋长们，听他们报告当天上午会议的经过。他们的报告很简短，很零碎。在短短的十五分钟之内，李海、马歇尔和其他的几位叙述了当天上午的谈话，主要是关于 OVERLORD 的作战的，它的时间、它的规模与它的指挥。

当他们退出去和英苏双方的代表们继续会谈时，我回到父亲的跟前，很兴奋地等待斯大林与莫洛托夫按照约定的时刻来看我父亲。苏联的代表们准时来到，一分钟也不差。父亲介绍我与他们认识。我们把椅子拉到父亲的大沙发前面，自己则退到后面坐下。

虽然事先人家告诉我斯大林的身材很矮，我看到他还是不免觉得有些惊讶，同时也觉得很高兴，因为他很和霭地招呼我，并且眼中闪耀着慈爱的光彩，使我不由自主地对他微笑。在他说话的时候，他先敬我父亲和我各人一支俄国香烟，一头是强烈的、浓黑的烟草，另一头是硬纸卷成的烟嘴。我对他有了一点新的发现，他的声音固然安静、深沉而有度量，他的身材固然矮小，可是他好像有一种强大无比的动力，在他的内心中似乎充满着广大的忍耐力与刚毅的自信心。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灰色而没有色彩，使我回忆起我的伯父梯奥陀·罗斯福。听着斯大林的安静的语句，看着他很快的，一下子掠过的微笑，我感觉到他的名字的意义中所包括的那种钢铁般坚定性。

在那次四十五分钟的谈话中，大部分是父亲和他在说话，最初，我以全部的精神注意我们这位访问者。留心察看他的军服，剪裁缝纫得非常合适。可是过了不多久，我便开始听他们的谈话了，他们在讨论远东和中国，

父亲与蒋委员长已经讨论过的一些问题。父亲向他解释蒋非常关切地想废除英国在香港、上海与广洲的治外法权蒋对于满洲也非常关切，并且渴望苏联能够尊重满洲的国境。斯大林说明他的基本原则是要全世界承认苏维埃联邦的宗主权。而另一方面，他也绝对尊重其他一切大小国家的宗主权。父亲又告诉斯大林，他与蒋关于其他问题的谈话，说蒋答应在全国普选之前容纳中国共产党参加政府，在战争胜利之后，蒋预备立刻实行全国普选。当父亲的话被译成俄文的时候，斯大林一面听一面不断地点头，他看来似乎表示完全同意。

这次谈话中他们所讨论到的政策只是这一点。其他的时间，他们只是非常随便而非公式地谈着，一直到三点半，华生从门口探进头来报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站了起来，一起走进会议室。

他们所准备的是一个正式的赠献典礼，丘吉尔将代表他的国王和英国的人民，赠献给斯大林一柄巨大的双刃剑，向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勇的苏联公民表示敬意。因为在那儿纳粹攻势的后背被他们永远击破，而纳粹不可征服的这一个谎言被永远地揭破了。

会议室里挤满了人，红军的军官与英国的士兵所组成的荣誉警卫队，红军的乐队，以及在对纳粹作战的这三个大国的陆海军首脑们。当父亲和我走进的时候，斯大林与丘吉尔已经在座。红军乐队先奏苏联的国歌，然后奏英国的国歌。乐声回荡在会议室中，从开着的窗户中传到外面。每个人的脸色都十分庄严。丘吉尔起立致词：

“英国的国王乔治六世命令我把这柄荣誉的剑献给你，转赠给斯大林格勒城市，这柄剑的图样设计是英皇陛下亲自选定与认可的。这柄荣誉剑是英国的工匠们所铸的，他们的祖宗世代代从事于铸剑的技艺。这柄剑的剑身上刻着下列的词句：‘英皇乔治六世敬献给斯大林格勒的英勇而刚毅的市民，以表达大英帝国人民最深深的敬意。’”

一位英国低级军官把那柄巨大的剑呈给丘吉尔。他接过来，转过身子，递给斯大林。在他的后面，红军的警卫们沉静的站着，可是他们却不是完全没有表情的。他们的盒子炮横在胸前，他们看着他们的大元帅把剑从丘吉尔手上接过来，看了一下，然后举到唇边，吻了一下剑柄，很艰难地咽了一口吐沫。他的答复由翻译译成英文：

“我代表斯大林格勒的市民，对英皇乔治六世的这一件礼物表示深切的感谢。斯大林格勒的市民将十分珍惜这件礼物，我请求你，总理大臣先生，把他们的谢意转达给英王陛下。”

沉默了一会儿，斯大林很庄重地绕着桌子走到我父亲所坐的位子前面，把剑交给我父亲看。丘吉尔拿住剑鞘，父亲从容地拔出钢剑。他把剑朝天举直，我正站在父亲的后面，剑锋的光芒照耀着我的眼睛。他的双手和巨大的剑柄相比，显得甚为微小。这个剑柄之长足够四只手握住。从一个帝国，一个国王由他的保守派的总理大臣送来一件英国的工匠们所锻铸的礼物。这些工匠们，从他们的技艺来讲，也可以算是封建的贵族，从事于一种贵族式的，中世纪的职业。现在这件礼物却是送给一个皮鞋匠的儿子，一个共产党员，工人阶级的独裁政权的领袖。他站在一旁毫无表情地看这位世界上最大的兵工生产国家的领袖把这柄剑直举起来。

“他们的确是有着钢铁一般的心。”父亲喃喃地说。

他把剑插进了剑鞘。丘吉尔与斯大林退出会议室，走向大使馆的门前，

在那儿和我父亲一起留影。

他们坐在安排在门口六根大柱中间的椅子上。在他们的后面围着他的部长、大使、将军与元帅。在他们的前面，有的摄影师跪着，有的蹲着，有的俯伏在活动摄影机的三脚架上，或是跑前跑后地想找一个较好的角度。主要的代表们又聚拢合照一张集体照，丘吉尔的女儿穿着她的女空军队员的制服也夹在里面。当她被介绍与斯大林见面的时候，摄影的工作暂时停止，而斯大林礼貌十足地站了起来，弯下身子吻她的手。十五分钟之内，摄影工作很快地完成。他们又走进屋子继续他们的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美方代表十二人，英方代表十一人，而苏联的代表只有五人。他们一共讨论了三个多钟头。从五点直到七点，我在父亲的房内等他回来。利用等待的时间，我十分舒适地睡了一觉。终于在七点一刻的时候，父亲回到他的房中，把我摇醒，这时候他自己也觉得十分疲倦了。

“我得马上换衣服去吃晚饭，”他发着牢骚。“我真想去以前能睡一觉，休息一下。”

“那你为什么不睡呢？”

“你知道我固然十分疲倦了，但是我的精神却依然十分紧张。”“喝杯酒能好一点吗？”

“现在不喝，谢谢你。我想等一等，或许在换衣服以前我想喝一杯鸡尾酒。现在我只想躺一躺。”他又添了一句，“今天晚上是斯大林做主人，那就是说我们得吃一顿俄国式的晚餐；而假如我们的国务院给我的情报并没有错误，那么晚餐时候真不知要有多少次的干杯！”

他闭上眼睛，可却没有睡，一会儿他举起双手摩擦他的眼睛，把眼镜推了上去。接着他就叹了一口气，伸手拿了我的一支香烟点上。

“他真是有能力办事的，那个人。他永远不放松他的目标，”父亲迟缓地，带着思索的神情讲。“和他一起工作是件快乐事。他绝不往叉路上走，他先提出他所要讨论的题目的轮廓，然后抓紧了这个题目不放。”

“是不是 OVERLORD 的作战计划？”

“那就是他讨论到的，也就是我们所讨论的。”

“英国方面还始终表示异议，是不是？”

“这……现在丘吉尔提议同时从两方面发动作战。我猜他已经明白现在是没法再反对西欧的进攻了。现在每逢丘吉尔反对这个作战计划的时候，马歇尔总是瞪着眼睛望着他，表示不相信他自己耳朵似的。”父亲大声地笑了起来，追想着当时的情景。“假如说有一个美国的将军使丘吉尔觉得没法应付的话，那就是马歇尔了。当然这是因为马歇尔始终是对的。我希望有一天每一个美国人都能觉悟到他应该怎么样来谢谢马歇尔。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没有一个人！”

“丘吉尔所说的两方面作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爸？”

“一方面从西欧攻击，而另一方面你猜是哪儿？”

“巴尔干？”

“对了。”他笑了一下，用一支手臂支起上半身，一面望着我，一面说：“你知道，伊利奥，从某一个观点看来，这些全体会议真是奥妙得很。当丘吉尔为他的巴尔干进攻战辩护的时候，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部明白他的真正的用意何在。大家都知道他很迫切地想切入中欧，使红军无法进入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假如可能的话。甚至匈牙利也不让红军进入。斯大林知道这一点，

我知道这一点，而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而他自己决不会讲出来？”

“当然不会讲的。而斯老伯伯，他所阐述的从西方进攻欧洲的许多有利的地方，以及把我们的部队分散在两方面的许多不利，同样他也一定在想到许多政治上的意义。当然，他是决不会亲口说出来的。”

“我想不见得……”我开始迟疑地说。

“什么？”

“我的意思是，丘吉尔……他不是……”

“你在怀疑他的意见或许是正确的？而我们或许是应该攻打巴尔干的？”

“这……”

“伊利奥，我们的参谋长们只有一个信念。他们相信以最小的牺牲来歼灭最多的敌人的唯一办法是发动一个大规模的进攻战，然后以我们全部的力量扑过去。我觉得这办法很有道理。而斯大林也是如此想的。我们全体将领也都有同样的感觉。我相信从战争的开始起，甚至在战争开始以前，他们都始终是这么想的。自从我们的作战计划局开始研究我们的作战计划的时候，这意见便存在了。红军的将领也认为这是个好办法，这是结束战争，获得胜利的最快的办法。

“问题是丘吉尔太关心战后的世界与英国的地位了。他怕苏联变得太强大了。

“苏联可能在欧洲变得很强大。不过这究竟有什么坏处是必须看其他的许多因素来决定的。

“我所相信的只有一点：假如减少美国士兵牺牲与迅速获得胜利的唯一办法是从西欧，单独从西欧发动攻势，而无须再在巴尔干的山地消耗登陆艇、人员与物资，而假如我们的参谋长们也认为这是唯一的办法，那么，我没有什么话好讲，我只有表示完全赞同！”他微笑了一下，不过颇带着一些严峻的神情。“我觉得我们并无理由来多牺牲些美国兵的性命去保护大英帝国在欧洲大陆上的真正的与假想的利益。我们是在战争中，我们唯一的工作是避免冒险的行为，以最快的方法来争取胜利。我想、我希望他知道我们的意思是这一次胜利将是最后的、永久的胜利。”他又闭上他的眼睛，而四周是一片寂静，只有“嘀嗒”的钟声，这钟声使我想到时间已经不早了。

“去洗个澡吧，爸？”

“是不是时间到了？哦，天呀！……请你给我叫亚瑟进来。并且为我调制一杯你方才提到的鸡尾酒……”

“照老方法做？”

“不过要做得淡一点，伊利奥。别忘了晚饭时我还得要对付那许多次干杯呀！”

那天晚上的晚餐会在与会议室相连的餐厅内举行。除父亲与丘吉尔之外，斯大林元帅还邀请了艾登、莫洛托夫、哈立曼、霍浦金斯、卡尔以及担任翻译任务的鲍伦、贝莱兹霍甫、与勃斯少校。我并没有被邀请，可是在上第一道菜的时候，站在斯大林背后的一位密探窥见我从一座侧门旁走过，他低下头来在斯大林的耳旁低低他说了几句话。我看到斯大林抬起头来，朝我的方向看，我迅速而有些狼狈地往后退下去，可是他立刻站起来，亲自跑到我的身边。用种种的手势，明显地表示他希望我也能参加这一个宴会。一位

翻译跟上来用英语说明他诚意的邀请，向我解释斯大林并不知道他的秘书忘了邀请我。他很坚决地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拉进了餐厅，在艾登与哈立曼之间为我安排出一个位置。

我不得不坐下来，参加平生第一次俄国风味的盛宴。而下面的一切故事当然是绝对真实的。

酒当然是喝的伏特加酒，不过幸而此外还有一种白澄的葡萄酒，淡而干涩，以及一种俄国香槟酒，我觉这味道还不坏。我之所以有“幸而”这两个字是因为在晚餐时说一句话都得喝一杯酒。这说来似乎有些语病。事实上，我们唯一谈话的方法是通过干杯的形式。这种谈话的方式似乎颇为麻烦，但是假如你的酒量很好的话，那会变得很有趣，很好玩的。因此，假如你想谈到关于天气这样一个乏味的题目，你得说：

“我提议为这美丽而晴朗的天气而干杯！”于是你得站起来把杯子举起来，而每个人都得照样站起来，大家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这简直成了一种公式化的制度。而这种方式也同样可以适用到政治方面：“我提议干杯，”一个苏联人曾这么叫道，“为你们将来租借物资的交付，而我们相信这些物资在将来也一定会如期交付，绝不迟到，正如往常一样！”大家都站起来，喝干杯中的酒，又坐下来。在这种情形之下，伏特加可能变成你最坏的朋友。可是我注意到斯大林在晚餐时间始终喝着伏特加，他每次从旁边自己独用的瓶子中把酒满满地斟在他的杯子里。瓶子里装的绝不是水，因为有一次他拿着那瓶子走到我的面前，为我斟酒。任何一种酒都行，只要那烧酒不超过一百标准度，可是这种强烈的伏特加我却无论如何不敢领教。那天晚上，我始终只喝香槟酒，感觉美国的荣誉已经受到威胁了。

菜一道接一道地上来，多得无从计数。关于俄国的晚餐中菜目之繁多我有我独特的见解，菜多的原因是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来吃菜，你差不多每分钟都得站起来，说几句……不，我的意思是干杯。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霍浦金斯站起来向主人道歉，先行退席。他在晚餐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有些不舒适，屡次的干杯以后，更觉得支持不住了。这是美国方面的第一次脱逃，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有了些兴奋的神情。我们其余的人们仍留在我们酒杯旁的岗位上。

在晚餐快要完毕的时候，斯大林站起来提议他的不知第几次的干杯，最初我预备计算一下干杯的次数，可是后来干杯之多使我自己都弄不清楚了，这次干杯的题目是关于纳粹的战犯。他所讲的详细的字句我没法记得了，不过大体的意思是：“我提议大家干杯，为了我们将来对纳粹战犯的最迅速的审判，在枪决队之前的判决。我希望我们以一致的行动把我们俘虏来的战犯尽快地集中起来，然后把他们一起枪决，他们的数目最少必须凑足五万人。”

像闪电一样快的丘吉尔站了起来，（丘吉尔那天晚上始终以他心爱的白兰地酒来干杯的，他每晚不断的喝白兰地酒当补品的习惯应该使他很适合于这种俄国式的谈话。可是那天晚上即使是像他那样惊人的大酒鬼也不免觉得说话时舌头有些大了。）他的脸和脖子全红了。

“这一类的态度，”他叫道，“是完全违反我们英国人的裁判观念的！英国人永远不会赞成这种大规模的屠杀。我借这个机会来声明我坚决主张对于任何一个人，不论是纳粹与否，我们绝不能以对付全体的方法在枪决队之前把他们处决。即使这个人有许多对他不利的既知的事实与确实的证据，我们还是必须通过合法的公审制度来裁判他！”

我看了斯大林一眼，他似乎觉得有些忍不住要笑出来，可是他的脸色还是保持着庄重的神情，只不过是他的眼睛中闪耀着灵活的光彩，接受了丘吉尔的挑衅，以丘吉尔为对象，很温和地刺戳他的论点，好像是丝毫不在乎丘吉尔已经完全在冒火了。最后，斯大林回过头来问我父亲的意见。父亲始终忍住他的微笑，可是这时候也觉得双方恶感的成分已经开始强烈起来，而他认为必须以一些诙谐与幽默来缓和一下这紧张的气氛。

“象往常一样，”他说，“这一次的争辩似乎又应该由我来仲裁。很明显地，在你，斯大林先生，与我的好朋友丘吉尔先生之间必须找出一种妥协的方法来。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与其说总共枪决五万个纳粹战犯，我们不如把数目减少一点，说四万九千五百个好不好？”

美国人和苏联人都笑了。英国人，模仿他们开始狂怒的总理大臣，都一言不发地板起脸孔坐着。斯大林似乎占了上风，以我父亲提出的妥协的数目为主题，追问其他每个人的意见以及他们认为可以同意的数目，英国人都很小心，他们说这个题目应该、并且值得好好地研究一番。在另一方面，美国人则采取比较诙谐与轻松的态度。管他呢，干了再说。我们离德国与纳粹的征服还不知有多远，有多久呢。我希望斯大林能够满足于这些早先的答复，而在轮到我以前改变一下他的话题，可是他是一个固执的，有始有终的人。他终于问到我的头上了。我多少有些勉强而不稳定地站了起来。

“这个，”我深深地呼一口气，想通过香槟酒的泡沫敏捷地激发我的思想，“这个问题整个儿就有些太像学院中的论调了。瞧，当我们的军队开始从西方推进，而你们的军队从东方压过来，在我们的夹攻之下，这整个问题不就自然解决了吗？俄国、美国与英国的士兵将在战场上把这五万人的问题给解决个干净，而我希望不仅是这五万个战犯，还有成千成万的其他纳粹们也将遭遇同样的命运。”于是我预备坐下。

可是斯大林满面都是快乐的笑容。他绕着桌子走了过来，伸出他的手臂来抱住我的肩膀。这是一个再好没有的回答！应该干杯祝我健康！我心里充满着欢喜，预备喝干我杯中的酒（按照我国的习惯，当旁人提议为某一个人的健康而干杯的时候，这个人自己也该陪着喝酒）忽然间我看见有人伸出他愤怒的手指。就在我鼻前挥动着。

“你是不是想破坏盟国间的关系？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怎么居然敢说出这种话来？”那是丘吉尔，他满脸都是怒气，一点儿也不假。突然间发现丘吉尔与斯大林两个人就在我旁边争吵起来，我不免感到有些恐慌，觉得自己活像是在一个庆祝茶会中被海脱与三月兔所包围住的奇乡漫游记中的阿丽思，我坐了下来，一语不发，僵直在不安与担忧的心情中。

幸而这个晚餐会不多一会儿就散了，我跟着我父亲回到他的卧室中，向他谢罪。总之，我破坏了盟国之间的关系！

父亲大声地笑了起来。“不准再去想这个问题了，”他坚持着说。“你一点也没有说错话。你并且说得很好。因为每个人都不愿意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丘吉尔发起脾气来了。斯老伯伯……只是一味地刺他，挖苦他，因此无论谁说什么话都会使他不快，得

罪他，尤其是假如谁说的话使斯大林喜欢，用不着担心的，伊利奥。”

“因为你知道……我是绝对不愿意……”

“不要再去想这个问题了，”父亲说，他又大声地笑了起来。

“丘吉尔明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就会记掉这一切的。”

可是我并不觉得他后来忘记这一件事。当我后来驻扎在英国的许多个月中，他就从不曾再请我到他的别墅中去住一夜。显然丘吉尔先生是永远不肯忘记的。

在那一个事件以后，我更佩服父亲的能力了，他居然能始终设法使这两个人的思想凑合在一个建设性的、大致相同的方向之上。他的这种工作我是永远不敢希冀的。

第二天是丘吉尔的生日——他的六十九岁的生日。晚上英国大使馆要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宴会。因此，父亲一早就在查看那些送到苏联大使馆的商品，预备挑选出一两件适当的礼物送给丘吉尔。我们的波斯湾总司令孔诺莱少将设法弄来了一大堆波斯的土产品，从许多刀、剑与地毯里，父亲捡了一个颇有古董价值的古碗。接着他就回到他的住室中去接见穆罕默特·莱阐·派莱维，年青的波斯王，他是来作礼节性拜访的。陪他一起来的是他的总理大臣，外务大臣与皇家枢密大臣胡赛思·阿拉。我听说这位年青的国王是个很爱玩的青年。可是这一次他却显得非常恳切，严肃而热诚。他带来了一件礼物，由父亲代我母亲收下，是一条非常漂亮的地毯。不久，他们就抛弃这些公文上的礼节，坐下来很随便地谈了起来。

每逢这种场合，父亲总是很有兴趣地想多知道一些关于这个国家的事情，阐述一些足以帮助解决这个国家中许多问题的见解。他与这些伊朗的大臣们讨论形成这个国家大部分领土荒瘠的沙漠。他们告诉父亲，在好多世纪以前，他们的国土是怎么样密布着树木，而后来怎么样变成了一片沙土的盆地。这是我父亲熟悉的一个问题。他带着感情很热烈地谈到一个巨大的植树计划，接着又把谈话的中心转移到这个国土中大多数的人民贫苦的境况。他又把这两个话题结合在一起。最后他的客人们向他指明英国在伊朗的油井与矿藏方面所掌握的经济权。父亲很同情地点点头，并且同意必须采取新的步骤来保护伊朗的天然资源。而当他们走了以后，父亲把我叫到跟前。

“我想请你为我办一件事，伊利奥。你给我去找赫尔利来，并且告诉他开始草拟一部备忘录底稿，保障伊朗的独立与关于它经济权益的自决权。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接见他，不过你留心着，给我找出个时间来，看我闲着的时候，把他带进来见我。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和他多谈谈。”

我没法在午饭以前找到赫尔利将军，午饭的时候，父亲是主人，招待斯大林，丘吉尔以及他们各自的翻译。当他们走了以后，我把赫尔利带进父亲的房间，谈了几分钟。父亲向他解释他需要的是什么，赫尔利简短他说他已经懂得他的意思了。

“我们十分需要像他这样的人，”当他走了以后，父亲批评说。“我希望你能在他旁边多帮他一点忙。草拟一份美英苏协定，保障伊朗的宗主权与政治独立……这正可以表示我们究竟能干些什么，而可以作为将来的一个好例子。我希望我能多有一些像赫尔利这样的人物，我可以放心把事情交给他们办理。国务院里的那些家伙，那些所谓职业外交家们……我差不多时常都在怀疑他们究竟是靠得住，还是靠不住。”

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参谋长们的最后一次会议定在当天下午四点钟举行，父亲、丘吉尔与斯大林都出席，当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在外面阳台上站了几分钟，从这个阳台上，可以看到那间中间放着大圆桌的会议室，在阳台的周围，俄国的警卫军官们不断地来回巡视着，沉静而富于警戒心。下面，在我的眼前，是我们的团结努力与集体力量的明证，参加上次全体会议的那

同样的十二个美国人，十一个英国人与五个苏联人在安静而有力地谈着，极力使他们各人的论点能够接近，以求获得最后的协定。

当他们在六点半分散会以后，我又回到父亲的跟前，他预备在去参加丘吉尔的生日宴会以前，略为休憩一下。

“总算有了最后的决定”父亲很快乐地说。“并且，”他又很苦涩地加了一句，“可以说是第四次了，现在进攻西欧的计划总算确定了，连日期也定了。”

“明年春天？”我问他。

“五月一号，这对于苏联人是一个好日子了，那是他们的大日子，你知道。”父亲现在觉得完全放心了，因为他所希望的计划及最后决定已经达到，而盟国的集体总攻击的规模与时间也终于决定了。只有总指挥人选的问题还没有确定，可是父亲与丘吉尔答应斯大林这一项最后的细目也将在最近不久的将来决定，他们的意思是说在两星期之内，可能的话，将在他们第二次离开开罗之前决定。

“同时，我们亦同意从地中海方向发动一场进攻战。”父亲说。

“结果还是要通过巴尔干？”我诧异地问。

“不，通过法国的南部。各方面的攻击都要同时发动，从西方，从南方，苏联则从东方。我还是认为在1944年的年底可以看到欧洲战争的结束。假如我们从各方面同时配合来一个总攻，我们谁都不相信纳粹能够抵挡得住，最多9个月之内他们是非垮台不可的。”

八点过后不久，父亲穿起夜礼服，手里拿着那只预备送给丘吉尔作生日礼物的波斯古碗，从苏联大使馆前往英国大使馆。夜晚的空气十分凉爽，在包着头巾的印度士兵的保卫之下，我们绕过飘满百合花瓣的水池，不久就到达英国大使馆。这次的宴会是在德黑兰期间最盛大的一次社交集会，地点是在英国大使馆的接待室内，在一大堆显赫的人物之中，我发现雷道尔夫·丘吉尔也出现在他父亲的侍从之中。我们向丘吉尔道贺他的诞辰，他那晚一脸兴高彩烈的神气，闪耀着快乐的光辉，不断地微笑，抽着他的雪茄。父亲赠给他那只古碗，并且向他说：“愿我们长久在一起。”空气中回荡着盛满鸡尾酒的玻璃杯相碰的响声以及友好的谈话声。不久斯大林到了，和他一起来的是莫洛托夫和伏洛希罗夫，在后面则跟着他的翻译贝莱兹珂夫。他喝了两杯鸡尾酒后就全体走进餐厅，开始晚餐。跟在丘吉尔、父亲与斯大林后面的一共是三十位元帅、将军、海军提督、大使、部长、外交家以及次要的官员。还有那次会议中唯一的贵妇人撒拉·奥利佛。

关于昨晚的晚餐会，父亲后来曾经带着玩笑的口吻说晚餐时大家一共干杯了三百六十五次，为一年中的每一天干杯一次。在丘吉尔的生日宴会上，大家又采用了俄国的习惯，每个人为其他一个人干杯，干杯次数之多又使我无法作正确的统计。不过我记得晚餐中大部分时间我们是站着的。我记得斯大林与每一个被干杯的人碰杯时快乐的习惯，我记得好几次干杯的祝词。

斯大林：“为我的战友丘吉尔！”接着是，“为我的战友罗斯福！”

丘吉尔：“伟大的斯大林！”与“罗斯福大总统——我的好友！”

而父亲：“为我们的团结——战争与和平！”

每次干杯我们都得站起来，而有几次我们站起来以后，干脆就不坐下去了，站着与旁边的人谈话。我记得有一次在两次干杯之间，我听雷道尔夫·丘吉尔发表他的高论，内容似乎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我记不起他说些什么。最后，

当友谊与欢乐之神在向我们点头的时候，勃鲁克将军突然地站了起来，叙述英国人民怎样在战争中比其他的人民遭受到更大的苦难，更多的牺牲，他们对战争以及胜利也有比其他国家更多的贡献。这时候我看到一丝愤怒的阴影掠过斯大林的脸上。我觉得似乎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被激怒了，当勃鲁克将军讲完了，他差不多跟着就站了起来。

“我要告诉你们，从苏联的观点看，大总统与美国对战争的胜利有伟大的贡献。在这次战争中最最重要的是机器，美国已经用事实证明了它能够每月生产八千到一万架飞机。英国每个月只能生产三千架，而主要的只是重轰炸机。因此，美国是一个机器的国家。假如没有租借法案使我们能使用这些机器，我们会失败的。”父亲站起来，对巨大的红军表示敬意，说他们成功地使用了这些机器，并且，当我吃这顿晚饭的时候，他们正在一步步地把纳粹的机器赶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中。

我决定在第二天离开德黑兰，飞回我在突尼斯的防地。在我离开之前，我和父亲与赫尔利在一起待了一会儿，校阅赫尔利在我无关紧要的帮助之下所草拟的一部关于伊朗的三国宣言。假如英苏两国对于里面的条件能够协调，这个协定将于当天的下午签字。父亲研究了一下这协定的草稿，点头表示赞可，然后抬起头来望着赫尔利。

“你还有一颗星呢？”他说。

“总统先生，我不懂您的意思。”赫尔利惊讶地问。

“你的另外一颗星，”父亲重复地说。“你已经晋级了，国会已经通过，难道还没有人通知你吗？你现在是少将了！”

在午饭以前，我向父亲道别。他原计划在德黑兰住到星期五，但据气象专家们的报告，目前正有一股寒流通过开罗，而这寒流很可能在星期五左右漫布到这一带的山岳中。因此父亲要求英苏两国改动他们的会议计划，使他们能够当天晚上就走。假如可能的话，他希望在他回到开罗之前能够至少访问两个我们在伊朗的军事营地。他告诉我当天午饭之后他得与丘吉尔和斯大林作差不多整整十小时的政治讨论。那将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尤其是在二十一天的旅行与会议之后，他已经流露出疲乏的征象。

“我不知道我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在开罗再会到你，爸，”我说。“或许即使我想来看你，也办不到了。”

“想办法到开罗去一下，即使一两天也行。”

“假如我不去的话，我恐怕可以在你归国的途中在突尼斯见到你。那么这不过是暂时的分别，希望马上就可以再看到你。”

格莱与克莱姆上士在机场等着我，当天晚上我们到达开罗，第二天晚上回到了突尼斯。

总统旅行日志中的记载：

父亲在他所预言的整整十个小时的讨论之后，于星期三晚上十点三十分离开德黑兰，到埃尔勃鲁士山脚下我们在阿密拉巴特的营地去过夜。第二天，对当地军医院中的病兵员营地中的工作人员作下列的即席讲演：

“在以往的四天之内，我和斯大林元帅与丘吉尔总理举行多次会议——非常成功的会议。我们议定了三国军事合作的计划，希望尽量迅速地获得最后胜利，而我相信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

“会议的另一个目的是讨论战后的世界局势，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计划一个新的世界，使战争不再是必要的。在这一方面我们也有了很大的进

展……”

“因此我现在是在归国的途中。我希望我能够把你们全体都带回去……”

他的飞机在巴格达低飞绕了个圈子，星期四下午三点以后他回到开罗柯克大使的别墅中。那天早晨，关于第一次开罗会议的政府公报正式发表。

第八章 罗斯福：马歇尔不能走

艾森豪威尔不愿回华盛顿去坐办公室

罗斯福：不会“永久”没有战争

罗斯福告诉儿子：艾森豪威尔是欧洲战区盟军总司令

我离开德黑兰回到突尼斯去的任务是撤除我们在拉玛萨的后方司令部，而向北迁移到意大利去。我的部队中二千八百人的最后一批在周末动身出发，因此我得以分出身来再度飞回开罗作一次简短的访问。我知道联合参谋长会议于四五天前、我父亲从德黑兰回来以后即刻重新举行。而我也知道父亲和丘吉尔计划邀请土耳其总统、伊斯墨脱·伊诺奴到开罗来商谈。

在突尼斯，我得到了一个与艾森豪威尔将军作简短谈话的机会，他还是在担忧着他可能被派到华盛顿总部去做办公厅的工作。关于 OVERLORD 的总指挥人选的最后决定，他和旁人一样地无知。OVERLORD 这部作战计划是确实被决定了，而苏联方面已经与我们采取同一步骤，反对在地中海战区推动新的战事，并且也不赞成把土耳其牵入战争，关于这两点我当时能够比较有把握地告诉他。

12月5日，星期天的早晨，我起飞向开罗出发，格莱与我同行，在当天傍晚我们又降落在开罗空军总部的机场上。我知道我父亲一定还是住在老地方，因此下飞机后我立刻驾车到柯克大使的别墅。一进门我便碰到鲍梯格，他告诉我丘吉尔与父亲之间有过一度很有趣的外交上的竞争，他们两个人都派了飞机到土耳其的亚达纳去接伊诺奴总统到开罗来。鲍梯格是我父亲的专使，而他胜利了。土耳其总统之所以不坐英国飞机，而坐美国军用飞机到开罗来究竟有什么重要性似乎没人能讲得出来，但是鲍梯格却因此感觉到十分得意而次喜。

我去看父亲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看侦探小说。他忙碌了一整天，先参加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然后与伊诺奴、丘吉尔与他们的顾问作了两小时的谈话，最后又出席美国联合参谋长的会议。前一晚他为伊诺奴举行了一个晚餐会。那个星期日晚上，丘吉尔也预备举行一个同样的宴会，而父亲也将去参加。现在他正在休息。可是看到我去了以后，他把书放下来和我聊天。他告诉我他原计划在星期日深夜离开开罗，可是还有许多未了的公事，使他不得不在开罗住到星期二上午。

“我真想回家了，”他说，大声地笑了起来。“离开家还只不到一个月！我真应该为那些自从珍珠港事件后就不曾回过家的士兵们想一想。”

“可是看来真不像只有一个月。”

“是的，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尤其是最后的一个星期。”

“我问起他在德黑兰最后一天的事情。”

“你看到我们三方同意的那张公报没有？”他问我，我摇头表示没有看过，于是他向桌子上的一堆纸指了指。最上面的几张是那公报的副本，我拿起来很快地读了一遍，后来父亲陆续发表他的意见，我则重新慢慢地浏览着。他说那里面主要是他所说的话，而他故意不采用那些通常的，拘谨的外交字句；“……驱逐战争，使我们好多代不再受它的威胁，”我一面用手指着纸上的这些字句，一面大声地读出来。“好多代，”我说。“为什么不用‘永久’这两个字呢？”

“在我们这两代中已经有了两次战争，”父亲回答我。“在以往的 25

年之中，世界的人民不知听到了多少次‘永久’和平的诺言。这一次在德黑兰我们这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致同意，以更聪明的方法来解决将来我们之间的不和，我们也就因此统一起我们的外交政策，以保障我们好多代之中不再有战争。那就是我们从中午一直到晚上十点钟谈论的主题，怎么样统一我们三国的政策，怎么样为全世界一般的安全而联结起我们单独的国家利益。”

“在会议休息时，我与斯老伯伯谈了一会儿，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很舒服地伸了个懒腰，叹了口气，似乎预备放弃这个话题。显然地，在这样一个重要关头，我是绝不会让他停嘴不讲下去的，而他从我脸上看出了我的这一种神情，于是他又接了下去：“还有好些关于远东局势的其他的问题我想跟他谈一下……你也在哪儿呀，是不是，当我们开始谈到远东问题的时候？”

“第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

“对了。我们，”他打了个呵欠，停顿了一下。“我们还有好多事情必须同意，一旦他答应了参加对日战争，我就……”

“什么？”

“当然。他谈到了太平洋的战事……啊，那个时候你一定也还在德黑兰呀。”

“可是，这么了不得的一个消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他笑了一下。“象纹身的女子在结婚之夜所说的，你自己没问我呀。”

“他们什么时候参加？还有多久？”

“喔，总之还有好几个月呢！我想他愿意对日参战并且开始在远东的战斗无非是想使我们决定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假如我们能答应在五月一日发动西欧进攻战，他愿意在他的主力部队调到西伯利亚之后即刻对日作战。可是，从军事观点来看，我们觉得苏联应该以全力在东战场对付希特勒。在希特勒被打败后，他们打日本的时间还充裕得很呢。”

这惊人的消息使我哑口无言，半晌说不出话来。

“因此，”父亲接下去说，“他同意只要他通过那儿唯一的铁路把给养与部队调到西伯利亚去以后就立刻对日本宣战。他也提到了时间问题，打败希特勒以后六个月。”

“由于这种种的关系，我有好多问题必须和他亲自谈一下，关于战后的中国，中国的共产党等等。我不能当着丘吉尔的面谈这些问题，因为很多问题会牵扯到英国在香港、上海、广州等地的治外法权……我告诉他假如我们能支持他反对英国的那些在华特权的话，蒋答应我组织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我告诉他蒋很担心苏联将来在满洲的行动……不过我想他现在总可以多少放心一点了。斯大林同意满洲应该属于中国，并且愿意帮助我们反对英国的那些特权……现在赫尔利已经到莫斯科去继续这一方面的谈判了。”

这使我想到我曾经为那个关于伊朗未来的三国协定的草拟与谈判化了点小气力。我问我父亲那个协定最后是否签了字。

“喔，是的，签字了，封了起来，并且交给了伊朗政府。我还得谢谢你的帮助。那个赫尔利……”父亲带着回忆的神情说。“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假如说有一个人能够清理中国国内政治的纠纷，那就是他。你知道，伊利奥，”他边说边掀起被窝预备坐起来，“像赫尔利这一类的人物是非常可贵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忠心耿耿的。我可以交给赫尔利办许多我不敢交给国务院中任何人办的事，因为我能够完全信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想到把我父亲牵进了一种他后来不得不设法脱身的境地中那些国务院的人们。

父亲说：“你知道，好多次国务院的人们都设法想把人家给我的电报信件隐藏起来，故意耽误或是搁起来，因为他们认为有几位这些职业外交家与我的想法不同。他们应该替丘吉尔工作。事实上，有很多次，他们确是如此。不要去想他们了，他们全都认为美国实施外交政策的方法是先探明英国在干些什么，然后学他们的样。这与他们的政见没有关系，决不是民主党与共和党的问题，”父亲又带着些温怒的感情说：“据我所知，赫尔利以及其他为我工作的六七位都是彻头彻尾的共和党。可是他们知道的国家是在战争中，而他们都迫切地想尽自己所能为国家做些事，于是他们就那么做了。”亚瑟走了进来，帮我父亲穿衣服，“六年以前，”父亲说，“人家叫我肃清那个国务院。我们的国务院活像是英国的外交部。他们外交部中有一个常务次长。不论他的政府是保守党也好，工党也好，自由党也好，他永远是常务次长。政府的变换与他的职位毫无关系，他是常务的，我们的国务院就是如此，因此，我们有像赫尔利这样的人物，而他们所做的反比国务院的人们成倍地可贵。赫尔利唯一的缺点是我们必须先告诉他应该做些什么。假如我们告诉了他，他就会去做。而他会忠实地、好好地做。他是绝对愿意这样做的。”他停住了，听到他自己激昂起来的声音而笑了。“喂，”他说，“我是预备休息的，完全是你引我想到国务院中的那些穿细条裤子的孩子们的。”

我大声地笑了起来，他问我为什么不换衣服一起去吃饭。我告诉他我并没有被邀请，而即使我被邀请，我也不预备去。“我实在太累了，爸。这几天来我也工作得非常辛苦，昨晚我通宵没睡，我预备就在这儿随便吃点东西就去睡。”

他很羡慕地望着我。“那么你明天还在这里？”

“是的，就是走也得到四五点钟。”

第二天早晨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关于土耳其参战的问题已经有了最后的决定，反对土耳其参战。

“从某一点意义上来看，我猜这是丘吉尔最后一次的努力，想迫使盟国在南欧从地中海发动一个攻势。”他说。

我问他苏联对这件事表示了什么意思，他微笑了。

“他们与我完全同意，决不能把租借物资分给土耳其，斯大林说，假如这会耽误西战场战事的话。今天下午我和丘吉尔预备草拟一个声明来挽回一些土耳其的面子。报纸上为它们准备加入盟国对德宣战也毕竟热闹了快一个月了。”

我摇了摇头，想到斯大林与我父亲的圆满合作，想到我们之间显然共同的利益。而当我说出我的思想的时候，父亲批评说：

“最最重要的是向斯大林阐明美国与英国之联盟是并非想形成一个集团来对付苏联。我想我们已经永远把这个观念消除了。至少我希望是如此。战后唯一可以使我们的功败垂成的是假如这世界又分裂了，苏联与英美对立起来。这是我们目前的最大的工作，也将是我们明天的最大工作。把握住我们自己，使我们继续在苏联与英国之间作为中间人、仲裁者。”

因为我们在照着这条路线走，显然，美国便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我们的外交政策不再跟在英国的后面了。父亲很成功地在会议桌上表示我们是绝不受我们的说英文兄弟国所牵制的，我们的任务是在将来的联合国组织中，谐

和与汇合帝国思想的英国与共产党思想的苏联之间的相反意见。在实践上这是否能有什么好的效果尚需待历史来证明，可是我可以在这儿说，当我父亲从德黑兰回到开罗的时候，他充分地相信这样做一定能有圆满的效果，不仅能使这三个大国满意，并且也能使世界上的一切小国感到满足。

他离开我以后，就去批阅从华盛顿送来的公文信件，这工作占去了他整整一上午的时间。中午的时候，史迪威来看我父亲，那是他与史迪威的最后的一面。他们在一起谈了二十多分钟，在这时间内，史迪威对蒋委员长的政策表示不满，并且说蒋是在养精蓄锐，预备在战后以全力对付共产党。因为父亲心中在想他与蒋的协定，以及后来与斯大林的协定，很少说话，只劝史迪威尽他的力量把事情对付过去。很明显，父亲在与史迪威谈话的时候，心中是在想着别的事情。我个人的想法是他在心里盘算着先行粉碎纳粹的必要，而唯有在纳粹消灭之后，他才能容许他自己考虑怎么样去解决美国统帅部在中国所遭遇到的许多问题。

午饭的时候，丘吉尔与霍浦金斯是父亲仅有的宾客，他们谈话的范围是那份行将发表的关于土耳其总统访问的公报。公报的措词十分小心，因为他们顾虑到土耳其与苏联之间持续的敌对感情，而尤其是因为丘吉尔曾经希望土耳其在这次战争中加入盟国。我们离开餐桌以后，土耳其总统伊诺奴来了，不多一会儿，苏联驻土大使维诺格拉特夫代表斯大林来参加会谈。他们所草拟的公报中必须阐明土耳其政府的意见与美英苏三国政府完全协调，虽然土耳其正如一般眼光敏捷的新闻记者们所预测的，终究没有参战。这样的一个原则便产生了公报中的下列文句：“土耳其政府与美国合众国及苏维埃联邦间之巩固的友谊，”和“团结英国与土耳其之有力的联盟。”

公报草成以后，大家站起来握手说再会。父亲退到柯克别墅后门的位置上，向一队保护代表们开会的宪兵作即席训话。我在屋子里听到他说：

“……这一次当我们肃清敌人的时候，我们决心把他们彻底地肃清，使他们没有能力再开始另一个战争……即使我们必须暂时用武力来维持和平，我们也准备这样做的……”

他的声音带着快乐的调子，毫无问题经历了这好多天艰辛的会议与工作，他是乐观的。

他讲完话以后，因为我急着想在夜幕降落之前赶回到突尼斯去。我又得和他暂时告别了。我在他的身边待到麦克阿瑟的总参谋长苏石兰将军进来之前几分钟才走。在我和他单独在一起的那几分钟里，我知道他与丘吉尔为了另一个新的问题意见又分歧了。他谈起这一点是因为我在无意之中提到我在突尼斯见到艾森豪威尔，并且告诉他我说不定在第二天上午又可以见到他。

父亲说：“代我问他一声好，他不久就得担任起一件更艰巨的新任务。可怜的家伙，我一点也不羡慕他。”

“可怜的艾森豪威尔，”我想，他可能还是得调回华盛顿去坐办公厅。

“这是不是公事，爸？假如我看到他或是勃乞的时候能不能告诉他？”

“这事还没有最后决定，伊利奥。可是很明显地丘吉尔是决不赞成由马歇尔来接收的。马歇尔……并不是因为他关于军事问题与丘吉尔争论得太多了，而是因为他赢的次数太多了。这对于马歇尔也将是一个很大的失望，我相信。”

我一下子猜不出我父亲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艾森豪威尔不会回到华盛顿去的？”

“从目前的情形看来，有一件从来没有人担任过的最最重大的野战任务要他去接受。他回到华盛顿去干什么？”

在我到空军总部的机场去预备起飞回突尼斯的途中，我想到了任命艾森豪威尔指挥 OVERLORD 战役的决定，这任命现在看来是很可能会发表的了。当然，这对艾森豪威尔将是一个好消息，可是我却想到马歇尔。我从父亲那儿听到的一切，从沃根基开始一直到这次会议中我所听到的，从全面战争的指导下，很显明马歇尔的素质与才能是很特殊的，使他成为一个最好的统帅。不论是在参谋本部或是在战场上，他有超越常人的优秀的才能与修养来统率士兵，来领导战争，领导会议。而使他十分失望的是他似乎也具有了一种素质使他变成了丘吉尔的敌人。我记得父亲在德黑兰告诉我马歇尔是能够执拗地与丘吉尔争辩，与丘吉尔对抗的唯一的美国将领。可是，我自己记得，能够始终不屈不挠地与丘吉尔在一起工作的这种才能实在可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素质，而这种素质，艾森豪威尔也曾经屡次表露过。在任何以英国为基地的进攻战中，这一种素质实在是最最重要不过的。

第二天下午，当父亲的飞机在突尼斯的埃尔亚奥依纳降落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将军、史巴兹将军、勃乞和我都在机场等着接他与他的随员。在我们坐着汽车从机场到卡太基“白宫”的途中，他向艾森豪威尔将军与我兴高彩烈地谈说他当天的飞行。驾驶他的飞机的勃拉恩少校沿着海岸飞行，飞过纳粹在蒙高茂莱之前退却的路线，父亲清晰地看到了一连串的战场，他从飞机中看到散布在一千多英里的沙漠中的纳粹北非兵团的飞机，坦克与卡车的遗骸。埃尔阿拉美恩之后是托布鲁克，之后是贝加齐、的黎波里和斯发克司。父亲兴奋得不得了，好像是他亲自指挥了英国的第八军似的。

在父亲到达卡太基之前的几个钟点内，我在忙碌着整顿晚饭时的伙食。我们是在父亲的别墅中吃的晚饭，可是饭菜却全是士兵式的，不过我们多了两个侍者而已。这两个侍者是意大利俘虏。晚饭是庆祝我的部队中一位军官、奥克拉霍马市的大卫·勃鲁克斯之晋升为少校的。我怀疑是否有其他的年青军官有过这样的贵宾在场庆祝他的晋级的。除开海陆空军总司令之外，还有五位将军，包括着盟军总司令与地中海美国空军总司令、三位海军提督，李海、麦金泰与勃朗。我怀疑父亲随员中的密探们对我们的意大利侍者有些不放心的，在晚餐的过程中，他们的眼睛没有间歇地钉住这两个不幸者的后背。可是他们两个却并没有想下毒药毒死任何人，是因为他们被允许与一个国家的元首处在同一的房间中而感到惊讶。晚餐以后，他们颤抖着与父亲握手。后来，他们还是和晚餐时一样地睁大着惊异的眼睛，向我表白说他们认为这样地接近墨索里尼或是维克多·爱麦虞限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在战前的意大利他们都会被视为国家最危险的敌人。

晚餐以后，我从父亲那里知道英美方面已经作了最后决定，将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盟军进攻法国的总指挥。父亲说他的正式通知将由马歇尔发出，而马歇尔目前还在开罗，在正式通知尚未到达以前，绝不可以把这个消息先行透露给艾森豪威尔。父亲那晚是十分疲乏了，差不多已经到了他精力的限度。可是第二天他还得作一次视察旅行。事实上，他还想把他旅行的范围从计划中的马耳他与西西里扩展到意大利。可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又像上次一样坚决地加以阻止，不肯负任何责任。

父亲固然已经十分疲倦了，可是他的神情之中还流露出一种恬静的欢愉。他知道自己在一个有限的使命之下完成了很多的事。

第二天早上，在我还没有醒以前他就起身了，坐着他的 C—54 飞机起飞赴马耳他（“在反复的空中炮火之下，马耳他屹然不动地站在那儿，在广阔和海洋之中孤单而毫无恐惧，它是黑暗之中的一点光明的火焰，迎接那已行将到来的清亮的日子的燎火”），然后再到西西里（在那儿克拉克将军得到他的 DSC 勋章，这使克拉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因为他最初并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命令他从意大利到西西里去）。四点半的时候父亲回到埃尔阿奥依纳，我又在机场接他。当天晚上我们在八点钟吃晚饭，餐桌上只有他的几个亲近僚属，李海、勃朗、麦金泰、华生和我。

在他第二天早晨起飞回国以前，我只想打听与我有切身关系的一个消息，可是他当然是无从告诉我。我想要知道史巴兹将军是否将与艾森豪威尔一起调到英国去，因为从这这个消息我可以知道我自己的部队是否有机会能参加那次进攻战。不幸地父亲所知道的只是关于比他仅次一级的人，而史巴兹的工作并不在他的这个情报范围之内。同时，在那个最后一晚，父亲所想谈论的只是他离国一个月之中所完成工作的基础。

“联合国……”在那最后一晚他以极大的满足对我说。“国内的人们，国会的议员，报纸的主笔都认为联合国之存在只是为了战争。对于这一个机构的一般的倾向是说我们被战争所迫，不得不团结，而因此我们便团结了。可是战争并不是使我们团结的真正力量。和平才是那真正的力量。在战争以后，那才是我能够确定联合国将是真正的联合国的时候！”

第二天一早六点钟起身，坐汽车到机场。父亲先乘飞机到达喀尔，在那儿他坐军舰伊奥瓦号启程回国过圣诞节。我则与后方司令部的最后一批官兵坐飞机向北到意大利的圣赛凡罗，在那儿我们将度过一个寒冷而泥泞的圣诞节，怀疑着我们是否将暂时停留在意大利，还是会很幸运地被派去参加那定于 1944 年 5 月 1 日发动的对纳粹本土的攻击战。

第九章 罗斯福：联合国不应成为反苏集团

苏联人热切希望开辟第二战场

1944 年，罗斯福衰势毕露

美国总统不想掩饰自己尖锐的怒气

我们的责任是创造一个真正的二十世纪的世界

希特勒亚顿突围战，美国人毫无准备

二战最后一个圣诞，罗斯福最后一个圣诞

签批儿子的晋升将军令，罗斯福踌躇再三

在开罗的最后一次会议以后，我在意大利度过的那几个星期中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发生。像每一个士兵那样谨慎、小心地从各个消息来源打听，想知道我们部队是否会调到英国去参加那计划中的作战。正当我接到一些消息说我们调到英国去的希望似乎比以往更为渺茫了的时候。根据军队的经验，这就是说希望比以往更浓厚了。我们听到了一种新的使人骚乱的谣言，说我们计划对邻近罗马的西海岸上的纳粹在意大利的防线举行总攻。这就是后来的安齐奥桥头堡，而当我听过了在埃及以及后来在伊朗举行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中所决定的各项战术以后，我很难能相信这个新的冒险会认真地被执行。

在我们正想为这个新的冒险作最后一分钟的准备的时候，我突然接到命令，叫我即刻向史巴兹将军在英国的总部报到。我到达那里以后，才知道我得担任起一种新的任务——改组与整顿第八（轰炸、战术）与第九（轻轰炸、战略）航空队中全部的美国空中侦察队。并且督导他们的活动以获取欧洲进攻战中必需的一切情报。我到达英国不久就听到了安齐奥的登陆战。几个星期后我得到一个机会见到艾森豪威尔将军，从他那儿我知道丘吉尔是怎样地坚持这一个计划，他为它取了一个暗号，叫 SHINGLE。而这个计划显然是他的最后一次——完全个人的，高压手段的努力，想强迫我们不从西方，而依然从南方进攻欧洲。

我们部队在 1 月 19 日参加到数目逐渐膨胀的驻英美军中，而我们即刻与英国皇家空军中的担任同样工作的英国军官们取得联系，并肩合作。因为我在前面曾经批判过某些英国的战争制造者，所以我想在这儿附加声明，从 1 月中旬到 D 日，从 D 日到纳粹投降的时间中，与我一起合作的那些英国皇家空军的军官们实在是一批才识俱佳的军人，他们熟悉他们的工作，而我想我们很难能够找到一些人比他们工作得更起劲，比他们更迫切地想尽早来获取战争的胜利。他们为他们的国家增加了很好的信誉，那次进攻战中我们所蒙受的牺牲之少的功劳实在大部分应该归功于他们。关于我们在欧洲军事的成功，他们有很大的功绩，我相信我的这句话是代表与这些英国皇家空军侦察专家们合作过的全体美国军官而说的。

1 月，2 月，3 月，而在 4 月中我们看到了在德黑兰所讨论的一部计划（英国与苏联，意大利与苏联之间的穿梭式的对德轰炸）行将实现的初步的有形的证据。一位苏联的将军来访问盟军总部，作了一些初步的商谈后就回去了。5 月中我接到命令，叫我陪伴安德生将军、柯底士将军以及第八航空队中的几位参谋到苏联去察看预备分配给我们使用的几个机场，并且与苏联当局解决穿梭式轰炸开始以前的许多细目。这实在是一个好消息，苏联方面居然同意这个穿梭式轰炸的计划，他们居然准备以战斗机保护我们的轰炸机，并且

允许我们作空中侦察摄影。当然是最后这一项工作使我得以参加那次旅行。

那一次飞行使我经过好些我所熟悉的地方：卡萨布兰卡、突尼斯、开罗、德黑兰（在那儿我们的飞机搭上了一位红军航空员，一位红军的无线电通讯员），最后一直到莫斯科。这是我战时两次访苏中的第一次。在那儿我们只住了一个多星期，因此我的印象当然是简略而零碎的，可是却非常清晰而生动。我还记得莫斯科广阔的林荫道，以及一些高级红军将领们招待我们的宴会，在那次宴会中我的位子被安排在两位苏联人之间，而我们差不多完全用手势来谈话；我记得那座克里姆林宫，我们到那儿去拜访莫洛托夫。克里姆林宫实在是太庞大了，连我们在华盛顿的白宫与之相比都显得太渺小了，它与我所见到的许多政府大厦完全不同，厅道中铺满了厚厚的红色地毯，套房中安置着舒适的家具；我记得那华丽宏伟的歌剧场，我们在那儿看李姆斯基——哥萨珂夫的、“白雪女郎”与我从前在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中所看过的同一演出相比较，它更为美满，而舞台的装置也更为辉煌；我也记得看歌剧的观众百分之九十是穿制服的，偶尔也有些穿着长袍的华贵的妇人。我曾经在莫斯科大饭店中与七位美国记者一起吃过晚饭，他们利用那短短的时间告诉我他们分别所在地区中的情形。像我们所吃的那顿晚饭要化费掉他们的发行人整整的七百美金，而一般苏联人的粮食配给只需五块美金一个月，政府的目的是想因此阻止一般人民到旅馆与饭店中去吃饭；一位有地位的军官，一位有名的舞剧明星，或是一位作家，科学家可以以5折或是2.5折来购买他或她的需要品；对于苏联人，全面战争就是真正的全面战争。

我记得我们坐着飞机去视察那些分配给我作穿梭式轰炸的机场，尤其是那个在波尔达伐的机场，在战前那个机场与我们在德克萨斯的雷道尔夫机场有同样的规模。而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还是一片瓦砾，保持着纳粹在退却中离开这个机场时的面目。就是在这个机场上我第一次看到红军人员的工作，而开始对他们克服困难与障碍的那种活力有了极大的崇敬。他们动员千百个从战斗队伍中退出来的人员，受过伤的士兵，做许多笨重的工作，建筑一个机场。这些工作在美国只要一打压滚机，一打推土机和二三十个地面工作人员就可以担负了。可是他们还是把那样艰巨的工作完成了，速度之快与成绩之佳使人惊异。苏联的妇女们也做着同样的工作，身体高大的亚美逊妇人毫不在乎地把五十加仑的汽油桶像玩具似地抛掷着。

从空中我们看到红军用来解决给养与运输问题的道路，因为缺乏硬面的道路他们的大卡车便时常开过旷野，而有时候他们的道路实在太泥泞了，于是他们便转入他们原先道路的两旁，深入草原地带达四五百码。供给苏联整个南部战场给养的是一条单轨的铁路。当我们的穿梭式轰炸开始的时候，我们坚持要由波斯湾把我们自己的一百度的航空汽油与炸弹通过这条铁道运过去，因此阻碍了他们自己的运输。可是他们还是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要求。

我们离开时候的印象是苏联人差不多全都像孩子似地热心盼望能与我们相处合作。固然我们也会碰到一个红军空军军官，硬说他实在太忙，非到夜晚十点钟以后才能接见我们，使我们不得不在邻近等着，寒冷冻僵了我们的脚踝骨。同时我们也碰到至少十几个红军军官表明他们对美国人，美国机器，以及美国工业效率的崇敬。戴维斯曾经向我们展示与苏联合作是怎么样简单的一件事。我们政府不赞成派戴维斯这样的人物来担任到苏联去代表我们的这一件重大的工作实在是一个最大的悲剧。

从莫斯科与苏联南部战场回到伦敦以后，我得到了一个松弛一下的机

会，使我得以暂时摆脱那近在眼前的进攻战所加在我双肩上的工作重担。那是在艾森豪威尔将军那儿的一晚桥牌会，那天晚上我与柯底士将军一组，对艾森豪威尔与他的武官勃乞。在艾森豪威尔的精湛的牌艺之下，我们惨败得不可言状。我特别记得那一晚，因为他们追紧着问起我们的苏联旅行，几乎把我们给问干了。苏联是怎么一个样子？他们的军队怎样？他们的飞机驾驶员如何？他们的纪律如何？他们对我们怎么想？他们对于苏联作战军官与一般士兵的态度似乎特别有兴趣，而对于在德黑兰与伦敦所碰到的苏联官员的态度则并不很重视。当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圆满地回答了他们的问话以后，我说：

“他们全体所最关心的还是第二战场。这将是他们对我们的最大的检验。假如这成为事实，那当然再好没有。假如不……”

“假如？”艾森豪威尔叫道。“这‘假如’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他上次在德黑兰父亲与丘吉尔的诺言以及那约定的日期，5月1日。

“我并不知道这些诺言，那次我不在场，可是我知道对法国的进攻战，苏联可以毋须为这一点而担心。”

D日，OVERLORD与那同时发动的苏联的攻势，V—1与V—2的飞弹轰炸，从“星条”报上我读到了敦巴敦橡树的会议。我很高兴地想到这三位巨头关于和平问题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团结。接到父亲的一封简短的信，告诉我那年9月他在魁北克与丘吉尔的会议，会议中所讨论的主要是关于对日战争的事项。1944年的夏秋，我日夜工作的对象只是在法国、德国与欧洲低地的上空的摄影侦察，这工作需要我以全部的精力去对付，并且是非常繁重的。因此当我接到命令，叫我带着技术的使命回国的时候，我的心情突然轻松起来了。这新的使命将使我暂去白宫工作，将使我再见到华盛顿，将使我与父亲和我的家族会晤。

我的妹妹安娜是我在白宫中所见到的第一个家属，她先告诉我当我见到父亲时我会发现的他最近的变化。可是我还免不了怔惊了一眼，主要地是因为我听到了很多人谈论在这最近完成的竞选运动中，他的健康是怎样地不佳。他看来似乎有些疲乏的样子，比以往消瘦了些，此外倒并没有什么太坏的征象。“你能期待些什么呢？”他向我伸出手来，当我利用他两个约会中间的空暇，溜进去作了一次短短的访问。“这些竞选旅行是实在累人的，可是我却会因此发福的！”

他看来是比以前老了，憔悴了，可是他的脸颊上却有些红润。他告诉我他希望能够离开白宫，或许是到温泉去住一两个星期，不过他大部分是确定要到海特公园我们的私宅去过圣诞节的。“你喜欢不喜欢这个计划？”他问我。

“当然我喜欢，不过我怎么能知道圣诞节我在什么地方呢？到那个时候，说不定我又回到英国去了，这必须看我的工作来决定。”我问他什么时候我能得到一个机会与他详细地谈谈，我想知道自从上次在非洲与他分手后一年来的时局。

“我才有好多话要问你呢，”他回答我，“我想要从你那儿知道关于战争的最直接的消息。”他看了看他桌上的日记本，用铅笔划掉了一行字，然后宣布他当天晚上可以见我，“晚饭以后。假如你没事，下午可以多读些报纸。我相信从那儿你可以知道我们的国家认为我们是已经怎样地接近胜利

了。”

我并没有向他提醒他一年前说我们可以在 1944 年年底击败纳粹的预言。可是我那天下午倒的确得到了一些空闲，读了一部分报纸与新闻杂志，而当天晚上我向他提到我所读的东西。“我知道你的意思，爸。他们在谈论战后的欧洲，谈论三巨头的团结是怎样地不够，为什么你不再召集一次三巨头会议。”

他点了点头。“我猜他们现在是渴望着一些足以给他们大大地评论一番的题目。很幸运这次战争总算是打胜了。”

我问他是否计划再举行一次三巨头会议。

“喔，总得举行一次的。我希望在总统授命仪式以后，我们能在一月下旬再会晤一次。事实上，问题倒不是时间，而是地点。斯大林希望这地点在苏联境界之内。”

“又是在苏联？”

“你知道，他的这一点要求我们是很难拒绝的。他在指挥红军，而红军正在向前推进。”

那第一个夜晚，他果真叫我多说话。他非常饥渴地听我关于战争的一切报导以及我们的作战情况。他留我在他的卧室坐到很晚，一句连一句地问了我许多问题，待他问完的时候，时间已经很迟了，使我没法转变谈话的目标而倒过来问他。

可是两三个早晨以后，我得到了机会；我到白宫去向一位将军报到，他派人通知说他当天太忙，要到第二天才能接见我。于是我即刻赶到白宫去，走进父亲的住室，希望在他还没有开始白天的工作以前见到他。他挥手叫我坐下。他正在翻阅一些公报，当日的晨报散乱的被丢在地板上。他继续读他的公报，时时发出惊叹的声音，表示不满。当他读完了，抬起头来的时候，我充满着好奇心，睁大眼睛看着他。

“希腊，”他说。“英国军队与那些最近四年来打纳粹的游击队开火。”他并不想掩饰他的怒气。关于这个事件，我在一张华盛顿的报纸上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很模糊、很不完整的故事。那完整的故事在最近的几个星期之内是不会被刊载出来的。“英国人居然敢这样做！”父亲叫道。“他们始终念念不忘过去，真不知道他们要搅到怎样的地步！”在他的旁边，咖啡在沸腾着。他看了一下，发现已经煮好了，给他自己倒了一杯，然后以邀请的眼光看了我一眼，“还够倒一杯的。”他说。

“好极了！”

“我绝不会觉得怎么希奇的，”他接下去说，“假如丘吉尔只是声明他在支持希腊的保皇党。那根本是他的性格。可是杀戳希腊的游击队！用英国的军队来干这个勾当！”

“说不定还是用美国租借法案的装备来干呢。”我提醒他。

“这个我必须查明白，父亲说。可是马上他又接着说，“不过，关于这件事我目前恐怕也很难做些什么。”

“发表一个公开声明？”

“责备英国吗？”他摇了一摇头。“现在不行，时间还早得很呢，我可以在 2 月中见到丘吉尔的时候亲自对他说。总之……”他的愁苦的表情突然消失了。

“总之什么？”

他突然地转换了话题。“你知道，差不多一年以前威廉女皇亲自到这儿来过。她到白宫来访问我。而我们开始长谈起来，”他微笑着说：“我得说，是我引她谈开头的，我设法使她谈到荷兰的殖民地，以及战后对于这些殖民地的措施。爪哇、婆罗洲以及全部的东印度群岛。我们把这个问题反复地谈了六个多钟头，是分两三个晚上谈的。我直爽地告诉她从日本的统治下解放这些殖民地的全是美国的军队。美国的陆军、海军与陆战队。我提到了菲律宾。”他带着回忆的神情微笑着。“伊利奥，她同意在战后她将以我们统治菲律宾的政策为她统治荷属东印度的标本。她答应我在战胜日本以后，她立刻宣布她的政府将首先赋与荷属东印度的人民以自治与平等的权利，使他们享有自治领导的地位。

“在东印度的政府成立以后，假如人民通过自由选举，决定他们希望能完全独立，那么荷兰政府将给予他们以完全的独立。就像我们允许菲律宾独立一样。

“那是她的诺言与答应履行的责任。那就是说荷兰将从英国的领导之下完全解脱。想一想那对斯大林的影响！那将使他明白西欧诸国在战后所能，并且所要完成的事业！”

我猜想英国在希腊的跋扈行动使他想起了他与威廉女皇的这些谈话。

“那是对的，”他说。“那是对的，那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现在立刻发布一个公开声明来责难英国并不是必要的。不仅是因为这个声明将要被纳粹们用来做他们的宣传资料。

“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将来绝对有办法用压力来使英国关于殖民地问题与我们采取同一的看法。那是一个整个的问题，荷属东印度、法属越南、印度、英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我们将来是可以把这个世界造成一个真正的二十世纪的世界的，你等着瞧吧！”

几分钟以前他的尖锐的愤怒已经完全平息，当他很热心地想到他将来的计划。使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完全不受英国外交部牵制，并且还要用压力使那个帝国承认进步的潮流。

很明显，他希望能够在计划中的下次三巨头会议中与他的同席者重新整理那环球的世界政策。

几天以后我离开华盛顿，去完成一件值得高兴的私事。12月3日那一天，在亚利桑那，我与费·爱沫逊举行婚礼。我期待最多在两三个星期以后，我便会被调回到ETO去的。可是恰好在12月16日之前，我得到了一个绝对不曾意料到的，来得恰到好处好处的休假，用比较精确的军语来说，我接到命令，要我暂时在国内服务，过了圣诞节以后再回到我的防地。这个命令于16日之前到达，而希特勒的亚顿突围战则是在16日发动的。当我在白宫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惊愕得几乎半天说不出话来。空中侦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收集必要的情报，使我们的野战司令官们得以警戒，并且有准备地对付敌人的意外的奇袭。而从送到五角大楼来的报告中以及后来发表的公报，我们知道那一次突围完全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奇袭，虽然还不致于使我们的裤子完全卸落，但却也使我们的裤带松掉了。我这么地想，这次突围表示，我的部队犯了一个很大的疏忽，而我的本能的反响是立刻向上峰请求允许我乘专机回到欧洲的盟军总部去查究毛病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我的上司的见解却是非常贤明的，他们认为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也就无法挽回，而我在场与否对于亚顿突围战的后果并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影响。因此留在华盛顿，远离我的

部队，我只得用想像来推测当时的情形。气候决不能是一种推辞，因为不论气候之好坏，摄影侦察是总该有些收获的。只是当我在华盛顿的临时工作结束，飞回到总部以后，我才发现我们的侦察并没有过失的地方，事实上关于敌人在亚顿后方的部队集中的情报我们早就收集齐全而呈报到总部去了，这些情报是被一位糊涂的二级参谋搁起来或是疏忽了。

在国内的最后几天是在海特公园与我的家属一起度过的，那是我与父亲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很奇怪，或许是由于太多的战争题材与事实，那个圣诞节反而变成了充满和平与安怡的时日，外面的世界似乎暂时与我们隔离开了，我们一家又团聚在一起了，正如我父亲一年前在开罗的感恩节时所说的，我们更密切地团结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长长的起居室中间的那张桌子被推了出去，房间的中央安置了装饰得很美丽的圣诞树，一堆堆的礼物等我们去拆开。每个人的礼物都分开堆在不同的椅子上。在圣诞节的那天晚上，父亲靠着壁炉坐到他常坐的那张摇椅上，打开了那本熟悉的书，而我们则在他的周围各人找地方坐下。我的地方则是在地板上，靠近壁炉的铁格。炉火很欢乐地发出爆裂的声音。父亲朗诵着我们大家熟悉的圣诞颂，很有节奏地升起又降落。我的思想毫无目的地飘游着，而不久就整个停滞了。接着，嚟！我觉得费的肘子碰到了我的肋骨，听到她的尖锐的低语在我耳边响着：“你在打呼！快坐好！”而我很惭愧地抬起头来看我父亲，他只是庄重地对我闪了下眼，而继续念下去。我忽然注意到他不知道为什么忘记了在他前面的下颚上装上那颗应有的假牙。而我的侄子，小弗兰克林的三岁的儿子克利斯也突然注意到这一点。他把身子凑上前去，以清晰的声音阻断了我父亲的朗诵：“爷爷，你掉了一个牙齿！”那是一个很简单，直接的声明，并非请求而也无需回答，因此父亲微笑了一下，又继续念下去。可是克利斯对于圣诞颂的兴趣已经完全没有有了。他不久就站了起来，走到父亲的跟前，把身子凑得更近，伸出他的手，用他的手指点在离父亲的嘴不到一寸的地方，坚决他说，“爷爷，你掉了一个牙齿，是不是你把它吞下去了？”

而这句话结束了那晚的圣诞颂的朗诵。“这个家庭中的竞争太多了，使我没法大声地念下去了。”父亲大笑起来，而把书大声地合上。

“明年，”我的妻说，“那将是一个和平的圣诞。而我们都要严肃地，一言不发地听你念。”

“明年，”母亲说，“明年我们一家人可以全部在国内一起过圣诞节了。”

在圣诞日大家打开了各自的礼物，把包装纸整理好以后，我走到房间角上父亲的写字桌前面，很小心地把他刚收到的心爱的礼物贴在他的集邮簿上。带着开玩笑的口气，我说有一天他的集邮中会多一种联合国的邮票的。“别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伊利奥，”他说，“并且我很快地就可以得到。”他把身子往后靠在椅背上，对我挥动着他的放大镜。“真奇怪，我自己心里也正在想到这一种邮票。说不定我可以在下个月的会议中把这个问题也放在议事中讨论。”他大声地笑了起来，“你想他们会不会怀疑我之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我外在的集邮动机？”

“那么会议确定要在下个月举行了？”

“完全确定了，我真希望它快些举行，工作的变换对我很有好处。”

“你是否还需要个侍从呢？”

他微笑着，“这要看你的上司的意见了，伊利奥，我希望没有什么问题。”

“我也这样希望。”

“可是即使有什么问题，我不久还可以看到你的。我很认真地在考虑明年暮春或是初夏的时候到英国去旅行一次。我想最好的办法是去告诉英国的人民与英国国会，大英帝国应该怎样地把它将来的希望寄托在联合国——全世界的联合国。而不应该把这希望寄托在大英帝国和英国鼓动其他国家所结成的反苏集团。”

我问他是否认为有这一种危险性。

他很严肃地回答我：“这恐怕是难免的”，“我们现在就应该计划和这一种倾向对抗。”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圣诞节不谈国事。”母亲这时也走到我的后面，很坚决地说，“我也正要说这一句话。我们大家都已经同意，今日不谈国事。”

费要回到好莱坞去，我把她送上了火车。两天以后，我向父亲、母亲和其他的家属告别。元旦我回到了我的指挥岗位上，立刻埋头于我的工作中。三个星期之后，从“星条”报上我读到父亲将举行一个很简单的总统任命典礼，我觉得很高兴，想到费也可以回到华盛顿参加这个典礼。可是，蹦！天塌了下来，我发现我自己被牵涉在对纳粹战争以外的其他许多战争中。

我不愿意在这里多费篇幅来记述那件有意中伤我的事件，因为这并没有多大用处。假如说费冒险地嫁入罗斯福的家庭中需要什么介绍的话，那么她已经得到了这些介绍。热烈的风在卡比托尔山上欢乐地吹着。陆军部的检察总监亲自到我的总部来，调查许多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正在闹得乱哄哄的时候，可以说是再凑巧没有，陆军部的推荐晋升将官人员的名单就在这时候呈到父亲的公文桌上等他批准，而在这张名单之中，由杜立特将军推荐，由史巴兹将军与艾森豪威尔将军批准，我的名字也在里面。

父亲对于这一类名单总把它当作例行公事，看一遍就签字批准的，可是费后来告诉我他那一次对着名单却迟疑不决起来，他想了一次，两次，三次，还是不能决定，按照他的惯例，他总是让他的儿子来自己对付他们的困难，他决不干预。可是那一次我猜他却居然允许他自己破例来操心一次。他告诉我的妻子他相信我是够资格晋升为将官的。最后他决定签字批准而把那张名单送到上议院去，一方面他写了封信告诉我一切经过并且向我解释他要上议院来决定我上司对我的推荐与信任是否得当。我用手指塞着我的耳孔而等待这件事情的后果。果真又是一次国会的调查。

可是我的恶星似乎还没有完全放过我。一月下旬霍浦金斯到达法国，他到巴黎的盟军总部来看我。我以感谢的心情回忆起他用婉转的方式向我透露出那个消息。他很随便地提到三巨头会议决定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他就是为这个会议到欧洲来的。他说父亲在他与我谈话的时候已经在航海的途中了，他坐的是军舰昆恩西号，有一队机动舰队一路保护着他。看到我正要提出那重要的问题，他立刻加快他的速度。他说，父亲很希望我再做他的侍从，可是他不愿意行文到陆军部去要求调动我。霍浦金斯说，父亲不愿意把陆军部置于进退两难的地步，因为很显明地卡比托尔山岗上的共和党们又会借这件事而闹得天翻地覆。

那是一个很大的失望。于是，换了一口气，霍浦金斯说父亲这一次把我的妹妹安娜带去。听到这个消息，我心情好了一点。我知道父亲喜欢有一个家属在他的身边，使他可以毫无顾虑地随便谈说，完全松弛，并且绝对信任。因此这次有安娜陪着他倒也很好。最后，我相信一部分是为了要安慰我这一

次失望起见，霍浦金斯叫我当晚陪他一起吃晚饭。他说，他想在他到马耳他去会见父亲以前跟我谈谈他腹中的一些心事。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发觉我对这个事也未免有些太小孩子气了，于是我赶忙振作起高兴的心情来。

当晚在他房间里吃晚饭的时候，霍浦金斯对我施展了他的特长。他是一位可爱而有趣的伴侣，充满了思想与诙谐，而我们很快活地在了起过了一晚上。他向我宣示他的预言，他早先已经与艾森豪威尔谈起过，说纳粹的抵抗将于7月中旬全部瓦解。我嘲笑他，并且与他打赌4月底以前纳粹就会完全败北。他告诉我丘吉尔又在暗暗地计划另一个南欧的进攻战，丘吉尔称之为阿得里亚海中的牵制战，以打破意大利的僵局。我们都知道这是丘吉尔的最后一次努力，想使盟军比红军先进入巴尔干，我们不禁相对地微笑了一下，霍浦金斯很有把握地宣布说美国的联合参谋长本部是绝不会容许丘吉尔为这个目的使用那些太平洋战区中所迫切需要的登陆艇的。

他说父亲相信这一次的克里米亚会议将是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次必要的三巨头会议。会议中的议事差不多完全是关于和平的机构，联合国的组织，以及欧亚各国内的管理与政府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假如我们事先没有好好的计划，将使我们将来在行政上感到空空的毫无头绪。

霍浦金斯又继续说，父亲坚决主张斯大林、丘吉尔与他对于和平的机构必须意见完全统一，使战胜国在战争停止以后立刻就开始学习他们自己以往的教训。他说，父亲很迫切地想确定在纳粹被打倒以后，我们负责管理的军事政府中的处于指导地位的官长们将不是以往商业界中的巨头，因为这些人物所关心的只是重新树立起德国的企业组合。

我很快活地吃完那一顿晚餐。霍浦金斯决定第二天启程赴罗马，在他到马耳他去与父亲会合以前他还须在梵谛冈有些公事要完成。我托他带了封信给父亲，谢谢他的关心，而回到我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因此，雅尔塔会议中便没有我的份了，而更重要的是我从此不再见到我的父亲了。

第十章 雅尔塔：罗斯福是三巨头的领袖

给战后世界一个历史定位

丘吉尔不喜欢雅尔塔

未来联合国的一票否决权，目的在于拯救和平

罗斯福：苏联香槟真好，战后我退休了，希里能成为在美代理商，发点小财

罗斯福：这场战争是一个全球战争，我们的责任是变为全球性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 1944 年底，德日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在欧洲，战火正从东西线向德国中心地区迅猛燃烧着，德国法西斯的寿命屈指可数。这时，德国统治集团试图与美英单独媾和，以便集中残余力量同苏军死拚到底，甚至幻想美英与苏联冲突起来，从中渔利。因此，随着战争的胜利进展，美英与苏联之间在欧洲地区的矛盾和互不信任越来越明显，迫切需要取得谅解。由于德国即将被彻底打败和欧战即将结束，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和怎样处理战后的欧洲事务，成为美苏英急待解决的问题。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尚在负隅顽抗。当时美英估计，要彻底打败日本，并迫使它无条件投降，还得苦战一年半的时间，可能还要付出 100 万人的死亡代价。因此，美英希望苏联早日对日本参战。所以，反法西斯联盟主要国家如何协同对日作战，也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商讨和解决上述重大国际问题，1945 年 2 月 4 日至 11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偕同他们的外长、参谋长和顾问们，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为时 8 天的会议，史称“克里米亚会议”，或“雅尔塔会议”。

美国大选胜利结束了。1945 年 1 月 20 日，罗斯福冒着刺骨的寒流宣誓就职。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次时间最短和最阴沉的就职仪式。他也许预感到自己活不了多久，因此坚持要他的 13 个孙子孙女都来华盛顿参加就职仪式。当时没有游行，也没有举行豪华的舞会。总统是在白宫的南门走廊而不是在国会举行宣誓。他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大衣，讲话还不到五分钟。他期望着即将同斯大林和丘吉尔举行会晤。在讲话中他谈到了他的指导原则。“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不能单独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我们的幸福取决于别国——遥远的国家的幸福。……我们认识到正如埃默森所说的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只有当朋友，才能交朋友。’”过了两天，他带着一个人数众多的参谋班子向雅尔塔出发了。

雅尔塔位于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是沙皇所喜欢的一个避暑胜地。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会，是斯大林一再表示不愿意离开苏联。尽管罗斯福在乘坐“昆西”号巡洋舰前往马耳他的途中得到了休息机会，到马耳他后又换乘自己的专机“圣牛”号飞往克里米亚，但这次旅行对罗斯福来说仍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不要再让我们犹豫不决了！”丘吉尔开玩笑说，“如果把所有可能举行高级国际会议的地点都编进一台计算机的程序里，然后指示计算机选择一个最糟糕的地点，它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雅尔塔。”雅尔塔周围的地区曾在德军退却时遭受掠夺，它的美丽的自然风光掩盖了原始状况。丘吉尔带去了大量的威士忌酒来抵抗流行的麻疹、伤寒、虱子和臭虫。美国海军的一个消毒小组不得不把罗斯福的住处消毒三次，然后才住进去。会场设在利瓦吉亚宫，那里有 50 个房间，但只有一个洗澡间。

雅尔塔的设备条件虽然是简陋的，但是苏联人尽量要他们的英美客人相信他们的接待是友好热情的。这是一个饱经战火、疮痍满目的地区，住所又如此有限，按照当时的记载，16位美国陆军上校只能挤在一间卧室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只参加了几次正式会议。他病得很重，雅尔塔的大宴会他一次都没有参加。

罗斯福和丘吉尔于2月3日，到达雅尔塔。斯大林及其一行于星期日清晨到达，下午4时，他和莫洛托夫前来拜会罗斯福。罗斯福向东道主为客人所作的种种舒适和方便的安排表示道谢之后说，在“昆西”号横渡大西洋的旅行当中，他们就美国人是不是会在苏联人进入柏林之前而先进入马尼拉一事多次打过赌。斯大林笑了起来，并说那些把赌注压在马尼拉的会赢。罗斯福谈到在克里米亚这里所看到的破坏情形。斯大林告诉他，同乌克兰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因为在克里米亚德国人受到翼侧包抄，因而没有时间实行原定的破坏计划，然而在乌克兰他们却以虐待狂式的心计和方法破坏一切。斯大林随即问起西线的情况，罗斯福告诉他，马歇尔上将随后要详细谈到那里的主要局势，但这时他能够说的是，预定在2月8日和12日各发动一次有限度的进攻，而英美部队的主要推进约在一个月左右开始。斯大林听了感到高兴，并表示希望盟国不久可以攻下鲁尔和萨尔，从而剥夺德国人所剩下的仅有的煤炭来源，因为苏军已经占领了西里西亚盆地。罗斯福说，随着同盟国两支部队从东西两方面逐渐接近，他认为有可能由艾森豪威尔同红军建立直接的联系，从而取得战术行动上的直接配合。

这次会见是在利瓦吉亚宫总统的书房里进行的。在5时前几分钟，他们移往大舞厅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斯大林提出，罗斯福总统应再次主持会议。历时三小时的讨论，几乎完全是关于当时的军事形势的。安东诺夫将军宣读一份准备好的文件，详细分析了东线的进展，他表示希望盟国会很快在西线推进，并以轰炸使德国交通线陷于瘫痪，借以防止德国军队从西线越过德国调到东线来。马歇尔回顾了西线的局势，波特代表空军发言，坎宁安谈到德国技术的新发展有可能恢复潜艇的威胁。关于这一点，丘吉尔提到，也许盟国可以通过从亚德里亚海进入巴尔干半岛的一次远征，给苏联东线战役以帮助，但是这一提议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讨论。

会议开完，在罗斯福举行的宴会上的一次非正式交谈中，丘吉尔说，他是经常被当作一个反动派而“被痛打”的，然而三个出席会议的代表中，只有他可以随时由他的人民投票把他赶下台。他接着说，他个人倒是以这种危险而引以为荣的。斯大林随即开玩笑他说，首相明显地害怕英国即将举行的选举结果。丘吉尔答复说，他不仅不畏惧，反而以英国人民任何时候只要愿意这样做，他们就有把他们的政府换掉的权利而感到自豪。他继续谈到小国的权利，并引述一句很贴切的谚语说：“老鹰应当允许小鸟去唱，而不管它们为什么唱。”

在为期八天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的目标是使苏联加入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并争取苏联作出参加对日本作战的保证。然而，对苏联来说，则希望在雅尔塔会议上得到：第一，取得恢复战后经济的资助，其中包括对德国索取赔款；第二，重新获得1905年日俄战争时失去的远东领土和确定在远东的势力范围；第三，获得一个保证苏联西部安全的新边界。对苏联人来说，由于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两次遭到德国入侵，压倒一切的考虑是在东欧建立一个安全区。

事实上，1944 年 10 月英苏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谈时，丘吉尔曾用数学方式在一张纸条上写出过在巴尔干地区划分势力范围的指导方针，然后把纸条拿给对面的斯大林看，他建议，苏联人在罗马尼亚的势力占 90%，在保加利亚占 75%，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势力同英国相等，在希腊占 10%。斯大林当场表示同意，后来美国也默认。

丘吉尔在莫斯科时没有把波兰列入清单，在雅尔塔会议上波兰成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致使三巨头进行了六天六夜的争论。会议指定寇松线为波兰的东部边界，从而批准了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但用多少德国领土作为补偿的问题则留在战后解决。由于苏联军队已经全部控制了波兰领土，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的争执尽管十分激烈，但是主动权完全在斯大林手中。斯大林的态度十分明确而强硬。他说：“波兰问题对苏维埃国家说来，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历史上，波兰从来就是敌人借以进攻俄国的走廊”。为此，决不容许波兰建立反对苏联的政权。

关于德国赔偿问题，斯大林要求“按功取偿”，提出 200 亿美元的赔偿额；丘吉尔提出“各国各取所需”，而德国尽其所能；罗斯福表示希望苏联遭到的一切破坏都能得到恢复，但是他认为，“靠赔偿是不可能补偿一切的”。罗斯福表示美国不想要德国的机器和劳动力，没收德国在美国的财产就可以了。丘吉尔的态度实际上是反对斯大林提出的索赔数额，认为“会议不能用数字来束缚自己”，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罗斯福同意接受苏联提出的 200 亿美元的数字作为讨论的基础。斯大林对丘吉尔的态度大为恼火，指责丘吉尔反对苏联提出的赔偿要求是为了“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德国”。雅尔塔会议没有就赔偿的具体数字达成一致的意見。雅尔塔会议还有一项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是由罗斯福、斯大林商定，事后让丘吉尔参加签字的。在罗斯福的外交活动中，最受到攻击的是他参与制定这个秘密协定。这是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的一次秘密交易。他为提出协定的目的——迅速打败日本，这是正确的。然而作为达到目的手段——背着盟国和中国、侵犯中国的利益和主权，则是荒谬和错误的。

协定以明确的语言规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 2 个月或 3 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的三个条件：第一，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第二，恢复 1904 年日本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益，即：将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越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第三，千岛群岛交予苏联。而且规定，“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上述协定签字时，中国方面毫不知情。中国作为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被列为“四大国”之一，当以它的主权和利益为对象的讨论中，却被排斥在外，直到社鲁门上台后才通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有这样一个协定。这是对中国主权和利益的践踏，实质上这正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丑恶表现。在罗斯福政治生涯的晚期，他的一个突出的政治思想是，战后世局由美苏两家说了算。《雅尔塔协定》就是一个例证。尽管罗斯福在与斯大林谈判时一再表示他不能代表中国人说话，但事实上却扮演了越俎代庖的角色。

斯大林在与罗斯福谈判时指出，如果苏联提出的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就难以向本国人民说明苏联为什么要参加对日战争，很难解释苏联为什么

要向一个并未攻击它的国家作战。如果条件得到满足，就容易用“与国家利益有关”的理由向人民和最高苏维埃交待。这一解释究竟有多少道理是值得分析研究的。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苏联把根据《雅尔塔协定》在中国享有的各项特权逐步交还给了中国人民。从后果来说，还没有到不可弥补或不能挽回的地步。但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却留下了不光彩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记忆。

雅尔塔会议是罗斯福参加的最后一次国际会议。他在会上进行斡旋、调停、运用手段图谋实现美国的利益目标，同丘吉尔和斯大林开玩笑，并力图采取捷径确保会议的成功。有时经过一轮会谈和宴会，他变得精疲力竭，面色苍白。有时他情趣横溢，非常幽默。他密切地注视着苏英两国领导人的态度和情绪的变化。当争论激烈时，他还喜欢拿印度问题和大英帝国的分崩离析来刺激丘吉尔。罗斯福所努力追求的是他所设计的今后的“世界秩序和持久的和平”，也就是美国力图控制战后世界的设想。

雅尔塔会议虽然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协商，但三巨头总算“如愿以偿”，会议程度不同地都满足了他们的希求。为了庆祝会议的“圆满结束”，2月8日晚上，斯大林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2月10日临别前，丘吉尔还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三国领导人频频举杯祝贺。

斯大林元帅提议为首相的健康干杯，形容他是世界上最勇敢的政府人物。他说，当欧洲其他的地方在希特勒面前俯首帖耳时，正是主要由丘吉尔先生的英勇卓绝，英国巍然屹立，分散了希特勒德国的力量。元帅最后说，在历史上，一个人的勇气对于世界未来的历史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像这样的例子他不能举出几个。他要为丘吉尔先生，他的战友和一个勇敢的人物，干一杯！

丘吉尔首相在答词中为斯大林元帅，作为一个强国的强有力的领袖，干杯。这个国家曾经顶住了德国战争机器的全面冲击，打断了它的脊梁骨，将暴君们从它的国土上赶走。他说，他知道在和平时期不亚于在战争时期，斯大林元帅将继续领导他的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斯大林元帅然后提议为美国总统的健康干杯。他说，他和丘吉尔先生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相对说来，下定决心还比较简单。这两个国家都是为它们自己的生存而同希特勒德国作战。这里有第三个人，他的国家未曾遭受侵略的严重威胁，也还没有濒临即时的危险，他就以多半出于对国家利益的更广阔的考虑，成为导致全世界动员起来以反对希特勒的种种手段的主要锻造者。在这一点上，他提到，在结成反希特勒联合和使各盟国保持对希特勒的战斗中，总统最突出和关系最重大的成就是“租借供应”。

罗斯福总统在答词中说，他觉得这次宴会中的气氛亲如一家人，他愿意用这些来着重说明美英苏三国之间的关系。他说，在过去三年间，世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更巨大的变化还在将来。在这里参加会议的领导人，都正在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为他们人民的利益而工作，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给这个地球上的每个男人、妇女和儿童以安全和幸福的可能。

在随后为三大国联盟祝酒时，斯大林元帅说，在战争时期保持一致并不大难，因为有打败共同敌人的共同目标。他说，困难的任务是在战争以后，因为各种不同利益倾向于使盟国分道扬镳。他说，他相信现在这个同盟将经得起这个考验，而且我们有义务来保证使它经得起，我们在和平时期的关系要像在战争时期一样牢固。

丘吉尔随即站起来激情他说，他觉得，我们都正如站在一个山巅上，我们面前展开着未来可能性的光辉。他说，在现代世界上，领导者的职责就是要将人民从森林里引出来，走进和平与幸福的阳光灿烂的平原。他觉得，我们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达到那个美好的目标，要是由于惰性和漫不经心而让这个目标从我们手中失掉，那将是一个悲剧，而历史是不会宽恕我们的。

是的，人们渴望胜利，但更希望争取到一个持久的和平。当雅尔塔会议闭幕时，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着，人们仿佛听到了进军柏林的炮声。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小罗斯福未能随其父亲经历雅尔塔会议，但他从其亲属及多方了解了雅尔塔会议的详细情况，并进行了精心的叙述。

我没有陪伴我的父亲到马耳他，而在雅尔塔会议那些日子，以及后来在埃及的大比特湖都没有我。但这些地方经过情形，我却能够得到不止一次的直接报告。一部分印象是随后从我的妹妹安娜那里得来的，另一部分，则得自霍浦金斯。我父亲在空闲的时候，也有些信给我，信里面告诉我一些他个人的态度、反响。从这些不同的及个人的报导，在重要的情节上是互相符合的，再从官方对我父亲这次行程的日记中，我足以构出下述的图像：

克里米亚会议，曾取道马耳他及埃及，从时间上说是最长的（父亲离开美国有五个多星期），也使三巨头的领袖人物们，能够有更多的商谈（父亲在克里米亚的八天中，曾举行八次正式会议，及无数次非正式谈话，总结了全部军事上及政治上的诸问题）。不过，它并不是这次战争最重要的高级会议。

重要原因在于若干主要决定已在他处议定，在华府，在开罗，在德黑兰。

在雅尔塔，苏联大元帅、英国首相、美国总统以及他们的军事和外交助手，不过集合来完成他们业经达成的一般协议之特殊细节的工作而已。这次参加的顾问们比以往任何都多。无疑这次会中所谈的许多细节也是重要的，但其全貌早在德黑兰会议中形成。假如父亲还活着，三巨头会议以后会时常举行，不仅在波茨坦的一次而已。雅尔塔会议之成为必要，是因为德黑兰所议定的大计在敦巴敦橡树会议中并未顺利地生效执行。而且仅次于三巨头的三国各代表人物尚未有机会见面亲谈。在雅尔塔，又一次融洽一致，给战后世界整个结构之骨骼以血以肉，这就是它的重要之处。

雅尔塔会议之在克里米亚举行，是为了斯大林的便利。在父亲离开华盛顿约一星期之前，红军已开始其准备就绪的冬季攻势。这项攻势，据报而且是事实，虽然气候是恶劣的，较预定计划提早了一个星期，原因是要消除纳粹对西线盟军所加的最后挣扎的压力。

英国首相对选择雅尔塔为会议地点极不高兴！霍浦金斯报告丘吉尔的表示给父亲说：

“他说，就是我们花上十年工夫去找，在世界上也找不出来比雅尔塔更坏的地方了。……他断言那地方是生伤寒病的好去处，而且要命的虱子，到处繁殖着。”过了一天左右，他自己又传过话来说：“从萨基飞机场坐汽车到雅尔塔，要花六个钟头，这条穿山逾岭的公路的一段，最好的地方也唬人不浅，最坏的地方，干脆走不通；德国人从这里撤退之后，把整个地区，弄得这样可怕，参加会议者的健康，会处于危险之中”。

丘吉尔的表示，父亲晓得了，也就把它们丢进档案里去了。在马耳他，父亲是2月2号到的，哈立曼在接他。他获悉汽车在那条公路上开是没什么

问题的，而那地方的健康状况也没什么问题，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第一次军事参谋长会议在马耳他举行。因为盟军的胜利已经有了若干征候，因此联合参谋总长们所关心的唯一现实问题是那一部分力量必须仍旧留在欧洲战场。而必须增加多少力量在太平洋战场。海军上将金氏及海军军官们，他们因为显而易见的诸种理由，是一贯地对于对日战争抱更大的关切。他们现在自然是较温和地反对马歇尔主张把所有可用的力量，放在欧洲战场上去，以便在可能的最快期间内解决纳粹。在马耳他英美联合参谋总长会议开了几天，有两次邀父亲出席，有一次邀丘吉尔出席，都是为报告存在于他们之间意见的小分歧是怎么样解决的。

有一次，父亲同安娜曾经乘汽车在马耳他兜一个 30 哩的圈子，在愉快的、温暖的阳光下，去看他上次来时，送给马耳他人民的雕云石壁。

在克里米亚的一千四百英里航行是夜航。整个晚上，每十分钟或十五分钟间，就有一批 C—54 式巨型机，从卢加机场起飞，向东经希腊南部尖端，再向东北横跨爱琴海及黑海到萨基机场，在飞行航线的下面，美国及苏联舰队往来巡游，预防飞机发生意外强迫下降的可能性，以资保护。

在父亲的那架第一号飞机上，李海、麦金泰与勃朗、华生、迈克·瑞莱同亚瑟曾注视到六架战斗机在雅典起飞追赶，并看到另一架飞机的机器发生毛病折回。中午，父亲那架飞机在苏联领土上降落，莫洛托夫、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与哈立曼在机场欢迎。二十分钟以后，英首相的飞机也到了，红军乐队及仪仗队开始奏乐致敬。美国国歌、英国国歌之后继之以国际歌，这时安娜与父亲已登乘一辆苏联汽车，司机也是苏联人。在行列之最前，开往一片雪掩的原野，其后就曲曲折折盘上那“红色峭壁”。从萨基到雅尔塔沿路，均由苏联军队警卫。安娜曾用力拉父亲的袖子说：

“看！好多都是女的呢！”

在黎娃地亚宫前，以前是沙皇的消夏别墅，其后一度为人民肺病休养院，后来纳粹杀人强盗曾作为参谋总部。纳粹退出黎娃地亚宫时，他们什么都没给留下，里面精光了，只剩下两幅小画是挂在父亲寝室的墙上。但苏联人从莫斯科搬来一套旅馆全部人马及设备，很合适，很像要什么有什么。哈立曼的女儿来得也合适，她来欢迎他们。他们全都累极了，他们到了以后的时间表是：洗澡、吃饭、睡觉。马歇尔将军睡在皇帝卧室，海军上将金氏在沙皇皇后住的那一间。

距此十二英里，就是专门提供英首相住的别墅，斯大林住的别墅则距此六英里。第二天是星期天，苏联大元帅一早就到了，同日下午四时，他同莫洛托夫到父亲处作第一次非正式拜会。五点钟第一项正式会议在黎娃地亚宫的壮丽舞厅中大圆桌前举行，会议工作十分紧张，时达两小时十分钟，其后的七次会议，按日举行一次，情形与此次相仿，仅有最后一次会议时间较短些。工作是极繁的，约有下列诸项：

（一）决定一个全体一致的对希特勒主义战争的详细步骤。在会议进行中，红军以空前的速度反攻纳粹。自然，在英美陆海军代表们，对此就有所推测，究竟苏联人是否在东线彻底击破德国防线，或在会议休会之前，这世界上最强大的法西斯国家能否崩溃。

（二）德国败亡后的占领与管理德国问题。父亲来到克里米亚，希望说服两个同伴，使他们相信管理德国应该统一化，不应瓜分为各个占领区。管理与行政不但在最高机构中采取联合方式，一切下级机构也应如此。但英国

与苏联对此意见均甚冷淡。他们说分区占领的意见应该成立，使父亲接受。于是在雅尔塔，对德占领区的划界问题是已解决而且大家同意了，什么时候各国军队在其本区内建立行政管理的问题，也决定了。

“此乃余等不易之目标，”三个伙伴如是写道，“以消灭德国军国主义与纳粹主义并保证德国永不可能扰乱世界和平。余等决心解除或控制所有德国之工业……。”在美国知名的摩根索计划（父亲正是这计划提案人之一），内中各款是要打击德国工业潜力的核心，如果没有这种潜力，现代国家就无法进行战争。他所找到的一位倾听这计划的人是斯大林，可惜由于并非他两人的错，这个严密的条款，未能照办。

（三）德国赔款亦经决定，并列定一表，包括付款年月，赔偿种类，工业设备等。（此表，其后英国未曾遵照，美国亦然。）

（四）联合国大会，此会奠基于敦巴敦橡树，已先行得到同意。雅尔塔会上决定在旧金山召开，时间离该时不足两月。敦巴敦橡树所遭遇的障碍是否否决权问题。是否任何三强之一，运用否决权，足以获许其制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某一议案之处置呢？譬如说：安全理事会对某一被控为侵略国的处置决议，否决权对此又该如何呢？

在雅尔塔三巨头对此问题，曾予正视，并在应有的高度上考虑它。父亲与斯大林对三强否决权观念表示赞成，他们的理由基于下述简单而明透的事实：即假如想要维护世界和平的话，只有在世界最大强国获得互相同意条件下，始有可能。假如三强中两强，对其他一强有不同意见处，或某一强对其余两强有不同意见处，则和平即在险境之中，只有全体一致与目标符合无间，才能拯救和平。

这一议程上问题所引起的两难窘境，父亲解决了。三强，外加中、法两国必须全体一致同意，这世界机构始能对某一被控之侵略国，采取经济的或军事上的制裁行动。但安全理事会十一个委员中，如有七个委员一致，即可传审某一侵略国，在世界舆论的裁判下，得一清算。

父亲坚决主张维护各国间谐合一致之必要，特别以三强间为重。遂引申到否决权之原则上，以确保谐合一致。

（五）由于欧洲诸国之获解放所引起的诸问题，三巨头亦提供诺言，并以此重申大西洋宪章之各项原则。

这就是自主，一切人民有权选择其自己政府之形式与自由选举。

（六）关于波兰，斯大林坚持寇松线，并有利稍加修正，定为波兰东部国界，同时基于同一立场，牺牲战败之德国，割其若干土地，增加波兰北部及西部幅员，以维护波兰为一强盛自给自足之国家。关于建立一波兰政府，自指一全国团结之政府，觅一妥协方案，实属必须。当时苏联人在莫斯科有一波兰政府，而英国则支持在伦敦行使职权之旧波兰政府。父亲当时是调解人，亦是促裁人，这个问题对团结殊为重要，现在也还是一样。

（七）丘吉尔特别不容他人染指于地中海及巴尔干的英国利益，坚持对南斯拉夫之将来应重予规定，后经同意，南国临时内阁应包括旧阁员若干名，又为了斯大林之故，旧阁员仅以未曾妥协“通敌”者为限。

（八）父亲确信，三巨头时时集会，实为迫切之需要，此次克里米亚会议，仅在德黑兰后稍逾一年，足以为证。因此对于三强外长集会，定出一经常而继续性之会期表。

（九）明智地，庄严地，同时也是真诚地，三巨头写下他们的信念：“唯

有我们三国以及所有爱好和平诸国之间，继续并增进合作与了解，……始能实现巩固与持久之和平。”上述引句中头两个字“唯有”值得我们注意，数目“三”字亦然。

霍浦金斯可以为我下面的话作证，即丘吉尔、斯大林与罗斯福之团结，于雅尔塔较诸在德黑兰更为坚固，更为确实具体。同时显然地，父亲较在以前诸会议中更扮演着领袖的角色。为他们所拍之诸照片，父亲坐于中央，并非偶然。他左右丘吉尔的力量，较前愈为周到，斯大林亦乐于追随父亲的意见，接受父亲的各种解决办法。

正是在雅尔塔，或较诸前此若干次会议，尤充满一种巨大的，全部担当的责任感于三巨头肩上。在各种见解上，自然也有分歧，就是一方诸代表之间，亦有差异。譬如，父亲对他的顾问们也并非言听计从，全以为是。但是，诸如此类的分歧，在进行建筑一个确信的、坚强的和平巨大工作面前，消失隐没了。

在这次会中，还有许多富有启示性的小插曲：

一次，在斯大林别墅的宴会上，父亲外交辞令式地，但也是诚挚地夸赞苏联香槟好，席间主人就很得意地说，此酒来自斯大林的故乡乔治亚。父亲更由衷地开怀笑着说：“战后，在我退休不作总统的时候，想在美国贩这种酒，乘机发点小财”。

同时苏联方面也善于辞令的运用，他们引人注意克里米亚的天气。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阴沉不快的，父亲一到，就好起来。他们说民间传开了，苏联当地人民都在讲，并形容这样好天气，特称之为“罗斯福天气。”

他们彼此之间还交换着礼物及勋章。对于英首相、斯大林、艾登、莫洛托夫，父亲赠给他们特制的凸雕大勋章；父亲此外还送一本“靶子：德国”的书与斯大林，大约是一种婉转的政治性的暗示，表示盟国“鹄心”应该把重量放在德国上面。“鹄心”一字是当时全面轰炸德国战略据点的电报上用语。另外父亲又赠送苏联大元帅八枚勋章——总司令级的两枚，司令级的六枚，转予八个红军将领。

在美国代表们离开黎娃地亚那天是星期日，2月11日，苏联方面在宫中设宴，殷勤以伏特加，各种苏联酒，及父亲曾夸赞过的乔治亚香槟相劝，并备有鱼子酱、牛油、橙子及红皮桔。这事使我的妹妹安娜记起一天早晨，她出去散步，一位操英语的苏联特务小姐陪着她。她遇到一群俄国小孩子，她就分送给他们巧克力糖棒。这些孩子收下了，但这位特务小姐严肃地坚决地把糖要过来说：

“他们够吃，我们不愿意美国小姐以为他们不够吃。”

在会议快结束散场的时候，斯大林又再重申他在德黑兰所作的第一次自动表示，从对德国作战胜利之日起，六个月内苏联必向日本宣战。他说完了，又沉思了一下，把六个月的估计，修改为三个月。

在官方公报所包括诸点之外，三巨头同意苏联为确保太平洋安全起见，将千岛群岛及南库页岛划归苏联。后来就因为这点，父亲及斯大林、丘吉尔被批评为“秘密分赃”。显然这种批评，故意无视当时这一协议之无法公开这一事实。因为当时苏联尚未参加对日战争。说千岛群岛是俄国对日作战的“报酬”也不正确。因为一年前在德黑兰，斯大林自动地表示这一步骤，并无要求什么“报酬”之意在内。

从黎娃地亚，父亲坐车到达赛瓦斯托波尔，已是薄暮时分了，大约这是

凭吊这世界上受战争破坏最惨城市之一的荒凉漫无人烟景色最适宜的时刻了。这里到处是瓦砾，一堵墙笔直地呆呆地站着，好似广告牌。人们告诉父亲说，德国人逃走后，赛港有六栋房子没有倒。

在苏联“卡托琴”号辅助舰上睡了一夜，一早作长距离飞行赴埃及抵德塞瓦机场，全途一千英里。到达以后旅客们看见重巡洋舰“昆恩西”号在等候他们，这条船曾经从纽斯新港搭他们来的。等候他们的还有全世界对雅尔塔会议反响的新闻。连胡佛都吝妒其词的说：“是将予世界一大希望。”父亲浏览了一下电报打来的若干报纸社评，就拍了一个才出世的无线电传真电报，并加称：“我确信全世界人民重视此次会议之诸种成就……我们三大国家力能合作，在和平时期亦如战时，亦获一真实之保证。”

父亲在“昆恩西”号上，有三个重要客人来访。安娜后来告诉我说：那时他是极疲倦的人，连续两星期来的紧张，耗尽了力气，他疲乏极了，似乎全靠精神来支持。但他不顾疲劳，仍然要接见他们，同他们谈话。

第一位客人是埃及皇帝发鲁克，他们谈到战时美国购买埃及长纤维棉花的事及战后相互贸易的重要，父亲肯定地预言战后定有大批美国旅行客到尼罗河流域来游览。第二位客人在下午高声谈笑登上甲板，是黑色的塞拉西，犹太胜利之狮，埃塞俄比亚（即阿比西尼亚）之帝。这位皇帝热烈地告诉父亲他在国内举行的种种改革，并以渴望的神情赞成父亲所希望的战后两国间关系之加强。

第二天早晨来了第三位客人，沙特阿拉伯皇帝沙德，这是他离开王国第一次旅行，他是搭一条美国驱逐舰来的。父亲这边的人们，可以看到舱面上装起遮雨的东西，以便这位皇帝走出来。为了尊敬回教风俗，应该让家里的妇女回避。我的妹妹安娜，这天离开父亲作开罗之游去了。

这位皇帝与父亲对巴勒斯坦犹太问题交换首次意见。父亲老早希望说服沙德，将欧洲大批被迫害驱逐无家可归游荡之犹太人，基于公平道义让他们安居于巴勒斯坦。后来巴鲁什告诉我说：父亲承认，在他一生中同他谈过话的人中，要以这位有着铁的意志之阿拉伯王，最不令他满意了。最后，父亲答应沙德，决不允许有美国人去鼓动对阿拉伯人的仇视。

叙利亚、黎巴嫩、法属殖民地，多数居民是阿拉伯人，父亲对他们来访的代表说，他有法国政府允诺叙、黎将来独立的书面保证。他向他担保，他随时可以书面通知法国履行其诺言，并尽可能的帮忙、支持黎巴嫩人及叙利亚人以制止武力行为。

沙德对父亲坐的轮椅看着羡慕，使他吃惊的是父亲立刻送了他一把。

从苏伊士运河起飞，经地中海返国，长途于是开始。在阿尔及尔停了一会，等戴高乐回话，是不是他不准备发牢骚，他是否打算接受父亲的邀请拜访父亲一次？由齐弗雷大使来了回音说：

“因为一串理由，戴高乐在此刻离不开巴黎。真抱歉，阿尔及尔太远等等。”父亲对此耸耸肩，昆恩西号就向纽斯新港驶去。

从如此成功，如此重大的会议回去，应该是十分欢愉的。但回去的旅途却是悲伤的。父亲最老的老朋友，最亲近的老朋友，华生从亚力山大港西返途中染病，在大西洋中途死了。安娜后来告诉我说，父亲回到白宫的时候，特别地疲倦，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他可以说又重新恢复了他固有的热情，在与母亲重聚的时候，他说：

“ 你看从克里米亚来的公报：它所纪录下来的航路！从雅尔塔到莫斯科，到旧金山，到墨西哥城，到伦敦，华盛顿同巴黎！不要忘了，它还要纪录下来柏林呢！ ”

“ 这是一次全球性的战争，可是我们已经开始转变它成为全球性的和平呢！ ”

第十一章世界失去了舵手

小罗斯福：父亲死了，世界失去了舵手

没有一个伟大的领袖能影响世界于永久

美国人是普通公民，只是国家主人，一个伟大总统的责任在于帮助美国实现美好的愿望

凝炼全球性和平的工作已经创始而且创始得很不错。不幸自罗斯福逝世之后，他勇毅的创始，在若干地方，若干点上，是被损害了。也许“损害”二字，还形容得过轻。也许应当这样说，和平正在迅速消失之中。

这种令人悲哀的记述，是处处有例子可以证明它的真实性的。李普曼在叫：“没有和平”，报纸上刊载着关于我军在德国占领区及东角的许多前进航空基地的种种新闻，告诉我们空军怎样在那里建立起来，用最新式、最快的喷气式飞机来代替那“古旧”的P—51式机。这些悬解的问题要求作出答案：为什么呢？

难免令人想到，这种疑惧心理是由于我们怕原子弹的“秘密”被人染指的妒嫉与病态精神的忌恨而产生的。所谓“秘密”，其实在原子弹制造厂工作的每一位科学家都直说过，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秘密。可是我们还把这杀人的玩艺儿搂紧在胸口上，以避免我们的“不堪信任”的盟邦的侵袭。而一方面则宁愿把这玩艺儿交给穿军眼的人们，就像我们老早是个军国主义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平民所有的民主国家（不能不多谢我们的创始祖先，我们是一个平民民主国）。

诸如此类的证明，是可以举出很多的。

我们的工作是要把上述现象的基本原因找出来，为什么和平正在迅速消失之中？为什么在华盛顿许多鸡尾酒会中，人们熟悉地闲谈着对苏战争“最好在1948年以前”干他一场。此言之意就是最好在苏联对原子武器研究还未到家的时候于他。为什么记者们写着：“在欧洲每一位政治家，在他的心底都有一个基本的，主导一切的假定，就是他必须准备设想发生英苏之战的可能，同时一切国家亦将卷入战祸之中”呢？我们必须找出来，谁是这些政治家？我们必须击碎他们这种主导一切前程的假定，我们必须为对日胜利和欧洲胜利日之后，显然已确立的世界和平而斗争。

这一工作开始先要算一下：这期间什么变故发生了，什么变故，引我们从和平的路上转入歧途？在这歧途上陷我们于纷乱之境？

我以为有一个事实，一旦把握与了解它，就可以对战后一切政治真相，弄清楚与辨别明白了。这事实就是罗斯福死后，现代世界进步的力量，失掉了它的最有影响与最有说服性的导师。由于他的死，为世界所有国与国间，人民与人民团结一致的最明确的呼声停顿了。更有甚于此者，对世界任何角落的人民而言，他不仅是美国的象征，也是自由的象征，人民将解放与建立起和平富足新世界的希望全寄托在他身上，他死了，人民的一切希望也随他之死去而幻灭，也失掉了他们的信心。

自然，我们必须明白，没有哪一个人，无论他是如何伟大的世界领袖，因为他生或死会影响世界历史于永久。最多不过影响永久而无限的时空之一刹那而已。但在罗斯福这一个例子上，一个个人之死，却意味着一段继续性的空虚，就在这段永久空间的须臾中，这种空虚是弥漫于进步的力量，前进的力量，相信战争并非为了维持战前现状而打的力量之中。

进入这真空中一看，进步的朋友们是走出去休息吃中饭去了，里面阔步的正是立在反对方面的人，进步的仇人，旧世界的保持者，反动的卫士们。

要为以上的论据，找出特殊的种种证据来，也不难。在此书开头的几页中，我曾据我个人所悉，记载过这位我们全体胜利的建筑师与其他领袖们所商讨的多种计划。在这些计划中所载，诺言犹在。但把诺言与所实行者相较，言行对照之下，我们看出了什么来呢？

譬如以中国为例，在开罗，罗斯福从那位封建军阀（他恰巧又适为中国战时领袖），扭挤出来一项诺言。这诺言答应在全面战争未停止前，完成一个真正的，全国统一性的代议制中国政府。在这改组的新的、更为民主的政府保障之下，尽可能地迅速举行全国普选。自然，这诺言是有条件的。蒋提出两个条件：（一）父亲必须从苏联方面获得绝对保证，保证满洲重返中国主权之下，此一中国边界必须被尊重，并包括苏联不致干涉中国内政问题之谅解。（二）美国支持中国，战后拒绝英国在香港、广州与上海治外法权，蒋并为强调这一条件称：日本停止抵抗以后，只可以美国战舰驶入上述诸港口及其他港口，英国战舰是不行的。

后来履行得如何呢？父亲的特使赫尔利作得很漂亮。从苏联方面获得所有必要的保证，事实上其后苏联亦遵守了这协定字面上及精神上的一切。轮到美国该履行它的条件上的责任时，我们并没有。第一次驶进中国各港的战舰，就都是英国的。不准英国战舰驶入中国港口的命令，不知压在哪儿了，很可能就压在国务院。

结果，美国破坏了它的诺言，蒋也就自行其事。中国目前状况，并不是进步的状况。政府亦非全国统一的政府，并非所有各党各派都参加的政府。

由各殖民地的领域里得来的证明，言行相较，尤为尖锐，大有距离。以荷属东印度言，威廉女皇曾称：一旦冲突停止，她立即宣布东印先获得自治的地位，然后很快地由全民投票，表决独立。是的，这一项诺言是以美国军队负责解放这些物产丰富殖民地为双方的谅解的。事实呢，使世界都为之沮丧，英国提防爪哇人民的独立会对她自己的殖民地发生影响，像发出炮弹似的速度，冲进荷属东印，利用美国租借法案得来的物资，用最残忍的手段，镇压这些争取独立的人民，而在美国，我们完全什么也没有做。

或以法属越南为例。父亲多次坚持这一主要为美国军火及军队所解放的殖民地，决不能随便交还法国，使她照数十年老样子被她的一批帝国主义者门徒所榨取。然而，当英国殖民地军队开入越南的时候，他们把法国军队及统治者行政官吏也带进去了。快！时机成熟啦！在来不及有人看见的时候，把它交回给前日的帝国主义者的手中吧！

这些例子虽重要又足以暴露其真象，但较诸反动对于进步的压力之最严重的证据，它们还比不上一半呢！最严重的对三强团结的破坏，而三强团结，正是和平的拱心石。罗斯福把这块石头雕好了，砌好了，许多人一直在敲它，希望它又掉下来碎了。

这种国际团结中之总工者为首之辈，就是那些硬认为否决权是错误的人。此辈或由于无视或由于利令智昏，对现世界为美、苏、英三强所共理，必须三强工作谐合，始能再证明和平这一事实，盲而不见，至于说苏联如何倔强，如何贪得无厌，凡有自尊心的强国不能同她维系团结，要压她，这实亦不能自圆其说。这种辩解是不能抹煞一切的，全世界曾经看到三强团结的事实，目睹其团结的进步，看到了由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到1945年正

月，以及 1945 年中一系列外长会议的事实经过。

仅是本年外长会议以后，国内才是狼嚎鬼叫地说贝尔纳斯已经把美国出卖落水了，在会院中受范登堡一流叫喊的领导人物及新闻界，亚尔斯特——罗易，哈佛——麦克可密克异口同声合唱：要求“对苏强硬”。从此以后，我们间的团结，就更坏了。究竟贝尔纳斯在莫斯科作了些什么如此吓人的事呢？他仅曾谈到原子弹最后交联合国管制的可能。因为贝尔纳斯是够清楚地体察出来，假如有那么一个单独因素，可能让我们战时是战友，和平时期设想是同盟的国家心目中产生对富强美国之疑惧，那么这因素就是我们想把世界上最有毁灭性的武器秘而不宣。为什么要保密呢？保密起来是想打谁呢？

显而易见，贝尔纳斯学乖了。两个月以后，他听到了点内部的风声，准备宣布自己创作的一条“对苏强硬”路线。但是，仅仅一星期之后，丘吉尔先生就在密苏里省，福尔顿城，讲演向苏联发动一个野蛮的猛攻。丘吉尔就是那位曾经不断拚命以图躲开由英伦海峡进攻欧陆者，从 1942 年春天他就躲，一直拖过 1943 年、44 年的冬天。也就是那位经常拚命想压迫盟军改变战略，以便驱使美军向山岭防线进攻。他毫不忸怩地把德意山岭一带战线称之为“欧洲柔软的腹下部”。他过去就努力把进攻德国的重担，推到别人身上，以保障英国在巴尔干及中欧的利益，在这两个地方同盟友苏联角逐抗衡，危害了原可迅速到来的和平。现在他又急急忙忙放起一个试探风速的气球，对他以前的盟友立刻发动攻势了。自然他不会未曾与闻，在他嚷嚷来一个英美军事同盟的时候，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仍经常在华府开会，在大战业已“结束”很久，他们一直还在开会。

生死攸关的三强团结，是渐渐解体了，事实上这一解体的日子甚至可以说在战争尚未结束前已经开始了，在纳粹崩溃三个月之前，三强外长及陆长就陆续在伦敦、华府及莫斯科集议了，草拟着德国投降备忘录，规划投降条件应该如何。经过几次研究，就此项备忘录，获得最后协议。莫斯科曾以此备忘录一份，训令朱可夫元帅遵照，但伦敦及华盛顿却并未将此项纪录送达盟军总部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事实上，艾帅规定的投降条件，是他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所拟的，因为艾帅不知道有此项文件存在。苏联因此恼怒，不足为奇。其后它对美英不遵照雅尔塔规定，未立即在彼等应该撤退的占领地带撤兵，表示愤慨，亦是否足奇？此时苏联对英美占领德国当局，并未尽力履行在雅尔塔规定的赔偿程序，亦是否足奇？

因为这一串事实的发生，无可避免地激起克里姆林宫的反响。无疑，自从对德胜利之后，斯大林及其顾问决定了，假如全面情形，显著地是向着同盟解体，他们就立刻要修理保护自己的墙，以预防意外了。铁幕之起，并非简单，其存在是有种种理由的。如果丘吉尔能指责欧洲有个铁幕，则斯大林可以告诉他需要铁幕的原因。不幸的是，国际间政治手腕就是如此，逻辑是被片面指责别人“你可又两样了”的鬼术所代替了。回到这本书前面所述目前危急状况之主要的基本的诸因，则我只可说，是美国与英国先挥起装甲的拳头的，是美英第一个破坏了三强集体诸决议的。

同时亦须注意到，在枪声终止后世界尚在昏慵状态中的时候，我们放弃了一个重要而不可缺的任务，即英苏间调解人的任务，因为今日安全利害的冲突只存在于这两个国家之间。不仅不冲裁这两个国家间的分歧，（以前父亲则是小心地从事仲裁），我们还挑一边帮忙。这比帮一边还坏呢，我们不但单纯地，在英国的旁边比齐而已，还要为她撑腰。譬如，悲剧性的希腊例

子，英国兵不顾英国人民公开的抗议，无情地屠杀反法西斯的希腊人民，我们还同英国外交部一个鼻孔出气，宣称那一场滑稽选举是民主的。同样，我们挑拨无甚怨言的土耳其，去反对苏联要求共管达达尼亚海峡。只准两国共管达达尼亚，并且基于地理上的原因，只准希腊与土耳其去管！对这样重要的一条海峡，我们支持英国反对苏联管理如此重要的海峡的一切条件，我们又一次无视了三强团结的原则。

再举伊朗的例子来说。假如不是故意使其尖锐化，伊朗问题在这里不过是一场真正滑稽剧而已。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时常是完全置伊朗政府的请求于不理，由英美作主人的结果，把伊朗问题继续保留于议程中，好像它是从来未有威胁和平的事件似的。其实事实很容易知道：英国满心嫉妒它，把持着伊朗南部油矿的特权，按百分之五十一对百分之四十九的比卒分油田之肥，自然那比较多的一半是属于英国这头狮子的；苏联呢，在伊朗北部油田则按一半制分配（同时应该记着，伊朗北部油田与苏联巴库油田很近，是一脉相连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就把这件事，当作反苏运动日了。所有美国的专栏撰述者，评论家，到处联合一致地抨击苏联人都是帝国主义者。我们所见所闻，几乎要接受这种歪曲意见了，因为老是喋喋不休，如此重复地宣传着。

伊朗问题之重要，其值得重视之处就在富有启示，启示给我们知道，在伦敦与华盛顿有一批诡计多端的人们，急于想制造，鼓动仇视苏联的战争空气，好似苏联不曾对纳粹主义的武装力量首当其冲过，苏联人不但首当其冲并且还推翻了纳粹，这就是什么为了和平而联合苏联一直是占重要性的自明之理。

如果我如此说，如此强调，那是因为我有权利，虽极微薄。如此地说，因为我曾经与那些使我不忍回忆其众多之已死殉战烈士共同工作过，共同飞翔过。发现他们所完成的事迹在不及几个月后就被人蔑视并不是愉快的，更何况蔑视他们贡献的人们又是些始终不曾（即使在珍珠港事变以后）在正确的角落里露过脸的人物呢？听到那些所谓新“国际主义者”的叫声，在今天特别尖锐，也是不能愉快的。那些国际主义观念的议员，是想用一种国际联合来发动第三次大战，来向一位曾经在第二次大战中我们的战友进攻。

是我用了“有一批诡计多端的人们”这句话，同时我还要指明他们就在华盛顿。或者我应当更指得明白点，我现在想到国务院的那一批职业人物，父亲从来没信任过他们。这里包括某些人，时常错认他们是我们外交事务的“专家”。我想到国会里，无论两党中哪一党的那些反动派，他们死硬认为最重要的是将来走哪一边，而不是为将来大家一起合作。我想到我们那些“新闻自由”的卫士们，这些新闻是英勇地主张不负责任的自由。这些就是用最谩骂的口气来反对三强团结原则者，因此他们坚持否决权是一种“毒恶的制度。”

同时我也想到，那些把我们外交政策缩成原子弹大小的人们，那些军官们，只往他们自己职业前途着想者，是准备好随手就可以宣布：文明不过一堆瓦砾而已。

我曾经表示过，我认为可以感谢的是美国习惯及其传统，不准军人控制国家的命运。我确信法律规定总统是陆海空军总司令，而总统传统上都是平民，决非偶然。但我们不可忽略，应该清醒地看出，实际上军人已经把握了战后外交的大权。我并非批评马歇尔在中国的工作，也不把史密斯将军在莫

斯科任大使除外。我也没有要辩论而不承认李海海军上将不是总统最好的外交顾问。但是我要主张这些重要的外交职位，是应该交予文官的。一个像美国这样不好战的民主国，依靠军人们来取得国际事务资料与指导国际事务是不适当的。军事人员走到美国政治或外交界，必须严格遵循先脱离军队，或退休为平民之后再入政界。

军人外交之危险性，必须明了，军人统率的是军队，只有在进步的外交政策之下，军队作为此外交政策之工具的时候，军队才能成为进步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不管人多么能干多么高尚，他是不能同时管理外交又统率军队的原因。我国海外驻军的态度是这一理论的富有兴味的证人。我们士兵相信他们为胜利而战，一般说来，他们是愉快地，抛弃家庭妻子，儿女天伦之乐，宁愿领非常少的一点牛肉，负起斗争与胜利的责任的。兵士们“让我们回家”的骚动，迟至波茨坦，都没发生过，因为当时仍然似乎有，亦确有为民主而服务的具体工作，要在被征服的法西斯的老巢中推行。一旦他们作战的目标——三巨头在德黑兰条约中向世界保证的，即主要的“为人民子子孙孙谋和平的目标”，已然日趋显然幻灭的时候，从巴黎一直普遍高涨到东京的回家怒号在华盛顿引起十分敏感的配合。

让我把事情交待很清楚，我并非反对维持庞大军队。恰好相反，我是赞成的，假定这军队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用来作为保障国际安全的军力之一部分，只要联合国各国依据上述这一假定去做，这正是联合国的基础，也就是说，三强团结更空前的进了一步。

现在我该问这一问题了，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这些并非美国政府一官半职的人，但较诸官们更重要者，也就是说美国公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来保证我们的政府，重返罗斯福所指引的路上去呢？

回答这一问题，我必须很简短的说一个教训，我最初由历史中，其后从观察我父亲当总统中，得到这一教训。在我国，我相信那些反应敏锐，接受人民的明智而又聪慧愿望的总统，是最伟大的总统。林肯直到美国内战将近两年之后，才能在解放黑奴法案上签字，解放了黑奴，并非因为北美人民当时没有迫切的压力，他才如此作；实乃由于当时要求的压力，尚不充分之故。在美国的民主制中，总统与人民间存在着一种关系，维持此种关系之应有的联系则又非常稀有。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是美国的公民，如果哪一位总统有意作一个伟大总统，我们必须协助他。假如说罗斯福是一个伟大的总统，则主要地应感谢在他四次白宫任内，美国人民能够公开发言，明白表示其对国事的意见。

